

戴高乐主义与大資本

亨利·克劳德著

(内部讀物)

512

9

世界知識出版社

戴高乐主义与大資本

亨利·克劳德著

李元明 林 立譯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Henri Claude
GAULLISME ET GRAND CAPITAL
É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60
根据巴黎社会出版社1960年版译出

· 内部读物 ·

戴高乐主义与大资本

[法] 亨利·克劳德著

李元明 林 立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圆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1号

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0.65元

1963年6月第一版 1963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张 $5\frac{3}{8}$ · 字数 120 000

统一书号 4003·112

目 錄

序言.....	1
---------	---

第一部分 政治設施

第一章 个人专权制度.....	3
第二章 大銀行的政府.....	12
家族关系.....	13
顧問.....	16
政府.....	20
委员会.....	26
其他机构.....	29
第三章 戴高乐宪法和垄断資本.....	33
戴高乐宪法是资产阶级統治集团思想和願望的忠实反映.....	33
戴高乐宪法的客观因素是法国帝国主义制度的危机和国家壟断 資本主义的发展.....	40

第二部分 政 策

第四章 先驅者.....	50
第五章 戴高乐政府上台以后.....	72
为金融資本的欧非共同体政策服务的戴高乐主义.....	72
法国資本主义与德国資本主义的新“合作”：巴黎一波恩軸心.....	85
戴高乐政权和非洲人民.....	99
黑非洲和共同体.....	101
阿尔及利亞問題.....	105

同苏联的关系和国际局势的缓和·····	113
法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法帝国主义追随美帝国主义的政策·····	116
经济政策·····	124
总的结论和对批判的批判·····	154

序 言

1958年的五月事件、第四共和国的終結以及現行政治制度的出現，向所有的法國人提出了許多問題。他們很想了解戴高樂主義的前景如何，他們國家的前途如何。

第一類問題是新制度的政治和社會內容以及戴高樂將軍所扮演的特殊角色：當前的共和國總統是像他自己所宣稱的那樣是一個各階級之間的仲裁者呢？還是一個階級的工具呢？戴高樂政權的階級內容和意義是什麼？目前這個制度僅僅是個簡單的历史偶然事件呢？還是有着更深邃的原因並且是現代資本主義總趨勢的產物呢？

第二類問題是產生新制度的历史原因和它的前景：第四共和國為什麼會崩潰？戴高樂政權是怎樣建立起來的？這個政權有哪些矛盾？這些矛盾將會把它導致何處？在法國實現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如何？需要些什麼條件？

在本書中，我們僅限于回答一些或者簡單扼要地答复一下有關新制度的階級內容問題。至於第二類問題，我們準備在另一本書里加以闡明。

我們認為先把這一點弄清楚是很有必要的，因為人們在理解戴高樂主義時可能犯兩種相互對立的錯誤。由於戴高樂主義只是在1958年阿爾及爾發生了五月事件以後才上台的，有些人就可能把戴高樂主義簡單地看作是這個事件的產物，因而給它歸結成一種偶然的和意外的性質，從而認為戴高樂主義的消失必然會像它產生時一樣容易。另一個錯誤則相反地認為，戴高

乐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认为它(或者另一种类似的制度)是历史的必然产物。从这点出发,就会否认在法国建立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和机会。本书论述的重点在于纠正第一种错误的看法。

第一部分 政治設施

第一章 个人專权制度

1959年7月，法国一家資產階級報紙写道：“無論在作决定的爱丽舍宮那里，在負責行政和管理任务的政府那里以及在行政管理机构那里，还是在幕后策划和蒙蔽輿論的‘小貴族們’^①那里，或者在多数党操纵的国民議會那里，戴高乐主义到处都获得了胜利。”^②

然而，戴高乐主义究竟是什么呢？

这就是1958年在法国已經建立起来的制度，我們不可能有别的称呼。目前这个制度的支持者所慣用的第五共和国这个概念，絲毫也不能說明問題。戴高乐主义体现了一种思想体系、一个宪法、一个人。这三位是一体的，不能分隔；然而后者却起着主要作用，因为没有戴高乐，戴高乐主义就无从說起。

从目前的活动来看，这个制度的性质已經不是議會民主制了，尽管它还不是法西斯主义。这个制度的实质在于保証实现戴高乐的权力。这是一种个人專权的制度。

这个制度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有三个支柱：即1958年9月28日的带有全民表决性质的公民投票和1958年10月4日生效的宪法条文以及一个无条件服从戴高乐將軍的政党，即操纵議會多数

① 指政治地位不高但有实权的壟断資本代理人。——譯者

② 《世界报》，1959年7月22日。

的保卫新共和联盟。

1958年9月28日，政府号召全体法国人民对宪法草案表示态度。当局称此为公民投票。事实上，投票者并没有对提出来的宪法条文表示态度，而只是对戴高乐在当时特殊政治形势下负责国家事务的领导表示赞同与否。这是一场用公民投票来作掩护的全民表决。同年10月在大选的名义下又举行了一次类似的全民表决，当时选民们投了保卫新共和联盟的票，但是，这次投票也并不是为了表示是否拥护这个政党的纲领。道理很简单，这个政党根本没有提出过任何纲领，选民投这个政党的票，仍然是为了表示赞同戴高乐。

在这以后，范围缩小了的选举团按照新宪法的条文把戴高乐推上了总统的宝座，这也只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因为十分明显，戴高乐赖以攫取总统大权的不是这场总统选举，而是9月28日的公民投票。正是这场全民表决性质的公民投票，才使戴高乐能够在议会之外的新宪法范围内扮演一个享有特权的角色。

另一方面，正像人们所指出的，1958年的宪法是为戴高乐而制定的，并且还是由他自己来制定的。这个宪法大大地扩大了共和国总统的权力，并且赋予行政权较之立法权要高得多的地位，从而使戴高乐在统治法国时，实际上不受任何监督。“戴高乐共和国的决定要素只是而且也只能是共和国总统。从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同时也就是法兰西共同体的总统来看，这一点就令人确信不疑。”^①一点也不错，如果说在共和国和“法非共同体”中国家元首的权力在法律上有所区别的话，那末“实际上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因为，共同体受着极端的总统制的统治^②，

① 雷蒙·阿隆：《永不变和不断变迁的》，第199页。

② 事实上，共同体的部长们并不对共同体的参议院负责，而是“总统的传声筒和执行代理人”。

在这里，国家元首几乎独揽决定一切的大权，他既是立法机构又是政府。这些巨大的特权显然大大加强了他在共和国的地位……我们不当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共同体的总统首先是在外交事务和经济事务方面可以发出不经部长签署而作出的决定，采取对政府和议会都具有强制性的重大措施。”^① 1958年12月19日所颁布的各项指令，则更进一步加强了共同体各个机构的专制性。

但是，仅仅就法兰西共和国以内的范围来说，宪法所赋予戴高乐的职权就已经和君主的权力不相上下了，并且已经有人把第五共和国和路易·菲利普的君主制度同等齐观起来。^② 事实上，“我们可以”把共和国总统“比作一世纪以前君主立宪制下的国王，或者比作波拿巴共和国总统亲王^③。他的任期是七年，除了对历史负责外，他不对任何人负责，除非犯了叛国罪，最高法院才有权对他加以审问。他享有任命总理之权，享有单独一人就可以决定解散国民议会，并把议会通过的法案提交全民表决之权，以及享有颁布特赦的大权，他还有权进行谈判和批准一切条约，同时，他还似乎有全权缔结军事协定，而且无须经由议会批准。在非常时期^④，他拥有一切权力并且由他本人决定僭居类似罗马时代的狄克推多^⑤的地位。”^⑥

① 莫里斯·杜章惹：《第五共和国的政治设施》。《法兰西政法学报》，1959年3月号，第110页。

② “归根到底，第五共和国具有奥尔良主义的一切特点。在某些方面，这正是加强了奥尔良主义，因为国家元首还拥有当年路易·菲利普所没有的两种特权：提付全民表决和在共同体方面拥有的权力”。莫里斯·杜章惹著。同上书，第109页。

③ 即路易·拿破崙。——译者

④ 这里指的是宪法第十六条。

⑤ 雷蒙·阿隆：《永不变和不断变迁的》，第193页。

1958年的宪法究竟提供了些什么条件使这种个人专权得以实现呢？这就是削弱议会的作用，使行政权完全脱离立法权的约束，并赋予行政权以超越地位。

共和国总统是由一个选举团选举产生的，因此他的选举再也不由议会决定。他有权任免总理，有权解散反对政府政策的议会。与此相反，议会的权力则被系统地削减了；由政府决定议事日程，政府拥有优先讨论它向议会提交法案的权利，国民议会的会议时间被缩短了，国民议会必须在七十天的期限内投票表决预算，如果超过这个期限，内阁会议就可以发布指令，颁布财政法规。只有在绝对多数而不是简单多数时才能够拒绝对政府的信任。“从今以后，政府方面为了使它交付议会的提案不致遭到否决，只要在该项提案问题上提出信任投票就万无一失了，因为国民议会只有在全体议员中联合了绝对多数的反对票才能把政府的提案否决掉；政府只要在议会中得到少数议员的支持，就不仅可以在法律上站住了脚，而且还可以借助于投信任票问题而占有一切治理政事的实际手段。”^⑦

此外，宪法还以规定行政和立法各有其独具的职权范围为借口，缩小了立法权的活动范围。“1958年以前，国民议会在各方面都有权制定法律。当年国民议会在制定一项法规时，它对政府行动先就作出了若干限制，因为按照宪法的原则，政府和行政机构的一切决定都不得超出法律规定的限制范围。既然政府的命令必须服从法律，因而也就必须服从议会。现在第五共和国宪法把这项所有的西方民主国家都予以遵守的规定擅加废

⑥ 狄克推多，古罗马（共和国时期）在非常情况下（战时或为了镇压人民起义），根据元老院的决议，被任命为执政官的人，在任期内掌握全权。

——译者

⑦ 莫里斯·杜章惹：《第五共和国的政治设施》。《法兰西政法学报》，1959年3月号，第118页。

除，說得更确切些，就是第五共和国宪法大大削弱了这种规定的意义。从此以后，只有在宪法列举的某些方面的范围内才能发挥作用，超过这个范围，议会无权过问，而政府却可以通过采取各项立法措施享有行动上的充分自由。总之，今后国民议会的职权已被局限于十分狭窄的范围之内。与此相反，政府则可以到处为所欲为。”^①

最后，宪法规定国会议员不得兼任部长职务从而在人们的心目中贬低了国民议会的作用。

把国民议会的作用降低到哑口演员的这种企图还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这是这个制度的逻辑的必然)，那就是1959年6月宪法委员会借口违反宪法拒绝同意：当政府成员在议会讲坛上发表声明之后，国会议员有就政府成员的声明进行表决的权利(这种表决纯粹是表态性的，对政府不起什么影响)以及国会议员可以就简单“决议”进行讨论和表决的权利，这种所谓简单“决议”就是国会议员和参议员希望政府就某一特殊事项作出决定时加以考虑的一种文件。

此外，戴高乐还郑重地警告过国民议会不得企图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他在1958年10月24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这样说道：“议会停止活动几个月之后，将重新恢复，但已不再是全权的了。如果不幸，未来的国民议会不愿适应分配给它扮演的角色，毫无疑问，共和国将再度陷入危机，而且任何人都难以想像它将产生什么结果，除非是在一段长时期内把议会制度根本铲除。”^②

威胁是十分明显的，这也清楚地说明了戴高乐制度的本性

① 莫里斯·杜章惹：《第五共和国政治设施》。《法兰西政法学报》，1959年3月号，第119页。

② 《世界报》，1958年10月25日。

和实质。戴高乐制度的建立主要是由于对工人阶级的恐惧，对人民的畏缩。对民主的严重的蹂躏也表现在共和国总统的选举方式、选举议员的选举法和加强参议院的作用上。^①

戴高乐宪法系统地加强了行政权力，削弱了立法权力，并且使后者从属于前者。诚然，宪法规定了政府必须向议会负责，而且在理论上也赋予国民议会以多数通过弹劾案或者是在一般性的政治辩论中拒绝对内阁总理的信任来推翻政府的权力。但是事实上，这些规定并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一方面，政府可以用解散议会的威胁手段使执拗的议员就范，另一方面，而且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1958年的选举是在反民主的选举法下进行的，这次选举排挤了劳动人民的代表，使唯戴高乐之命是听的保卫新共

① 莫里斯·杜章惹公正地指出，戴高乐制度的五个重要机构：共和国总统、政府、国民议会、参议院和宪法委员会，其中国民议会是唯一由全民直接普选产生的。总统由选举团产生，选举团包括：参议员、议员、省议员、市议员以及三万居民以上市镇的市议员所选出的代表，即“保守的”乡村市镇所构成的多数。在两千人口以下的市镇有一千六百万法国人可以选出三万九千名选举总统的代表，在两千人口以上的市镇有两千七百万法国人却只能选出三万三千五百名代表。

参议员选举团的组成更不平等。一千五百人以下的市镇占有参议员选举团的百分之五十三，并在共和国总统选举团中占有百分之五十一。同1946年的宪法相比较，戴高乐宪法却加强了参议院的作用。参议院“起着凡尔赛人在1875年赋予它的这一作用：牵制国民议会所体现的普选意志”。

就这样，通过对宪法的修改，参议院具有与国民议会同等的权力。“生活在一千五百人以下的市镇的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实际上能够左右对宪法的任何修改”（莫里斯·杜章惹：《第五共和国的政治设施》。《法蘭西政法学报》，第130页）。

这种在各项选举中对城市工人阶级代表权的剥夺也表现在唯一属于普选的议员选举中。为1958年10月国民议会的选举而制定的选举法，使在第一轮选举中仅得到三百六十万三千九百五十八张票的保卫新共和联盟获得了二百十个席位，而得到三百八十八万二千二百零四张票的共产党却仅获得了十个席位。

和联盟的代表选入議會，构成了議會的多數。1959年7月保卫新共和联盟总書記夏朗东这样宣称道：“我們为將軍服务，虽然他并不直接指揮我們。我們是將軍的工具，但是將軍并不是我們的工具。”^①在另一項声明里，他又宣称：“戴高乐將軍是我們的幕后領袖。我們所处的地位有些像地下工作人員的地位，地下工作人員必須无条件地服从他們的軍事領袖，然而如果事情进行得不妙，軍事領袖就可以矢口否认他和我們有关系。”

但是，一个制度究竟如何实践要比紙上的条文更能說明問題。宪法条文怎么規定是一回事，如何运用这些条文則又是另一回事，在評價一个制度时，后者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初第三共和国怎样运用1875年的君主宪法，我們早已見識过了。如今在戴高乐担任总統的情况下，这种运用更进一步地加强了共和国总統的作用，削弱了国民議會的作用。

戴高乐政权是由全民表决产生的，因此新制度一出现时，戴高乐就立即有恃无恐地运用各項政治措施，来为他自己提供一切可能性，以便对国家进行个人統治。一个法学家这样写道：“国民議會第一屆會議剛一开幕，共和国总統就向議會提出了一項咨文。这种姿态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他打破了第三共和国和第四共和国的慣例……咨文上的語調更甚于此：国家元首向議會‘表示了他的信任’并且作了一系列的指示。总理这个人物也仅仅是个摆设而已；大家都知道米歇尔·德勃雷之所以蒙受戴高乐的青睞，其决定性原因是由于他的忠誠。事实上，德勃雷內閣是一个‘总統制內閣’。这一点，爱丽舍宮发表公报宣布德勃雷組閣时在措辞上十分明显地表露出来：‘……戴高乐將軍已經責成米歇尔·德勃雷先生并向他提出有关組閣的建議……米歇

^① 《对蘭斯市保卫新共和联盟干部的講話》。《世界报》，1959年7月21日。

尔·德勃雷先生已經将他在一一般政策方面的观点以及內閣組成后全体閣員的名单提請戴高乐將軍批准’。这个文件的每一句話、每一个字都可以叫人看出它出自国家元首的手笔。在这里，对宪法的解釋显然是由一切服从总统意志为出发点的。总理采取些什么政策必須經由共和国总统批准，总统对每一个部长人选都具有最后决定权……。

“在同一个意义上，戴高乐决定让各个国务秘书参加內閣會議；这种决定表明了戴高乐企图使由他担任主席的这个机构成为政府的活动中心，因为这样一来內閣的作用大为降低，它仅仅为會議作准备工作而已。在內閣會議上，总统的意旨高于一切；1958年6月到12月，政府的一切活动实践^①并没有过任何改变。法国目前正受着戴高乐將軍的个人統治。”^②

以上这段話，是一个拥护必須具有民主精神的总统制的法学家在1959年初說的”值得重視的是它指出了目前这个制度一开始就是以个人专权制度出現的。这是关于戴高乐制度的唯一恰当的定义。有时有人把这种制度称之为“事实上的总统制”，这是借助于术语，更确切地說，借助于法律虚构来掩飾这个制度的政治实质。实际上也是招认了个人专权的事实，因为1958年的宪法条文并没有从法律上确立真正的总统制。而戴高乐制度的活动却越来越証实了这个个人专权的事实。

共和国总统的地位在削弱內閣总理的权力下，更显得重要。內閣总理只能处理一些次要的問題，而像对外政策，共同体和阿尔及利亚等重大問題都由国家元首决定。在正常情况下属于內閣的权力已轉移到戴高乐担任主席的几个“专门會議”：已經設

① 即戴高乐上台后到戴高乐被选为总统前的一个阶段。——譯者

② 莫里斯·杜章惹：《第五共和国的政治設施》。《法蘭西政法报》，第112—113頁。

立的这种机构有1960年2月底成立的“阿尔及利亚事务委员会”，该委员会仅由三个部长组成；另外还有1960年3月成立的“农业事务委员会”和“外交事务委员会”，后者以戴高乐为主席，成员有总理、外交部长、总统府秘书长和外交部秘书长。尽管议会的权力已大大地被限制，但仍不断地被剥夺。1960年2月戴高乐授权可以在十四个月内不受议会任何形式的监督而颁发有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任何命令，甚至于制定法案。然而这些权力并不像过去法案所规定的那样，转交给政府首脑，即德勃雷，而是转交给国家元首，即戴高乐本人。当国家元首拒绝了多数议员在合法程序下提出召集议会紧急会议的要求时，那些曾于1960年2月4日^①同意授予戴高乐特权的政党领袖和议员们还有什么理由表示惊奇呢？必须知道，戴高乐的拒绝是这个制度的逻辑演变的必然结果，在这个制度里，独揽大权的国家元首高高处于国民议会和社会舆论之上。这一点已经由1960年4月17日的法令进一步加以肯定。这个法令剥夺了议会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而政府则有权在十二天内宣布“紧急状态”，并在“紧急状态”宣布后，可以任命一切它认为合适的人员，将有碍于它行动的任何人驱逐出境，下令封闭集会场所，控制一切性质的报刊和出版物，并将平时由民事法庭审理的轻罪案件罪犯提付军事法庭审判。

这就是目前统治法国人民的制度在政治上的主要标志。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哪些势力是这个制度的经济和社会支柱呢？

^① 指国民议会特别会议根据德勃雷内阁的要求而授予政府“特别权力”的法案。这个法案使政府在“维持秩序、保卫国家和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绥靖和施政”的借口下有权根据戴高乐宪法第三十八条用颁布命令的方式越过议会采取“必要措施”。——译者

第二章 大銀行的政府

任何一个反民主的制度总是害怕被人揭穿它的真面目。戴高乐本人以及所有资产阶级的报刊将戴高乐描绘成“超政党”的人物，或者用戴高乐分子所惯用的术语来说，戴高乐是“超集团的”，这就是说，戴高乐超乎构成整个民族的各社会阶级之上。根据这种胡言乱语，似乎只有民族的利益才是戴高乐一切活动的唯一指南。1959年1月8日，共和国的新总统把新制度说成是赋予法国的“意外的机会”，它使法国“从疑惑、分裂、屈辱中解脱出来……，使共同利益处于一切特殊利益和各种偏见之上”。社会党对传播这种无稽之谈起了很大的作用。1958年12月22日，当戴高乐被选为共和国总统之后，《人民报》这样写道：“重大的结果表明，虽然在立法选举活动中出现了各种各样舞弊行为，但是，对于法国政治舆论界来说，戴高乐将军的名字高居于各个政党之上。他今后所要完成的任务也正是这样。”

一年之后，摩勒更露骨地说：“我坚信，戴高乐将军一定会继续发挥这个伟大的独立自主，从而使他变得强大而有力，而且我还坚信，他不会为了替特殊集团利益服务而去损害整体的利益。”^①

关于戴高乐是超阶级人物的这种胡言乱语构成了个人专权制度的主要思想支柱。

对这个問題应如何去理解呢？

^① 見1959年11月5日《人民报》社論。

家 族 关 系

戴高乐因母亲的关系而同北方財团中的几个大家族，如馬伊奧·德魯累、科耳布·貝尔納、居斯塔夫·德科尔比有密切的联系；他通过妻子同加来餅干公司的旺德魯家族（僱佣二百五十个工人的法国旺德魯餅干工厂）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而旺德魯家族則同极为重要的貝諾耳与法戎鉛笔工厂老板法戎家族有着亲屬关系。

北方工业資产階級的各个企业之間保持着密切的家族联系，他們信奉天主教，以反动著称，并且具有强烈的階級偏見，戴高乐的整个政治活动都得到他們的支持。1947年，戴高乐的內弟旺德魯以及特别是紡織工业巨头莫特^①都曾經是法兰西人民联盟領導机构的成員。北方資产階級参加了促使戴高乐攫取政权的陰謀。在5月13日前些时候，一个原名叫安德烈·德瓦夫兰的帕西上校（他本身也是北方財团的成員）代表北方財团提出了实施总統制宪法草案。但是就安德烈·德瓦夫兰而言，他和国际性的金融資本有密切联系：他是烏尔姆銀行的代理人，維希政府的主要部长都是由这家銀行推荐的。此外，帕西上校还是由烏尔姆銀行和洛希尔銀行所共同建立的极为重要的法朗加勒普石油公司的視察員。德瓦夫兰又是“廉价”百貨公司的董事。另一位戴高乐分子夏朗东也是这家公司的董事。人們十分熟悉萊翁·德耳貝克在发动阿尔及尔暴乱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②他是由北方財团支付薪金的代理人，首先是紡織巨头的代理人；他

^① 貝尔特朗·莫特是北方最重要的企业之一的阿加希公司的董事，他又是科罗纳顏料公司和发隆西恩制瓦厂的董事。只是他在1958年未加入保卫新共和联盟，而仍留在“独立党”內。

曾是法兰西人民联盟在北方的基金收集者，在法兰西人民联盟解散后，他又在一家紡織公司里当經理。

然而，更重要的是戴高乐和大垄断资产阶级的亲属关系。戴高乐的兄弟皮埃尔·戴高乐曾是巴黎联合銀行的副經理。他在逝世前担任許多公司的董事长和董事，其中几家在非洲和德国都拥有不少利益。^③巴黎联合銀行是法国金融資本和法国帝国主义的統治集团之一。它在法国經濟活动的各个部門（諸如銀行、保險公司、投資公司、交通運輸、黑色金屬、冶金、公共工程、石油、化学、矿业等等都有他的利益）。

巴黎联合銀行的利益与戴高乐对欧洲和对非洲的政策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因而，这家銀行在欧洲共同市場的利益特別值得注意；巴黎联合銀行和比利时一家势力雄厚的大銀行——比利时通用銀行联合在一起，并在德国采煤业（莱因矿业公司）中拥有股权。这家銀行在石油业方面的活动十分广泛，并在北非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在法国石油公司的投資仅次于巴黎荷兰銀行而名列各銀行集团的第二位，它积极参加法国爭夺石油的各项活动，并在法国燃料公司以及为开采撒哈拉石油而創立

② 德耳貝克吹嘘他在阿尔及尔暴乱中所起的作用。1958年7月6日，他在里尔的社会共和党人的集会上这样宣称道：“一点不錯，我是五·一三事件的組織者。鉴于当时职务的关系，我被邀請参加了这些旨在反对共和国和共和制度的阴谋，警察当局知道这些阴谋，但是他們毫无办法。我的任务在于选择有利的地点和時間使人們在暴乱发生时，求助于戴高乐將軍。”

③ 皮埃尔·戴高乐曾是蔚藍色之岸大不动产公司和法国金矿工业公司（科米諾）的董事長。他是非洲不动产和金融公司的董事，該公司在乍得和赤道非洲的其他企业拥有股权。同时，他又是繆耳迪普勒克斯公司的董事，这家公司生产鑄面板并控制讓提耳港的非洲鑄面板公司和梅翁貝木材公司；此外，他还是經紀与保險公司的董事，該公司在德国（巴登—巴登的兩家保險公司）和非洲持有股权。

的几家公司(菲納勒普和奧尼勒克斯)握有股权。虽然如此,但促成該銀行具有如此强大力量的主要支柱之一的是它在北非所占的地位。在摩洛哥,它的势力虽已很强大(拥有一半的錳矿,一部分鉛矿和銅矿……),但仍弱于巴黎荷兰銀行,而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它却占着首屈一指的地位;它几乎掌握了全部的鉄矿,絕大部分的磷酸盐矿,部分鉛矿和一部分矿物肥料以及軟木和一部分鉄路;此外,它和阿尔及利亚首家私人銀行、在各行业中都拥有优势股权的阿尔及利亚信貸与銀行公司联結在一起,控制了阿尔及利亚的經濟生活。

为了闡明戴高乐主义的对內和对外政策,我們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巴黎联合銀行在势力雄厚的諾貝尔一波才尔化学公司里还拥有利益,后者系由諾貝尔公司和波才尔一瑪萊特拉公司合并而成,法兰西人民联盟的經費就是由这家公司正式撥給的;巴黎联合銀行还和金融資本的兩家极为重要的垄断集团联結在一起,一家是溫台尔集团,它通过孀妇戴馬希銀行而在巴黎联合銀行中握有股权,另一家是許奈特集团,这个集团的銀行,即欧洲工业与金融联合銀行,它是兩者的媒介,因为巴黎联合銀行在欧洲工业与金融联合銀行內也握有股权。此外,巴黎联合銀行集团和許奈特集团还参加近几年来在法国进行的資本集中的巨大运动以及加强金融寡头之間的联系,这种联系已超过巴黎联合銀行集团和許奈特集团个人之間的联系范围了,而戴高乐的命运与統治着上述兩個集团的各家族也紧密的联結在一起:戴高乐的儿子因为娶了亨利厄特·德·蒙塔郎貝为妻而进入了溫台尔家族,戴高乐的女儿因为嫁給了阿兰·德·波瓦西厄也踏入許奈特家族的門庭。德·波瓦西厄家族实际上与許奈特家族完全結成一体。阿尔培·德·波瓦西厄(戴高乐女婿的堂兄弟)是欧洲工业和金融联合銀行的主席,并且是这个集团里

許多企业的董事（克勒佐鋼鐵公司、工程工业公司、法国保險总公司、里昂工业投資联合公司、北美公用事业公司、西部加拿大石油公司等）。

德·波瓦西厄家族的另一成員米歇尔是龐納罗雅公司的秘书长，并且是在龐納罗雅公司拥有股权的英国古托文父子商行的董事。从米歇尔和龐納罗雅这根綫出发，我們就会接触到洛希尔垄断集团，关于这家集团，我們以后还要經常提到。

顧 問

然而，家族联系还不足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因为人們經常可以与他的階級断絕关系。更重要的是看他接近的是哪一些人以及他把国家的領導职务托付給哪些人。这里，和哪方面发生联系不再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得不如此这般，而是取决于自己。事实上，戴高乐在他的整个政治活动中对高級金融界人物向来是特別加以青睞的。1943年，戴高乐在阿尔及尔的时候，他所信賴的是哪些人呢？是顧夫·德莫維尔，他是我們下面就要談到的威尔弗德·波姆加納的表兄弟，他的妻子是施威斯格斯家族的成員，因而他就勾結上了米拉波銀行和巴黎联合銀行。他的岳父皮埃尔·施威斯格斯和米拉波是姻亲并且是米拉波銀行的投資人，皮埃尔的兩位兄弟，亨利和查理·施威斯格斯的情况也和他一样，其中查理还是馬格列布面粉公司的董事。

其次是勒魯阿·博利厄，他是当时在阿尔及尔的法国全国解放委員會所屬粮食供应局的負責人，1958年他受命为毛里塔尼亚铁矿公司的董事长和總經理，在这家公司里，洛希尔集团联合了法国几家主要鋼鐵公司，德国炼鋼垄断資本，一家意大利垄断集团和英国黑色冶金工业而占据了領導地位。此外，保尔·勒

魯阿·博利厄目前又是“西代特克”投資与新技术公司董事长和北方投資公司董事,这两家公司都属于洛希尔集团。博利厄还担任邓祿普輪胎公司的董事。洛希尔集团以及世界性垄断資本就是这样确立了对阿尔及尔的影响,这个影响由于出现了众所周知的第三个人物勒內·迈耶而愈益加强。勒內·迈耶是戴高乐在阿尔及尔时十分信賴的顧問。戴高乐重新掌握政权后,迈耶仍然是戴高乐的顧問。1958年10月17日,一家名叫《法兰西財富》的金融周报就是这样指出的。它写道:“戴高乐將軍十分尊重和信賴勒內·迈耶。他經常和勒內·迈耶通信,和他会面……勒內·迈耶先生仍然是顧問,戴高乐越来越多地征詢他的意見”。1959年勒內·迈耶辞去了“欧洲煤鋼联营”主席的职务,以便在一系列垄断集团和大公司中代表洛希尔的利益。正像我們即将看到的,这些垄断集团和大公司在电气、石油、有色金属等方面占有相当地位,而往往是占据着統治地位。这些垄断集团和大公司,它們在比利时、法国、非洲(比利时剛果和撒哈拉)控制的企业构成了“共同市場”和“欧非共同体”最坚强的支柱之一。

在三个月期間(1957年底至1958年初)勒內·迈耶被任命为比利时世界性的“索菲納”持股公司、欧腊弗勒普持股公司以及“勒尼克耳”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他又被任命为里奧一丁多公司、米兰金融信貸銀行以及西班牙凤凰联合公司的董事。由于勒內·迈耶在索菲納公司(洛希尔—朗貝尔集团和拉薩尔集团正在爭夺对这家公司的領導权)和欧腊弗勒普公司(拉薩尔銀行在这家石油公司占着主要地位)任职而使他目前在国际金融資本界以及在实现欧洲托拉斯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这次任命意味着在“共同市場”內相互竞争的洛希尔集团和拉薩尔集团之間取得了一定的協議。

法国解放后，戴高乐任命了哪位做财政部长——控制全国经济生活和建设的重要部长呢？戴高乐选中了埃梅·勒佩格^①。这个人从1923年起就为许奈特家族服务，他以担任欧洲工业与金融联合银行驻捷克服务处的经理开始，也就是许奈特集团利益在捷克的代理人，他还担任斯果达各厂（武装欧洲的主要工厂之一）以及布拉格矿业和铸铁公司的董事，之后，他又任欧洲工业与金融联合银行总经理，同时，在许多公司的董事会里兼职，他的活动已扩展到各个方面。1945年戴高乐内阁吸收了罗西埃家属的布隆先生，他是“天道”保险公司和苏伊士运河公司（包括巴黎荷兰银行在内的几家法国主要的势力雄厚的金融集团组成了这家公司的领导核心）的代表，此外，在戴高乐内阁里还有米拉波集团的多纳迪厄·德瓦布腊和勒维·米勒普瓦侯爵（后者是与许奈特有姻亲关系的西班牙一大贵族之子）以及德米里贝耳小姐，这位小姐是麦克马洪的后裔，因家庭关系而与大金融集团有密切联系。

1947年，当戴高乐建立法兰西人民联盟时，他并不满足于依赖那批一直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客们，他直接向金融寡头本人求援。宣传的费用由一家协会负责收集。这家协会的热心家有：阿兰·波才尔（原名让·里舍蒙，父亲是业主联合会副主席），波才尔—玛莱特拉公司主席，这是一家势力很大的化学工业公司；约纳斯，里昂信托公司主席和管理洛希尔事务的蓬皮杜。

在金融资本人物当中公开支持法兰西人民联盟的，除了上述几个人以外还有：银行的领导人（巴黎联合银行的皮埃尔·戴高乐和银行联合会主席皮埃尔·勒蓬；洛希尔银行全权代表雷

^① 就任后不久他就是一次汽车车祸中丧了命。

諾·費永；馬賽·佛里埃，他是私人动产銀行的全权代表和“解放了的巴黎人”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和總經理）；保險公司的領導人，如都市人寿保險公司經理迪特耳姆；百貨公司的領導人，如“廉價”百貨公司董事長博瓦斯代（“廉價”百貨公司董事会是戴高乐分子的真正稜堡，1959年，因为德瓦夫兰和夏朗东也是董事会的董事）；化学工业几家主要大公司的領導人，如萊翁·諾埃爾，他是罗尼—普朗克公司和地产信託銀行董事；汽車业方面有西姆卡公司的領導人皮果濟；航空业方面有达索耳特；航海方面有雅克·达伊烏，他是弗萊西奈集团巴盖公司的秘书长；紡織业方面有莫特；广告业方面有浦布里西斯公司的布勒斯坦—布朗歇；殖民地企业方面有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地产信託公司董事雷蒙·布尔热，以及阿尔及利亚電車公司的保尔·歇利。

洛希尔集团的第一流人物担任法兰西人民联盟财务主任的这个事实更清楚的表明了洛希尔集团对戴高乐主义特別感到兴趣而且也是对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支持。雷諾·費永受托管理法兰西人民联盟的财务。他曾担任过洛希尔銀行經理，目前，他是势力雄厚的北方投資公司、龐納罗雅矿业与冶金公司、电气机械公司、毛里塔尼亚鉄矿公司、庫尔曼公司以及法国鈾矿公司的董事。这些公司全部或部分均被洛希尔集团所控制。

当人們了解了这些以后，难道还会对下面这个事实感到惊奇嗎？即1958年5月24日，当戴高乐认为形势有利于他“攫取共和国权力”时，他的第一項活动就是給洛希尔銀行總經理蓬皮杜打电話，邀請他来領導戴高乐办公厅的工作。①

① “戴高乐將軍在科龙貝获悉了科西嘉暴乱后，立即打电話給国务委员会名誉查案官、洛希尔銀行總經理蓬皮杜，邀請他建立內閣总理办公厅。”（默里·与塞舍·布隆貝惹：《5月13日的十三个陰謀》，第354頁。）

政 府

1958年6月1日，戴高乐建立了个人专权以后，已不再是金融資本滲入政府各个委员会的問題了，而是真正的涌入。只有回顧維希政权，我們才能够在国家机器主要的机构中，即在政府中，重要的行政組織中和政策机构中，发现有如此众多的垄断資本的成員。

戴高乐內閣（1958年6月1日到1959年1月）中的主要职位系由蓬皮杜所盘踞，他掌握并控制着政府的整个活动。

蓬皮杜，換句話說，即洛希尔銀行，他对戴高乐政府从1958年6月1日到1959年1月这期間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法兰西晚报》1959年1月9日写道：“在七个月期間，戴高乐將軍的政府頒布了三百項法令，实施了十一項重要改革，这些法令和改革严重地破坏了法国的政治、經濟、社会和文化生活。政府首腦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內，都是由一个人在旁协助工作。大家很少談起这个人物，这个人也很情愿处于这种隱姓埋名的地位，但是，实际上，他是馬提尼翁公館^①里的首要人物，这就是蓬皮杜先生，他当过大学教授和国家顧問，在1944—1954年期間，他是戴高乐最信賴的一个顧問，并且也是戴高乐最亲密的合作者”。

同洛希尔集团一起的，还有巴黎一米拉波联合銀行集团（米拉波銀行于1953年和巴黎联合銀行合并），这个集团以外交部长顧夫·德莫維尔为代表，我們在阿尔及尔时代的戴高乐政府中

^① 馬提尼翁公館位于巴黎瓦勒訥路，建于1721年，現为內閣會議集会地。

已經遇到过这个人物；此外，还有拉薩尔集团，这个集团以国务部长路易·雅基諾为代表，他的妻子拥有拉薩尔銀行20%的股票。这个集团特別具有世界性，因为它与倫敦和華盛頓的拉薩尔兄弟銀行联結在一起。在法国的經濟生活中它还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是巴黎荷兰銀行和东方汇理銀行的股东（这两家銀行是法国帝国主义的兩個主要支柱），同时，拉薩尔集团还在石油公司（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加拿大鷹牌油公司……）、商船（联合航运公司，弗萊西奈—法布尔公司，法国邮船公司）、造船（地中海造船和鑄鉄公司，普罗旺斯造船厂）、汽車（雪鉄龙公司）、水泥（波利埃与紹松公司）、保險公司（法国联合公司）等方面持有股权。而且，这个集团早在戴高乐在倫敦进行活动的年代里就已經和他建立了密切联系，正像某些回忆录的作者^①所指出的，这个联系主要是通过靠拉薩尔集团发家的让·摩納和普利文作媒介而建立起来的。

巴黎荷兰銀行以教育部长让·貝端为代表，貝端是莫尔諾的女婿，后者是巴黎荷兰銀行里的重要人物，他主要是管理該銀行在北非的利益。

看起来，只有一家大銀行即东方汇理銀行沒有在政府中占据什么部长席位，虽然这家銀行同巴黎荷兰銀行是联結在一起的。

这个空自由瓦列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所填补，他担任德勃雷政府駐財政部的国家秘书。这是一位依靠其姻亲关系和其直系亲屬的地位而成为金融寡头的典型代表人物。（他的妻子阿娜·德·布隆特是欧热尼·許奈特的孙女。）他的祖父巴尔

① 見普隆書店根据哈里·霍普金斯手稿出版的《罗斯福回忆录》，第1卷，第215頁。

杜作过多姆山省的議員，在第三共和国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他曾經掌管过在远东和非洲的許多矿业公司^①。他的父亲爱德蒙·吉斯卡尔·德斯坦目前是东方汇理銀行所控制的全部或大部分銀行的董事长或董事。^②

吉斯卡尔·德斯坦一家与信奉天主教的金融寡头联結一起（爱德蒙是天主教救济会副主席和法国全国业主委员会常务委员），这样，天主教金融寡头就和信奉基督教或以色列教的金融寡头一起参加了政府：从天主教金融寡头的殖民地利益和它的方針来看，它和其他的寡头一样，既是帝国主义性质，又是世界主义性质的（爱德蒙是国际商会法国委员会主席和欧洲經濟合作联盟法国委员会主席）。

由此可見，法国所有大銀行集团——洛希尔銀行、巴黎联合銀行、巴黎荷兰銀行、东方汇理銀行和拉薩尔銀行——在各个政府委员会里都有代表。

因此，我們得出的第一个重要結論就是，在將軍个人专权的背后隐藏着銀行家的个人专权。我們认为实际上可以将目前戴高乐政权归納为这样一个公式：戴高乐执政，垄断資本統治。

1958年6月2日到1959年1月期間，戴高乐攫取了統治国家和

① 他是卡蒙錫矿公司的董事长，远东錫矿管理公司副董事长，又是摩洛哥总公司、博尔卡拉矿业公司、东京錫矿与錫矿公司和北北电气、煤气与自来水公司的董事。

② 爱德蒙·吉斯卡尔·德斯坦在高级商业贵族界担任下列职务：法国与海外領地金融公司、印度支那热带作物公司、印度支那駁船与拖船公司董事长，此外，他又是印度支那造纸公司、印度支那地产信贷銀行、印度支那抵押信贷銀行、西非地产信贷銀行、馬达加斯加香料植物公司、馬达加斯加作物公司、摩洛哥糖业公司、湯姆遜—豪斯頓公司、洛林—呂納維尔公司、貝古南公司、洛林炭公司、比利时貝古南公司、航海工业公司、法国航空公司和洲际航空运输公司等公司的董事。

准备新宪法的全权。在这个时期以后，戴高乐当上了共和国和共同体总统时，他就挑选了德勃雷担任他的内阁总理。

戴高乐内阁和德勃雷内阁，从它们的组织成分来看，唯一的不同是蓬皮杜已不再是政府成员了。但是，他的影响继续存在。1959年1月9日《法兰西晚报》写道：“蓬皮杜先生去年5月应将军的邀请，辞去了私人企业的职务而担任了将军办公厅的主任，今天他又恢复了私人企业的职务。但是，这对谁都不是秘密，他只是半引退，而且他和共和国新总统仍保持着密切联系。”

而且，戴高乐还任命蓬皮杜为宪法委员会委员，以便使蓬皮杜有权对在他领导下所制定的宪法的严格贯彻加以监督。

戴高乐之所以选中了德勃雷为“他的”总理，不仅是由于他认为德勃雷是一个忠实的执行者，而且还由于德勃雷本人也是个金融寡头中的人物。德勃雷是两家公司（中非工业公司和佩皮尼埃房产公司）的董事。尤其是他的继母（她嫁给德勃雷的父亲，是第二次结婚）是萨比纳·德·温台尔的女儿，佛郎索瓦·德·温台尔的孙女；德勃雷的异母姊妹尼古拉·德·拉絮·圣一热妮斯男爵夫人的丈夫是电气大托拉斯法国汤姆逊—霍斯顿公司董事长。德勃雷的叔父雅克·德勃雷是电话工业公司董事长，这家公司由势力雄厚的电气总公司所控制，此外，他本人还是许多机械工业和电气工业公司的董事。^①

除了金融寡头本身的代表之外，戴高乐—德勃雷政府里还有些什么人物呢？有和金融资本联系的官员，有以保证人身份出现但都执行着大资产阶级政策的中等资产阶级的代表。

头一类人物有皮埃尔·居约马，他在1960年1月前担任武装

^① 这些公司是：现代机械公司、固定和牵引蓄电池公司、法国无线电器材厂、工业研究与发展公司、西特橡胶公司和现代精密仪器公司。

部队部部长，以后任总理的全权部长。他是矿业工程师并以这个身份在许多石油公司里充当政府代表（他是色列普特公司和石油勘探局主席），在这些石油公司里，他和私人资本建立了联系：他担任法国石油运输公司的董事，这是一家公私合营的企业，国家拥有百分之三十的资本，而私人资本包括德雷福斯公司、德马赖兄弟公司、圣一哥班公司以及给该公司提供董事长的乌尔姆银行等却占有首要地位。居约马为了保持他所担任的职位，除了执行垄断资本的政策外，他还能做些什么呢？此外，皮埃尔·居约马还委任前阿尔萨斯石油勘探公司（普勒帕公司）董事皮埃尔·德普雷里为他的办公厅副主任。德普雷里是赤道非洲石油公司副经理，他在1958年12月被任命为法国国营石油勘探金融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

同一类人物还有：担任驻阿尔及利亚全权代表的德鲁弗里埃。他的主要政治活动是从摩纳（拉萨尔集团）那里开始的，以后又在勒内·迈耶（洛希尔集团）手下做工作。他是经济视察员，他曾先后在埃梅·勒贝格、普利文和迈耶等历届内阁担任阁员。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第二类人物即不代表金融寡头的工业资产阶级方面的人物。为首的是比内，他是圣夏蒙制革工业工厂主，皮革制造业全国公会副主席，他一直到了1960年1月担任戴高乐和德勃雷政府的财政部长^①。还有米歇尔—莫里斯·博卡诺夫斯基，他曾担任过负责内务的国务秘书，以后又担任邮电部长，他是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联系人^②。农业部长亨利·罗

① 比内是安托万·比内公司和富勒提埃公司的唯一经理，又是辛托斯坎（植物皮革）公司的股东。

② 第三共和国部长莫里斯·博卡诺夫斯基的儿子莫里斯·博卡诺夫斯基属于德拉吕克斯—博卡集团，这个集团控制着（巴黎、德维尔、戛纳和尼斯）的布

歇罗，他拥有三家建筑材料公司，一家起动机輪緣工厂，而且他是法国生产后一种器材的唯一工厂主（他部分承包四家大汽车公司上述器材的生产），此外，他还拥有数家农场和农业公司。负责工业和商业的国务秘书約瑟夫·丰塔內，他是食品工业的小工业家。馬克斯·弗萊歇，他曾任戴高乐內閣国民經济和对外貿易的高級專員，以后至1960年1月止又在德勃雷內閣負責經济事务的国务秘书，他拥有兩家共有五百八十个职工的制帽工厂，該工厂在帽品輸出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弗萊歇工厂占法国帽品輸出的45%）。这些資產階級成員对垄断資本或多或少保持着一定的独立，他們的基本作用（这一点在比內身上特別明显，他是这批人物中唯一担任重要部长的人）在于既执行金融資本的政策，又能同时获得中等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的信任，而后兩者在經济利益上是和大垄断集团有矛盾的。

在这一点上，最能說明問題的是，1959年9月底戴高乐同比內发生意見分歧时，比內的財政部长职位就于1960年1月由法兰西銀行行长威尔弗里德·波姆加納所頂替。这位行长，从他的出身来看，隶属于基督教系統的大資產階級，并且与金融寡头有密切联系；他的妻子是艾納斯特·麦西埃的女儿，而麦西埃是石油和电气方面的巨头之一，关于他的情况，我們下面还要談到；行长的兄弟里查娶了麦西埃的另一个女儿为妻，里查控制着許多势力雄厚的石油公司（他是法国石油公司、法国炼油公司董事及里尔一波尼埃与哥倫布公司主席），他同时还是电气工程公司的领导人（他是阿尔薩斯机器制造公司、阿尔斯多姆公司、电

朗百貨公司、博卡一蒙珀利埃公司、博卡一里尔公司、卡尔哈公司以及一系列紡織和加工公司（斯特拉斯堡、普瓦提埃、里摩日、蒙貝利亞尔、阿耳比、魯貝、拉罗舍耳、岡、馬賽等地的紡織和加工公司）。米歇尔·博卡諾夫斯基本人則是博卡一諾沃太經理和西特录音公司的董事。

力和电灯公司和絮德内公司的董事及法国原子公司主席);行长的另一位兄弟菲利浦通过婚姻关系和阿尔萨斯资本家的道尔夫斯大家族建立了联系,这个家族控制了道尔夫斯—弥格纺织托拉斯(道尔夫斯—弥格棉纱公司)并在里查·波姆加纳任董事的阿尔萨斯机器制造公司里拥有利益。

委 員 会

单单举出垄断资本的代表们如何盘踞政府部长职位的例子,还不足以说明戴高乐主义这个典型现象的规模;因为戴高乐主义还意味着金融寡头广泛地涌入国家机构。

除了现任的各部部长之外,为了解决不断出现的各种重大的经济问题,还建立了各式各样临时性的委员会,金融寡头的主要成员都参加了这些委员会。由于这种委员会的建立,这些金融寡头的主要成员就能够在经营他们所主管的各个企业公司的同时,直接决定政府的经济政策。

1958年9月30日,比内所建立的鲁埃夫委员会就是属于这类性质的。这个委员会确定了戴高乐政府在1958年12月所采取的各项经济措施的每一个细节。而以比内为名的财政部长则担负起执行这些措施的任务。

这个委员会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呢?有经济专家鲁埃夫,他从来就是金融寡头政策的执行者,1928年他曾经担任过普恩卡尔的“顾问”,1935年又担任过拉伐尔的“顾问”,在人民阵线时期,他却辞职了;还有纪努,他在战前是《冶炼业工会日刊》的领导人,并担任过法兰西业主总联合会的主席,他的岳父是艾利克逊电话公司、格农钢铁公司董事长,卢昂高炉公司董事。除了这些钢铁垄断集团的代表外,还有像居伊奥之流的高级银行的代

表，他是拉薩尔銀行副經理；还有洛兰，他是总公司的董事长；其中尤其是拉烏尔·德維特里·达沃庫，这是一位金融資本的重要人物，他是巴黎荷兰銀行董事，貝西奈制鋁和化学工业大垄断公司董事长，法国石油公司、諾貝尔一波才尔公司、无綫电报总公司、电气总公司、霍奇斯—布兰特等公司的董事。

从此以后，德勃雷內閣就經常运用委员会这个制度。委员会也决定政府对装备工业的政策。德勃雷在1959年5月29日召集机械工业代表举行了一次會議。該业业主联合会的报刊《机械工业》关于这个會議作了如下的报道：“許多年来，我們联合会的工作不是仅仅简单地考虑会员們的合法利益，而且还考虑到米歇尔·德勃雷先生所强調的全国的利益，而且不止一次地就这一点作过說明。目前，我們的行动应该取得初步成果了，而且还应该在政府部門和本会会员的协助和支持下，制定一項具体而又有效的行动綱領，把我們的行动繼續貫徹下去。这将是今后几个星期內我們所要做的工作。我們的各个企业还应该認識到这个行动的利害是什么，并且随着政府对我們企业所給予的信任程度，而尽自己应尽的責任。所获成績的大小将由政府为我們企业所采取的措施是否真正具有重要意义以及我們企业对新的責任是否有足够的認識来决定”。

几天之后，即6月3日，德勃雷又邀請鋼鉄工业方面所有的大垄断集团领导人参加午宴，并举行了关于同一問題的會議^①。

① 下面就是这次會議被邀請的人物：法国鋼鉄同业公会主席，犹齐諾公司董事長勒內·达米安；法国鋼鉄同业工会副主席及該会总代表兼鋼鉄工业集团主席雅克·費里；溫台尔公司董事長爱馬努埃·德·米特里；克勒佐鋼鉄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查理·許奈特；孟松桥鑄鉄公司董事長安德烈·格朗皮埃尔；洛林—埃斯科公司董事長罗蘭·拉貝；西特洛公司董事長罗伯·巴布安；盧瓦尔鋼鉄公司董事長亨利·馬尔科；犹齐諾公司經理莫里斯·布旭；鋼鉄同业工会顧問皮埃尔·紀罗东·德·馬祖伯；冶金与工业产品消費者联合会主席馬賽·珀提埃。

前鑄鐵委員會的全体委員都参加了这个由法国納稅者負擔的午宴，并且在內閣总理主持下，討論并决定了政府的政策。戴高乐制度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說明嗎？

委員會制度是否对汽車工业也采取有利的措施呢？在这方面，工商部长接見了四个最大的汽車公司的代表（雷諾、雪铁龙、西姆卡和褒齐渥）。《新工厂报》写道：“四个大生产者圍坐在一張綠絨桌旁共同研究了他們自己行业的情况，这还是第一次。这次会談还决定在几星期后，召开由让內^①先生主持的另一个會議。”^②

在1959年6月，仅仅一个月的時間所連續发生的事实非常明显地表明，这并不是什么偶然的会見，而是意味着政府机构和业主方面的經常合作。先召集一个行业的显要的工业家的全体會議，在會議上制訂出总的政策，然后再在这些會議之外和这些會議之后，建立各种工作小組，由这些小組制訂各項实际措施，而后通过政府来貫徹。这些小組正式設置在政府各部門里，业主方面委派同业公会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担任小組成員。例如，在5月29日德勃雷主持的机械工业代表會議之后，建立了一个隶属于国家計劃委員會的、范围縮小了的的工作小組，其任务在于拟制准备向政府提出的各項建議。参加这个小組的除了工商部的一位高級官員外，还有机械工业联合会主席褒齐渥和电气工程联合会主席达維扎克兩位先生。換句話說，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必須事先由最大的工业垄断集团的代表們亲自拟訂。^③

① 即工商部長。——譯者

② 見1959年6月18日《新工厂报》。

③ 这里还可举“經濟委員會”为例，該委員會建立于1959年3月，其成員除了三位部長和三位高級官員外，还有 柯达一百代公司董事長阿弗勒·朗杜西和紹松公司所屬各工厂的董事長約瑟夫·罗斯。1959年11月14日 所建

其他机构

由此可見，当人們看到在戴高乐宪法所建立的各个主要机构里以及在公开拥护戴高乐个人专权的政党的领导机关中出现金融寡头的成員时，就没有什么可以惊讶的了。

宪法委员会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个委员会在戴高乐制度里具有特別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宪法的唯一釋义者，而且它所作的評判是不容駁回的。萊翁·諾爱尔是该委员会的主席。他是一个为金融資本利益服务并执行金融資本政策的典型代表人物。根据1943年9月27日生效的維希政府宪法补充条例，在貝当元帅去世时，国家元首的职务由貝当所指定的七人集团負責，

立的經濟发展委员会也屬於此类性質。这个重要委员会的成員，特別使人感到兴趣。該委员会的主席是內閣总理，而我們在上面已談到过的雅克·魯埃夫以及法国国营铁路公司、非洲工业局、欧洲原子能联营的名譽主席路易·阿芒，是该委员会的兩位副主席。路易·阿芒同时还是臥車制造公司和好几家石油公司的董事(如索康太公司，法国塞科和科菲勒普石油公司)。

除了教授和工程师(如庫尔坦、爱斯特朗琴、凱林、馬特爾和索維)以外，委员会里还有改良主义的工会活动家(如法国天主教劳工联盟的戴西埃，工人力量总工会的王特若)，受社会党影响的高級官員(如国家計划委员会高級官員馬塞；法蘭西銀行副行長薩塔；法国煤矿公司董事長韋雷)以及壟斷資本的直接代表，如馬賽·德蒙格，他是拉法奇水泥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及伊柏里卡碳酸鉀公司和法国煤矿公司董事；讓·菲力比，他是路易·德雷福斯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亨利·图盧茲，他是中央碼頭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法国碼頭公司董事，此外，他又是巴涅公司、律伊耳一馬梅宗公司和馬利勒一罗瓦公司的創始人；安德烈·格朗皮埃尔，他是孟松桥鑄鐵公司董事長及鋼鐵业大托拉斯西特洛公司副董事長。这种大資本家和摩勒分子高級官員的相互勾結是戴高乐主义值得令人深思的一个特点。

其中就有萊翁·諾愛爾。戴高樂親自任命萊翁·諾愛爾為憲法委員會主席這件事充分說明這樣一點，“戴高樂主義”恰恰就是“貝當主義”的繼承者。萊翁·諾愛爾原來是法蘭西人民聯盟的領導人之一（1949年他曾是法蘭西人民聯盟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此外，萊翁·諾愛爾還是大保險公司、殖民地公司、石油和化學企業等利益的代表者。^①

萊翁·諾愛爾就是以這些頭銜來使將軍相信他能夠不折不扣地貫徹戴高樂憲法的。共和國總統正式任命的憲法委員會十個委員中，有萊翁·諾愛爾，一個法學家（莫里斯·帕坦）和蓬皮杜（關於蓬皮杜是怎麼一回事，這裡勿庸贅述）等三人這件事也同樣很能說明問題。

在政治方面，保衛新共和聯盟無條件地支持戴高樂的個人專權和政策，夏朗東是這個政黨在1958—1959年時期的總書記。

夏朗東是個怎麼樣的人物呢？這位保衛新共和聯盟書記通過他的妻子，繆拉的一位公主，而與斯特恩銀行家的家族有着緊密的聯繫。夏朗東的內兄弟阿希耳·繆拉是好幾個殖民地公司的董事（如福克奧橡膠公司和馬格列布面粉公司）。他的連襟阿爾培·德·波瓦西厄，我們在上面已經談到過，和戴高樂有家庭聯繫，他和許奈特集團也有業務聯繫。夏朗東本人是巴黎商業銀行總經理，這家銀行屬於達索集團銀行，而達索集團銀行主要

① 萊翁·諾愛爾是保險總公司副董事長，南方鐵路公司董事，此外，他又是羅尼—普朗克化學工廠、埃索—美孚油公司、鳳凰火災保險公司和法國地產公司董事。保險總公司的大股東中，有德·蒙塔里章，他還是另外一些保險公司的董事長，並且是哈蒙達與小卡比利亞軟木公司和小卡比利亞工業公司的董事；保險總公司的董事中，有安東南·博丹，他是滇越鐵路公司副董事長，吉布提—亞的斯亞貝巴鐵路公司董事；安德烈·夏朗達，他是法蘭西—摩洛哥不動產公司董事長。

是在航空方面进行活动。①此外，夏朗东是一家进出口公司的董事长兼经理(特腊马里公司)和许多公司的董事：如“廉价”百货公司所属的大百货商店；洛希尔集团所控制的法朗加勒普公司(这家公司的董事会里就有洛希尔集团的蓬皮杜)，还有银行公司所控制的高炉公司和智利钢铁公司(夏朗东和布萨克以及他的连襟阿尔培·德·波瓦西厄都是银行公司的董事)以及海外糖业公司(前殖民地糖业公司)等。足见夏朗东的飞黄腾达是从航空业、冶金业、石油业和殖民地企业开始的。夏朗东原是达索集团的人物，但是在上面我们经常提到的、戴高乐周围的大部分资本家集团里也有夏朗东的一份。

夏朗东于1959年11月26日辞去新共和联盟总书记的职务，然而，他仍然是保卫新共和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正像1959年11月18日《泰晤士报》所指出的，他仍然是“保卫新共和联盟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在夏朗东辞职的同一天，贝尔纳·米佐夫受任保卫新共和联盟财务主任，他是米佐夫海军上将的儿子(米佐夫海军上将是世界性的尤尼莱佛托拉斯董事)，前法国国际商业银行董事长吕道维克·特隆的女婿(这家银行现已国有化)，目前特隆是阿尔及利亚工业发展研究公司主席，东方地产信贷银行、摩洛哥糖业公司以及运输地产公司的董事。

* * *

由此可见，在对戴高乐将军周围的人物作了一番调查研究

① 达索是达索各公司、《巴黎新闻》、《法国时代报》……等等的经理。巴黎商业银行的董事会包括：让·福热奥，他是西姆卡公司副董事长，克勒佐钢铁公司、奥伯里佛和维尔律普特公司、联合航运公司董事；罗伯·若斯，他和夏朗东及德瓦夫兰同是“廉价”百货公司的董事；伊夫·布蒂里埃，他曾经担任过贝当政府财政部长。

之后，戴高乐是“超阶级的人物”这句鬼话就站不住脚了。戴高乐既然把治国重任系统地托付给仅仅是一个阶级，即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成员，或者更确切地说，托付给这个阶级的统治集团，即金融寡头的人物，那么，他还怎么能够夸耀自己是个“超阶级的人物”呢？难道我们竟能想像，涌入政府的这批人物，除了执行符合他们本阶级利益，符合他们所代表的资本家集团特殊经济利益的政策之外，还能干出什么别的来吗？

垄断资本代表人物的大量涌入政府机构以及这些人物的身份如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高级银行和势力最为雄厚的垄断集团的领导人，大批涌入国家机关是戴高乐制度的标志，就像它多年曾经是维希制度的标志一样。很明显，这不是一种能用将军的个人处境以及他的社会关系所能解释的偶然会合，而是一种真正和在美国业已行之多年的、完全一致**的政府制度**：由金融寡头直接控制的全民政府。把议会的作用贬低到从属地位是这个制度的必然后果。正像我们以后就会看到的那样，在法国垄断资本发展到现阶段以及当前法帝国主义正面临危机的时期，这种制度非常符合法国资本主义垄断集团的利益和要求。

第三章 戴高乐宪法和壟断資本

戴高乐宪法是資產階級統治集团 思想和願望的忠实反映

在进行历史分析时,有些人认为戴高乐的上台以及1958年10月4日宪法的得以施行,純粹是五·一三事件的簡單产物,但又提不出任何說明。不錯,五·一三事件提供了建立戴高乐制度的可能,但是,它却不能說明,为什么建立起来的恰恰是戴高乐制度,而不是什么别的制度。1958年宪法的内容和各項規定是否用一个人的野心或他个人对国家机构的观点来解釋就够了呢?如果說,这个宪法是“为了戴高乐,并且为戴高乐所制訂”,那末是否就像戴高乐分子在宣傳中所渲染的那样,戴高乐所考虑的只是如何服从公众的利益,除此而外,再也沒有其他的打算呢?

只要对历史作一番那怕是最起碼的回顧就会立刻得出相反的結論;因为稍微地回顧一下历史,我們就会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也就是說,远在戴高乐采取这个立場以前,戴高乐宪法的原則甚至于它的各項規定早就已經被人在許多宪法修改草案里提出来了。同时,这些草案并不是由什么默默无聞的改良主义者或个别的知識界人士所制訂,而是由金融寡头的成員,壟断資本正統代表人物所制訂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經結束,欧納斯特·麦西埃和阿尔培·比許在一批大資本家的支持下发动了名之为**振兴法国**的政治运动。欧納斯特·麦西埃是巴黎荷兰銀行和二十多个重要的电气和石油公司的董事,是当时金融資本的一个显赫人物^①,他的女

^① 按照奥古斯丁·哈蒙的提法,麦西埃可能是洛希尔集团的一个代理人。

婿是現任財政部長。阿尔培·比許曾在当年由洛希尔財团所控制的北方鐵路公司里担任董事。按照振兴法国运动的綱領，正像1958年的宪法一样，宪法上的主要修改在于将行政权和立法权予以严格分立和削弱国会的作用。

1930年的世界經濟危机在法国的延續時間比其他任何一个資本主义国家都要长些，这次經濟危机深刻地动搖了法国資產階級統治制度，因此，当时就出現了大批論文和著作，这些論文和著作都提出了建立削弱議會权力和加强行政权力的政治制度的主張。其中，我們要着重地提一提的是安德烈·达尔迪欧和巴尔杜委员会的著作，因为它们特別值得令人深思。

安德烈·达尔迪欧同冶炼业公会和金融寡头有联系，这一点是經常被人提到的。他在他的政治生活的晚年展开了修改宪法的活动。达尔迪欧写了好几部著作（如《决定的时刻》，1934年出版；《被拴住的主权》，1936年出版；《議会的职能》，1937年出版），他发挥了以后被米歇尔·德勃雷所继承的理論。根据达尔迪欧的說法，危害的根源系来自以后德勃雷所闡述的：“立法和行政权的分立；因为議會人物攫取了国家政权，而这些人失去了和国内真正的政治輿論的联系。”^①

安德烈·达尔迪欧主張采取的主要措施是（这些措施都列入1958年的宪法里）：进一步加强由扩大的选举团选举出来的总統的权力；总統有权任命內閣总理而不需要議会的授权；政府有解散議會之权；运用公民投票以反对議會；議員不得兼任部长，部长不得被选为議員；限制議会对政府的质詢权。^②

1935年成立了以雅克·巴尔杜为首的“国家改革专家委員

① 尼古拉·瓦耳：《关于新宪法的起源》。《法蘭西政法学报》，1959年3月号，第60頁。

② 同上，第60—61頁。

会”。巴尔杜是与东方汇理銀行有联系的一部分殖民地公司的董事，他的孙子瓦列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目前是負責財政事務的副国务秘书，这一点我們在上面已經談过。和巴尔杜在一起的是电气业的巨头，欧納斯特·麦西埃以及稍后在維希政府中起过很大作用的两个律师：約瑟夫·巴特勒米和拉法埃·阿里伯。巴尔杜委员会和达尔迪欧一样，鼓吹加强行政权力和限制議會权力。所不同的是，巴尔杜委员会提出了更确切和更細致的措施，維希政府宪法和1958年宪法全部接受了这些措施。

1940年6月以后在策略上相互对立的资产阶级的两个派别，即与希特勒占领当局合作的一派和抵抗希特勒占领軍的一派，却在同一时刻拟訂了完全一致的宪法草案，这是多么明显地暴露出法国资产阶级深远意图和总趋势的一个事实啊！

当1942年的夏天和秋天貝当的僚屬正在制訂宪法的时候，在全国抵抗委员会下面成立了一个排斥工人阶级代表参加的“总筹备委员会”^①，这个委员会由米歇尔·德勃雷負責。正像維希宪法草案一样，他們所采納的宪法草案也是以巴尔杜委员会所提出的措施作为基础的。尼古拉·瓦耳写道，“維希宪法差不多采納了巴尔杜委员会的全部建議……米歇尔·德勃雷的观

① “尽管从它所代表的組織和輿論来看，这个委员会的成員也是多方面的，但它仍然是全国抵抗委员会下屬的一个排斥共产党員参加的、只有一个社会党員（罗伯·拉戈斯特）参加的中心組織之一。此外，該委员会的十个委員都是些教授，高級官吏，抵抗运动的民族主义或技术人員組織的代表人物（如“平民和軍事組織”和“抵抗运动参加者”等組織的代表），这个委员会与国内抵抗运动的大多数領袖比較起来，就更接近于戴高乐將軍和他所主持的阿尔及尔委员会。單就抵抗运动南方地区参加总筹备委员会的代表而論，他們都是由三个‘抵抗’运动中（即德·芒东，泰特讓和庫尔坦三位先生）最保守的一支所派遣来的。”（尼古拉·瓦耳：“关于新宪法的起源”。《法蘭西政法学报》，1959年3月号，第36—37頁。）

点以及总筹备委员会的方案也几乎是全部采纳了这些改革”^①。他特别指出：“在巴尔杜委员会的建议中有两项建议与1958年的宪法条文特别相像：一方面，巴尔杜委员会限制了议会对政府的控制，规定至少要联合了三分之一的议员才能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另一方面，正像1958年宪法第四十七条所规定的，巴尔杜委员会主张当国民议会拒绝和政府合作时，可以运用参议院来加速预算草案的讨论程序。”^②

如果说德勃雷本人，正像我们已看到的，和金融资本有着联系，那么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总筹备委员会所发挥的观点不仅是巴尔杜委员会的观点，而且是作为垄断资本最显要的领导人之一的爱马努埃·蒙尼克的观点。爱马努埃·蒙尼克目前是巴黎荷兰银行、加拿大地产信贷银行和奥托曼银行的董事长，摩洛哥烟草国际公司和摩洛哥国家银行副董事长，东方汇理银行、苏伊士运河公司、圣路易精糖公司、北方与东方钢铁公司、阿歇特图书公司和国家信贷银行的董事。

在占领期间，爱马努埃·蒙尼克和米歇尔·德勃雷共同编写了一部著作，这部著作在解放后出版。1944年总筹备委员会的各项方案和1958年所建立的各项政治设施都是以这部著作的政治原则为基础的。^③ 该书的作者认为共和国总统应该是国家制度的“基础”，总统应该确保“政权的稳定性和持久性”^④，他们认为，总统应该起一个君主的作用……^⑤ “既然不可能有一个美

① 尼古拉·瓦耳：《关于新宪法的起源》。《法国政治科学评论》，1959年3月，第63页。

② 同上，第62页。

③ 这部著作是在1945年出版的，书名为《重建法国：一代的努力》，作者为雅基埃·勃留埃（米歇尔·德勃雷和爱马努埃·蒙尼克的合用笔名）。

④ 雅基埃·勃留埃：《重建法国：一代的努力》，第124页。

⑤ 同上，第120页。

国式的总统，又不可能有一个国王，因此，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维护法国民主的唯一办法是有一个共和国的君主。”^①

人们不可能对目前当政的制度作出比上述定义更确切的定义了！这个“对历史负责的”国家元首有权解散议会，而事先不须得到任何授权。国家元首任命政府首脑，后者在前者的整个任期内迄立不动：“除非发生意外，一个任期之内只能有一个政府。违背这个规定，就是死路一条。”^②

在这里，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以及议会作用的削弱就阐述得十分明确了。“不能让国会議員有权随时向政府提出质询，或提出随之而来的不信任案。一年一度的辩论就足够了……如果拒绝对政府的信任，那就得另组政府；如果投了信任票，那末，双方各就各位，继续工作，政府继续执政，国会議員继续对它行使监督和监察。当然，还可以进行其它的讨论，但是在上述辩论之后，只有政府有权提出信任案的问题。”^③

这几段话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了1958年宪法，从历史上来看，其作者并不是戴高乐，而是一整套思想的体现，戴高乐只是在1946年继承了这套思想，并在1958年实施了这套思想的主要观点。它也说明了，由麦西埃、达尔迪欧、巴尔杜、蒙尼克、德勃雷之流（在他们背后隐藏着巴黎荷兰银行，洛希尔集团，钢铁垄断资本以及东方汇理银行）所表达出来的这一整套思想，是法国金融资本的思想。

法国大资产阶级集团内这支修改宪法的思潮所表现的连续性和持久性表明了，这已不是一个人为的和过渡性的思潮。最近的历史也证实了：每一次有机可乘时，如1940年6月的军事失败

① 雅基埃·勃留埃：《重建法国：一代的努力》，第122页。

② 同上，第133页。

③ 同上。

和1958年5月13日阿尔及尔的暴乱，金融寡头就曾借此来推翻国家的民主的政治设施；而在平时，它利用一切机会压缩议会代表制的作用，破坏人民主权的完整。如果说，“法令性法律”的统治标志着第三共和国的终结并且促进了维希制度的建立，那末同一个制度标志着第四共和国的结束并且促进了戴高乐制度的建立。事实上，在1947年以后，通过颁布各种“根本法”的制度有系统地削弱了国民议会的作用，加强了行政机构的权力，历届政府企图利用这个制度摆脱议会对它们的控制。议会活动逐渐趋向于在各式各样的“委员会”中进行。在这些委员会中垄断资本有较强的控制力量，而共产党议员到处被排斥在外，不让他们参加。政府企图将决定预算的权力从议会手中剥夺过来，取消议会在决定国家公共支出方面的主动权，不向议会提出某些方面支出的确切数字，比如，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实际开销以及赋予大公司在纳税方面的优惠总数。摩纳计划指导了战后国内的投资或拉克煤气的利用，该计划提出了建立新工业企业问题以及决定整个地理区域和许多工业发展前途的价格问题。所有这些对国民经济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问题，原应该像十九世纪国家修建铁路问题一样，在国民议会中讨论通过。但是，这次却在议会之外作了决定：石油、钢铁、化学垄断资本集团完全从本身利益出发私下解决由于拉克天然气所引起的全部问题，而政府则承认它们所做的决定，不让议会表示态度。尽管如此，这仍然不能满足垄断资本的要求，垄断资本企图进一步扩大这种做法并加以合法化，于是，“国家改革”，“修改宪法”列入了资产阶级政党每次会议的议事日程，而包括弗兰姆林政府在内的由议会授权组成的历届政府也都将 these 改革列入自己的纲领里。5月13日暴乱发生之后，弗兰姆林所最关心的就是这些问题。① 同样，当1958年8月资产阶级一部分人批评即将提交公民投票的宪法草案，指

出這項草案过分削弱了国民議會作用时，德勃雷毫不費力地說：“他們开始对国民議會投票通过的或正在审查的各项旨在限制議會作用的建議提出各項直率的补充：禁止提出新支出，預算必須一攬子通过，縮短議会的开会期限，限制投信任案或彈劾案的次数，項目和效力”。德勃雷企图将他所提出的草案說成“归根到底，比从前已經通过的或即将通过的改革方案中产生出来的制度要更自由一些。”②

历史証明，1958年宪法符合法国資產階級領導集团三十年来頑固地表現出来的願望，而且是同一个集团在1947年以后一刻未停地进行頑固努力的結果。但是，只是由于1958年五·一三事件，他們才获得了成功。这就使我們能从历史上确定五·一三事件的重要性和戴高乐的作用。前者是一个良好的时机，后者是法国大資產階級借以达到其目的的工具。正像德勃雷关于五·一三事件恬不知耻地所表述的一样，“5月13日是一个产物，如果没有这个5月13日，会有某一个6月14日，某一个7月14日或者某一个8月16日。”③

但是，需要在五·一三事件之外，从法国大資產階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深远的意图中去探討建立戴高乐制度的真正原

① 見5月23日，即戴高乐上台前一星期的政府公报：“內閣通过了一项修改宪法的法令草案。这个草案的目的在于保証行政权的稳定性和权力。在国民議會投票通过修改宪法的決議后，將立即向国民議會提出此項法案。

“根据新制訂的宪法第十三条，政府將从議會获得廢除、修改或替换現行的立法措施的广泛权力”。

“政府对原由議會提出的有关全权轉讓法規定的事項的条文將具有否決权”。

“只有在議會通过对政府的彈劾案或不信任案，并且任命新內閣总理的情况下，才能使政府处于少数地位。此外，議会的會議期限將縮短”。

② 对《世界报》发表的声明，1958年8月8日。

③ 《世界报》，1959年5月13日。

因，有必要闡明一下这些意图。事实上，这些意图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十分明显地符合客观需要的。

戴高乐宪法的客观因素是法国帝国主义制度的危机和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发展

战后，法国資本主义面临着一系列問題：由于社会主义地区的发展，法国資本主义对外資本輸出市場大大縮小了；被破坏了、耗損了的以及陈旧的生产机器必須加以全面的重建；不动产資本和交通運輸工具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为了重建它的經濟基础，为了将遭受战争惨重破坏和損失的重担全部轉嫁給人民群众，不仅必須更加殘酷地加紧对工人階級的剝削，而且还必須加紧掠夺国内其他阶层居民的財富，加紧併吞和排挤大批中小企业；此外，还必须超額地剝削和掠夺亚洲、非洲已被它变为殖民地的海外領地上的人民。最后还必须縮小了的、資本和商品竞争十分尖銳的資本主义世界市場內夺取一定的地盘。

然而，法国資本主义必須在資本主义制度新的动蕩时期，在殖民制度危机迅速加深的阶段上来設法实现它的上述企图。很明显，在这样的情况下，壟断資本已不可能像往常一样利用議會制度的傳統形式来进行統治。这是因为壟断資本的利益不仅和工人階級的利益，并且也和居民的中产阶层和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发生劇烈的冲突；具有主权的国民議會和金融資本的专政发生了矛盾，这是因为在国民議會中被壟断資本剝削和掠夺的阶层可能有合理的代表人数。金融寡头的成員清楚地洞察了这个基本的政治矛盾，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制訂了維希宪法并指导了总筹备委员会的活动。爱馬努埃·蒙尼克和米歇尔·德勃雷写道：“这次战争之后，法国为了重建它的地位，必須进行非

凡的努力。在目前这个特殊阶段,为了团结一切人,以便确保一种政策的继续贯彻,假如设想有一种自由的,但是稳定的,强有力的和权威性的政治制度,这同逻辑并不相矛盾。”^①戴高乐也搬出了同一套理论:“在这个艰难和危险的世界里……在我们必须克服的一切艰巨的阻碍面前……面对目前和将来的一系列问题……无论是现在或者将来,没有一个在强有力国家领导下制定并为大家所接受的严格纪律,我们就不可能有自由、安全和有功效。”

这就是为什么爱·蒙尼克和米·德勃雷从1943年起就反对主权的国民议会原则,为什么戴高乐将军反对1946年的宪法,这是具有非常明确的阶级因素的:在法国帝国主义处在危机的新阶段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垄断资本的统治,就必须从反动意义上修改宪法,加强政府的权力,削弱议会的作用,使议会处于附属地位。1958年宪法在法国帝国主义殖民制度危机极度加深的时刻制订出来并被说成是克服危机带来的困难所必不可少的救药,这并不是偶然的。^②

如果说,1946年宪法的废除符合法国帝国主义制度危机加深时所提出的要求,那末它同时也符合随着垄断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而提出来的要求。法国在十九世纪实行的议会制度适合存在着大量独立的资本家的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的需要。各个独立的资本家将议会看作为阻止国家侵犯他们的利益的一种保证,议会通过公开的摊出各种利益而制订符合该阶级普遍利益的共同政治路线,而任何别的机构不得确定这个路线。他们认为历届内阁的垮台既是互相对立的利益之间矛盾所产生的

① 雅基埃·勃留埃:《重建法国:一代的努力》,第113页。

② 对于第一点,我们在这里不再多谈,因为以后在研究戴高乐政策时还将多次地谈到这个问题。

客觀需要，而且也是為了滿足當時大多數相對峙的各種利益而尋求一定均勢所不可缺少的。而且，這個玩意在工人階級還處於分裂和像幾乎所有的中產階層一樣受着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時候，是沒有什麼危險的。十分明顯，在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過渡到壟斷階段的時分，這個制度就不適應它的要求了。因為，金融資本壟斷集團的強大力量和他們對市場的壟斷，使他們能夠自己或者直接同國家機器，即政府各部的高級官員決定與全國人民生活有關的一切經濟問題。高級官員陸續不斷地轉入資本家的大公司，擔任領導職務以及金融寡頭的成員被任命擔任國家的重要職位，這就具體地促使高級行政機構和大銀行之間建立了直接的聯繫。壟斷資本主義由此而發展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同國家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生活中所起的日益巨大的作用，當然是相輔而行的。

今天，資產階級國家已不僅是為了維持資產階級秩序的暴力工具，而且是壟斷資本手中進行剝削和掠奪的工具。在實現金融資本所要求的壟斷利潤中，國家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通過預算，特別是通過軍事預算，的確，國家在完全從壟斷資本的利益出發對國民收入作了名副其實的重新分配；國家利用幣制政策使小儲蓄者破產而讓大存款戶發財致富；國家借助稅收政策使壟斷部門得到益處而損害其它生產部門；國家的外貿政策使大的進出口企業收益很大。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家的作用愈益增長；無論是在賠償戰爭的損失，重建生產機構，軍事費用，貨幣方面的花樣，稅收措施，社會立法，投資信貸的總數和分配，農業政策，國有化企業生產產品的價格，輸出的和生產的獎勵以及旨在重建壟斷資本的物質基礎、使壟斷資本得以擴張和發財致富等方面國家都起着決定性作用。

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一方面，金融資本的領導人物愈来愈想尽办法来掌握国家机器，使国家政权直接执行由他們公司董事会所通过的決議。的确，金融寡头鉴于它已占据了国家經濟的統治地位，它不愿和其它阶层妥协；它有可能而且企图制訂仅仅符合它的利益的政策。

因此，傳統的議會制度就成为一个陈腐的、碍事的、甚至是有害的机构了。說它是陈腐的和碍事的，是因为議会的討論拖延應該迅速通过的決議，而如果金融資本直接同国家机器进行交涉，就可以使決議迅速通过。說議會是有害的，是因为它反映了輿論并且表达了受金融資本剝削和掠夺者的呼声。大工业公司，它們的生产取决于国家的訂貨和政策，它們今后需要稳定的政府；因为它們能够在議會之外解决他們之間的冲突，所以，对于它們來說，不再需要什么內閣危机了，而且一个內閣的垮台只能拖迟決議的貫徹并使既得利益再度受到爭論。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建立一个被垄断資本紧紧掌握的行政权力，并且要求削弱議會，使它从此处于輔助的地位。

而且，从1946—1958年的这段时期，国家垄断資本主义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資本的集聚和集中以飞快的速度进行着，法国金融資本加强了它的工业基地，金融寡头随着国家作用的增长而大发其財；正像大公司的領導人物，特别是鋼鉄、装备、汽車垄断集团的領導人物所公开承认的那樣，垄断資本的繁荣愈益紧密地与政府政策結合在一起。鋼鉄同业公会主席达米安宣称：“国内市場的情况主要取决于下屆政府将制定的經濟和金融政策。

“坚持实现装备計劃，保持政府定貨的高水平，对大的輸出工业有效的支持，这在我們看来就是避免經濟衰退的普遍化和持續性所必不可少的措施。”

1959年6月20日，克勒佐地区的許奈特公司的報告將這個分析更加深入了一步而構成主張大企業和政府機構進行直接合作的名副其實的宣言，我們可以讀到：“每一個大行業，特別是重型機械和裝備工業應該更加緊密地和政府機構合作，以便通過在雙方同意下制定的一整套措施來保證定貨的穩定性、價格的調整以及對發展前途的預測。

“對裝備的定貨是否穩定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制訂和執行國家預算的機構。決定從這年到那年轉瞬之間急劇地增加或削減國家裝備計劃，這必然會在工業中引起嚴重的牽動。此外，技術研究工作和行政交涉，往往要在經費批下幾個月以後，才做出關於訂貨的決定。這樣定貨忽多忽少，突然使在這以前開工不足的工廠倉促投入生產。十分明顯，如果在每個製造部門中，定貨者和生產者之間建立更緊密的聯繫並且共同制訂造成牽動不太大的措施，那末，這樣的情況是可以得到廣泛改善的。

“概括我們的思想，那就是，為了確定長期的目標，為了在各方面減輕生產的脫節，為了不僅保證計劃的制訂，而且保證計劃的執行以及為了從法國的工業潛力中獲得尽可能正規的利益，我們希望能夠從技術上和商業上尋求措施。這些措施，雖然不及預算和幣制措施的效力那樣普遍，但是同各主要生產部門的需要相適應。”

雷諾公司的經理也持有同樣的論據：“為了使國外市場的獲得不至成為暫時的現象，那末我所主張的雷諾公司活動的持久性必須在國家對汽車工業的政策中取得進一步的保證。”^①

西姆卡汽車公司經理皮果濟關於大公司活動和政府活動的同一性作了更進一步的論述：“今天，問題已不在於要求採取保

① 德雷福斯向報界的聲明。《情況報道》，1959年10月1日。

証我們这一行工业繁荣的特殊措施，爭取一个有利于汽車业的政策。今后，簡而言之應該是整个政策的問題，如何利用国家資源的問題了。

“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即：一方面存在着汽車工业本身的目标，另一方面存在着政府更高的目标。

“希望人們很好的理解我的意思：这样一个企业的首腦，这个企业直接养活三万二千人，在1958年发出了二百五十多亿法郎的工資，它間接地供給了至少二十万人的生活資料，1958年它的營業額約达一千九百五十亿法郎，1959年大大超过二千亿法郎，最后，它的外貿活动的收入每月相当于一千万美元。这样一个企业的首腦在他企业中所采取的总政策不可能与国家政权的总政策有分歧的。

“保持充分的生产任务，社会的进步，房屋的建筑，輸出的发展，投資的繼續和投資的增长，提高生产率，进行区域规划（这里包括公路政策即公路交通安全的保証）以及工业的分散，所有这一切就是我們所关心的一些主要問題，因而也应该将是政府所关心的主要問題。这些問題产生了某些义务。”^①

上述几段特別能够說明問題：它既証明了法国垄断資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过渡，又說明了垄断資本主义的領導人物意識到这个过渡和过渡所提出的政治要求。这些政治要求表現在戴高乐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中。

戴高乐思想有三个主要論点：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多党制度的危害性，国家权力的分立。

在“强有力的国家”这个神話中，我們可以找到过去反动的、亲法西斯的或者法西斯主义的思想都曾有系統地运用过的办

① 向报界的声明，《情况报道》，1959年9月25日。

法，即利用抽象的術語。这个術語本身确能博得群众的同情（因为有谁希望有一个軟弱的国家呢？），但是，在这个術語的背后隐藏着与群众利益相違背的現實，因为在資本主义經濟制度下，国家的加强只能意味着資產階級国家的加强，而在今天，又意味着垄断資本国家的加强，这也就是说，它意味着垄断資產階級政治和經濟方面暴力政权的加强。

第二个論点是关于“多党制度”的危害性，或者干脆說，关于“制度”的危害性，这个提法使这个術語的語意更加含糊。然而，如果說在沒有对抗性矛盾的階級社会里不存在政党之間的斗争是可以理解而且是自然的話，那末在資產階級社会里却完全不同，因为在資產階級社会里，“人民置政党界綫于不顧而团结起来”具体地意味着工人階級和中产階級对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即金融寡头的侵犯不进行任何的抵抗。

第三个論点是“权力的分立”。名义上是分立和独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观念，其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垄断資本使行政权摆脱人民的监督。三权分立实际上意味着政权与人民分离。立法权和行政权一旦分离，政府就握有全权。金融寡头只要攫取行政权，就可以毫无阻碍地实施統治，正是戴高乐的执政和1958年宪法才使金融寡头实现了这一点。

戴高乐任命金融資本的領導人物担負政府和国家机构的重要职务。与此同时，通过各式各样的混合委员会（高級官員和托拉斯的領導人）建立了政府和垄断集团之間的經常性的合作。这些混合委员会按照达米安、許奈特和皮果济所表达的愿望制訂政府的政策。在这些委员会里，各垄断集团秘密地解决他們之間的分歧并且用損害法国人民利益和肥己的办法使他們的利益得到妥协的解决。这些委员会在国家垄断資本主义阶段恰恰起着十九世紀垄断資本主义前自由竞争資本主义时期，議会所

起的作用。

只是在这个範圍以內并在一定程度上才能說戴高乐在一些重大問題方面，內閣總理在一些次要問題方面扮演着仲裁者的角色。他所扮演的不是相互敌对階級（无产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仲裁者，甚至也不是資產階級各派（金融寡頭、中产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之間的仲裁者，因为，正像我們將看到的，他执行的完全是金融資本的政策，他只是当构成金融資本的各垄断集团之間不能直接取得協議的时候，扮演他們之間的仲裁者而已。个人专权的作用在于处理金融寡頭的家务。金融寡頭抱有这样希望，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不使他們之間的严重冲突公开暴露出来，因而不致动摇資產階級国家本身的稳固。

削弱議會的作用，使它处于附屬的地位，这是金融寡頭攫取行政权的必然結果。垄断資本的代表要求稳定地占据他們的地位；他們企图长期領導国家，因而不愿看到他們的決議因議會的投票反对而遭否决。个人专权千方百計設法适应垄断資本代表們的这些要求。

在德勃雷政府里拥有自己的代理人的各金融集团从宪法上，至少在理論上获得了在任期內統治法国的保証，而不必担心內閣的垮台。各个金融集团并且拥有把他們的階級政策稳定地加强給全体人民的合法手段。

在这方面，非常能說明目前这个制度精神的措施之一就是政府各部部长与議員的職責不能相互兼任。这是宪法的要点之一，也是垄断資本的戴高乐主义理論家所提出的主要改革之一。罗尼—普朗克公司和埃索—美孚油公司董事萊翁·諾埃爾在1956年写的一本书^①中将这一点作为宪法改革的首要項目来提出，这并不是偶然的。戴高乐和德勃雷在这个問題上寸步不让也不是沒有原因的。因为这个措施在道义上削減了議會职能的

同时又可以将一切可能在人民的压力下，甚至是間接的压力下让步的人物排斥于外。此外，这个措施使总统有可能在議會之外在为垄断資本服务的高級献策人和金融寡头的成員中間挑选他的各个部长。这些人物不必当过一段時間議員就可以直接参加政府。規定部长和議員不得互相兼任，将垄断資本占据国家机器这个事实合法化。宪法委员会在1959年6月萊翁·諾埃尔担任該委员会主席期間通过的一項決議，就是朝这个方向走的。根据这个決議，当一个政府成員在議會讲台上发表声明后議員不得提出投票的动議。這項決議是合乎这个政权的邏輯的：既然政府的政策早已在和金融資本代表直接協商中加以規定，而最重要的問題在議會之外，在金融資本成員和各部部长所組成的委员会中已作出了决定，那末何必要議會来規定政府的政策呢？

我們还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結論，大資產階級关于专政形式观念变化的客观原因，也就是說，作为思想体系、宪法和戴高乐制度基础的客观因素主要是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帝国主义制度危机的加深和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发展。

宪法和戴高乐制度的特点在于它們在政治設施方面十分忠实地反映了垄断資本日益加强其統治的經濟基础，在于它們反映垄断資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发展。此外，它們还为新的擴張和国家垄断資本主义全面发展准备必需的政治条件；它們十分确切地适应法帝国主义在它危机的目前阶段所具有的

① 萊翁·諾埃尔：《我們最后的一个机会》。1956年巴黎版，138等頁。1955年3月，萊翁·諾埃尔向国民議會提出一項決議草案，要求从这一意义上来修改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六条，戴高乐在同一年內也提出了这一点。（見1955年7月30日法蘭西人民联盟第13期《快报》）

利益和提出的要求。如果說，1958年宪法是为了戴高乐和由戴高乐所制訂的，那末更正确地說，1958年宪法乃是为了垄断資本而且是由垄断資本所亲自制訂。戴高乐是垄断資本的工具，垄断資本利用他来扫除反对垄断資本对法国实现全面統治的一切障碍。

現在我們將用戴高乐在建立个人专权前，特別在这以后所执行的政策来核对一下上述的事实。因为实践可以最終地評定所有人物和一切政治制度。

第二部分 政 策

第四章 先 驅 者

长时期以来，戴高乐在不少的法国人心目中似乎是一位有修养的民族主义者，是个沉思地注视着抽象法国的人，他的动机是纯洁和无私的，尽管他周围的人并不是这样，尽管他的政策的某些部分也是可以疵议的。这个圣像者的形象是为戴高乐的一切支持者服务的，这些人中有的在支持戴高乐的同时，口口声声说反对“戴高乐主义”，有的像摩勒那样的反对派。事实上，固然戴高乐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在抵抗期间有某些活动是与民族的利益相巧合，但是他的这些活动一直符合着他的阶级动机和利益。戴高乐忠实地为大资产阶级服务，而后者每当需要戴高乐扮演只有他才能够扮演的角色时，也很漂亮地利用了他。在1944—1946年是这样，1958年5月也是这样。这种阶级精神非常明显地表现在对待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国内政策方面，同样也表现在对待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外政策方面。他对于法国那种抽象和形而上学的概念——他说“我对于法国已有某种认识”——使他成了经济统治势力手中的一个玩具，这一点不管他自己意识到了，还是没有意识到。1959年，当他以共和国总统的身份到各省视察时，他访问了哪些企业呢？他访问了米许林、许奈特、阿尔斯多姆，也就是橡胶以及机械、电气制造的几个主要的托拉斯。当这种对法国的“认识”逐渐形成并成为现实时，这个“认识”

便在他那受着階級限制的腦海中和托拉斯的法國混合在一起。1959年4月18日，他訪問了克勒佐的工廠後，以贊賞的口吻對克勒佐工廠主說道：“我親愛的查理·許奈特，你是民族活動的先鋒”。因此，戴高樂的政策怎能不十分自然地要為民族活動的先鋒們、法國資本主義的領導者和各壟斷集團提供各種優惠條件呢？

從極右派到摩勒的所有戴高樂的宣傳家都把他描繪成1944年“法國的救星”。按照他們的說法，在戰勝希特勒主義和解放法國的事業中，蘇聯人民所付出的犧牲，紅軍的勝利，英國和美國的雄厚經濟和軍事力量以及法國國內的抵抗運動算沒起什麼作用！如果不是在這個歇斯底里的捧場背後，隱藏着一種完全不同的實際情況，那麼這種說法只不過會成爲一種笑談而已。因為，如果戴高樂在1944—1945年確實拯救了些東西的話，那他所拯救的不是法國而是法國大資產階級的經濟和政治勢力。當時他在他擔任的職位上主要關心的是，如何維護金融寡頭的經濟地位和恢復資產階級秩序。正是由於他個人的干預，投資銀行才免于國有化，而僅將國有化的範圍局限于儲蓄銀行。指出下面一點並不是多餘的，那就是，正像我們已經見到的，控制全國經濟生活的所有這些銀行（洛希爾銀行，巴黎聯合銀行，巴黎荷蘭銀行等）今天在戴高樂政府里都有直接的代理人，或者與戴高樂和他的家庭都有私人關係。他促使全國抵抗委員會的綱領歸于失敗，並通過系統地排擠無產階級的成員和阻止建立人民軍隊來阻礙國家機器的民主化。通過這些做法，他還爲大資產階級向民主的政治設施進行反攻準備了條件。

戴高樂之所以未能在1946年建立戴高樂制度，他借助法蘭西人民聯盟奪取政權的企圖之所以遭到失敗，他之所以被迫在科龍貝雙教堂別墅的隱居中等待了五年，以便尋求有利的時機。

这个时机随着阿尔及利亚战争事件的发展才出现。这是因为，当时戴高乐正像资产阶级本身一样无力控制事件的发展。

戴高乐在1958年5月又为法国大资产阶级作了一项重大的贡献。

当时形势对于法国大资产阶级的确相当微妙，虽然它自1947年6月起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以及广大群众对于第四共和国历届政府所执行政策的一连串失望。但是，阿尔及尔叛乱的法西斯性质趋向于促使法国国内工人阶级的所有力量都团结起来，并且促使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为保卫共和国制度而结成联盟。

然而，共和力量对阿尔及尔暴乱分子和他们在法国国内同谋者所取得的胜利，终止排斥共产党的做法，可能导致恢复民主并动摇大资产阶级从1947年以后所获得的成果。

绝对必须物色这样一个人物，他既能被认为是共和国的救星和国内和平的维护者，又能取得叛乱者的支持。大资产阶级没有选择的余地；根据当时的环境，只有将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关于政权的观念抬出来才能应付局面。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戴高乐真正是当时形势所需要的人物。军人出身的戴高乐，能够使军队服从他并掌握它。他的民族主义的历史以及他受到莫拉斯的思想体系的影响，使他博得了极端殖民主义分子的信任。在害怕阿尔及尔法西斯主义的人们心目中，他则是一个曾经“解放过法国”并且在1944—1945年是重建民主的政治设施的人物。一部分社会舆论认为，他将在“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这一意义下来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对于另一部分社会舆论，他将在自由主义的意义下来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他在科龙贝双教堂别墅里的隐居年月使人们忘掉了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法西斯姿态，使他获得了一个“圣人”的荣誉，一个立足于各政党之上的人物的

荣誉。

1958年5月，戴高乐的确成为受到严重危机震撼的法国资本主义的总利益服务的最适当的工具。法国金融周报《法兰西生活》在5月8日，即阿尔及尔叛乱前五天用大标题宣称《法国主要经济集团的代表预告政治设施的危机》。这家报纸从10月起即向其读者断言，只有戴高乐一人“能够恢复国家的权力”。

5月20日，这家报纸在《交易所期待戴高乐》的大字标题下写道：

“5月13日以来爆发的国内冷战有可能发展成为真刀真枪的内战，在这种情况下，交易所认为戴高乐将军是还拥有足够的权威，并能恢复秩序的唯一社会人物。星期三（5月27日）的交易，在股票市场获悉了戴高乐宣称自己已着手按照必要的正规程序筹组内阁的公报之后，头几盘就出现了涨风。

“在这以前，摇摆不定的阿尔及利亚的股票价格也猛烈上涨，在撒哈拉进行开采的各石油公司的股票也同样回升。法国石油公司的一万多股票在这天成交行情由四万七千一百法郎上升到五万零七百法郎。”

戴高乐非常干练地扮演了大资产阶级期望他扮演的角色。

由于共产党在5月13日至5月14日夜間所提出的动议，弗兰姆林的授权组閣粉碎了阿尔及尔的暴乱分子利用当时的无政府情况在巴黎建立一个“救国政府”的企图。5月14日，叛乱分子因面临着一个合法政府而处于极度溃乱状态。5月15日，戴高乐的发言又使叛乱分子重新产生了希望，而且鼓励他们将叛乱活动进行到底。所谓“到底”已经不意味着改换政府而是改变制度。戴高乐一方面极力支持阿尔及尔的暴乱，一方面却自夸他的共和主义思想情绪并装出要按合法手續办事的样子。虽然他由于暴乱而得以攫取政权，他并不愿从属于暴乱。戴高乐玩弄一个政客所具有的熟练的，圆滑的两面手法以及巧妙的模稜

兩可的語言。在言詞中，他一方面支持运用极端殖民主义分子的观点来解决阿尔及利亚問題，另一方面又为另外一种政策敞开大門。这样，他就成功地在他的周圍团結了从法西斯的极右派到社会党的所有政治活动家，迷惑了大多数的法国人民，使79.25%的投票者贊成他的宪法草案；同意他的宪法的人是非常广泛的，但动机却是十分复杂和极其矛盾的。少数人投票拥护“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和法西斯主义，多数人是由于各种原因而投了贊成票；有的是由于对1947年以后实行的政策表示反抗以及希望改变这个政策，有的是因为在1956年1月2日选举时所抱的希望破灭，有的是由于惧怕內战，有的是由于对法西斯主义的恐惧，有的是由于希望在阿尔及利亚建立和平，大多数人則是看不出：如果投了反对票后前景如何。当时，虽然共产党发出了呼吁，但反对总统宪法的人們却未能結成联盟。①

小資产階級，中产阶层以及工人階級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认为戴高乐将为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因而他们就陷入了大資产階級布置的圈套。大資产階級因而能够在有利于本身的条件下来解决1946年所建立的政治設施和他们擴張的要求之間的矛盾，扫除对他们有妨碍的政治上层建筑。

戴高乐在国际关系上也是为統治階級服务的。如果我们仔細观察他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各种观点以及他在1958年前所持的立場，我們就可以看到，他从来也沒有忽視过国际資产階級利益，并在国际无产階級和社会主义面前保卫資产階級秩序，他正是在这个範圍内来保卫法国資产階級的特殊利益的。

随着帝国主义之間矛盾的加深，保卫世界資产階級利益和

① 多列士：“1958年10月4日在中央委員會上的发言”。1958年10月10日《人道报》。

支持法国帝国主义的特殊利益当然有时也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很能說明戴高乐的态度的是，在照顧法国資本主义的特殊要求的同时，他并未忘記法国資產階級与其它各国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团結。戴高乐將軍对苏联和对德国态度的变化特別明显地說明了这一点。1944年曾前往莫斯科同苏联簽訂《亲善与和睦的同盟条約》的和1947年擱弃这个同盟条約并随即成为反苏健将的是同一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和战争結束时期主張在希特勒失敗后分割德国以及主張貫徹他的先生莫拉斯关于建立“几个德国”观点的这个人物却在不久之后积极主張重建“德意志帝国”和重新武装波恩的德国。只有階級动机才能解釋他的这些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变。

一、戴高乐在1944年曾赴莫斯科按照正式的手續簽訂一項同盟条約，当时，在他认为，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对比，由于苏联遭受的物质損失而美国資本主义的雄厚势力却完整无损，因而并不利于社会主义。从这种估計出发，他认为可以在无损于資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取得苏联的支持以便限制英国資本主义和美国資本主义的侵犯。然而事实表明这种估計是錯誤的，社会主义影响日益扩大，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力量对比的变化也有利于社会主义。由于从階級观点出发，問題已与过去不同，于是戴高乐的态度改变了。这还由于法国資產階級的最高利益要求倒向最强大的帝国主义那一边，并且要求忘掉次要的糾紛，以便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并試圖打倒它。这就是为什么戴高乐同意馬歇尔計劃、同意北大西洋公約以及在1946—1948年期間实行反苏的侵略政策。

从戴高乐方面來說，他在1944年所持的立場和在1947年以及在以后的年代里所持的立場之間并无矛盾。想了解戴高乐在什么时候是真誠的，是在他庆祝法苏联盟的那个时候，还是在他

摒弃这个联盟的时候，那是十分可笑的。^① 他的这两种态度都是为了在不同历史环境下贯彻和资产阶级利益相符合的政策。正是同一个阶级原因促使他改变在德国问题上的态度。

二、1945年，戴高乐和杜鲁门会谈时（8月22—25日），在9月10日^②对《泰晤士报》记者谈话中以及在伦敦会议上（9月11日，10月3日）都要求将德帝国变为几个自治国的联邦，将莱茵兰地区从德国分离出去^③，实行鲁尔区国际化^④。这个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立场已不得不在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面前改变，因为在社会主义和革命潮流日益发展的情况下，法国资产阶级为了组成反对无产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西方各国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有必要恢复德国资产阶级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基础。1951年戴高乐写道：“从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来说，实行限制是可笑的。当自由欧洲朝夕之间都受到灭顶之灾的威胁时，决不是阻止它去集结力量的时候……几世纪来，无论莱茵河这边和那边的人遭受过多少苦难，互相怀着多大的怒火，德国处于欧洲的中心以及建立易北河屏障需要德国人的帮助仍然是个事实。至于他们，请他们在不过分实行恐怖和提出过分要求的情

① 这个事实十分明显地说明这样一个真理：一个资产阶级政客是没有什么道德观念的，执行资产阶级政策而不遭受责难是不可能的。1944年戴高乐在斯大林面前吹嘘他决不是一个拉伐尔。但是他在1947年的所作所为，却与拉伐尔一模一样。

② 见戴高乐将军的《战争回忆录》，第3卷第211页和第558页。

③ “莱茵兰，即莱茵河的左岸，它构成一个阶梯……如果法国在占领它之后，撤出这个地区，法国就失去了安全的感觉，正确的说，法国失去了安全”。对《泰晤士报》记者的谈话（《战争回忆录》，第3卷第560页）。

④ “如果德国单独控制了年产一亿四千万吨的煤矿以及鲁尔的工业，德国将恢复它在经济上的雄厚势力并且同时就会重新拥有成为威胁的一切手段”（同上，第561页）。

况下取得自己的地位吧！請他們選擇历史所突然賦予他們的机会吧！請他們將查理大帝已帶進墳墓里的这个机会交还给古老的西方吧！”^①

戴高乐关于佛朗哥政权的态度也有同样的转变：1945年8月24日^②戴高乐宣称：“我們和全世界都认为，标志着民主力量胜利的和平应该在西班牙引起某些变化，我們希望这些变化不带来痛苦。”

但是，1951年，戴高乐却要求佛朗哥的西班牙一起反对苏联：“无论人们对西班牙目前统治的制度有什么样的看法，西班牙的人民是可以引以自豪和勇敢的，西班牙的領土是西方主要堰堤之一，因此，西班牙人民应该立即併入这个整体。”^③

1959年9月5日，西班牙外交部长卡斯蒂埃利亚在和戴高乐会见后說：“戴高乐將軍对我說，他认为佛朗哥將軍和西班牙人民对世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戴高乐將軍非常滿意地和我談起西班牙在稳定局势方面的成就，他认为这是我国朝着加入西欧整体方向迈进的新的一步。”^④

事实上，促使法国资产阶级提出欧洲的整体政策是因为它需要依靠佛朗哥主义和阿登納的德国来加强它对法国人民的統治。这就是为什么戴高乐最后贊成了同重新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建立欧洲整体的观念和共同市場的观念。德帝国比战前拥有更雄厚的工业潜力并重新占有了薩尔，虽然戴高乐在1952年还企图将薩尔最終地併入法国的經濟范围之内。

正像资产阶级垄断集团的领导人物不止一次地闡明过的那

① 1951年1月7日在尼姆的演講：《法国仍將是法国》，第349—350頁。

② 《人道报》，1959年9月7日。

③ 《战争回忆录》，第3卷第305頁。

④ 《人道报》，1959年9月7日。

样，羅馬条約的簽訂是出于政治原因，也就是說階級利益上的原因。奧比化学产品和肥料公司董事长兼總經理加斯洛罗夫斯基在羅馬条約批准前在一个名叫《企业》的刊物上写道：“共同市場的建立是一种政治行动。向其它工业提供原料的化学工业應該跟上去并且十分自觉地加入这个运动。”

紙張和板紙托拉斯也敲起了同样的鐘声：1957年初，法国紙漿、紙張和板紙同业公会技术中心的經理說：“欧洲未可知的前途向人們提出了一系列問題，我們將深刻地研究這些問題，并希望得出結論，但無論如何也不希望研究的結果妨碍相应的政治措施。”

最后，在条約批准后，毛紡工业托拉斯得出了以下的結論：“現在早已不是贊成或反对这个条約原則的时候了，因为，归根到底，指导各签字国政府的是比經濟原因具有更重要意义的政治原因。”^①

但是，政治动机还不足以說明法国資產階級为什么决定贊成建立共同市場。还需要从經濟观点上去闡明這個問題。法国資產階級內有一部分人认为在共同市場上有油水可撈。这是法国資產階級中的哪一部分呢？它代表的是哪些公司和集团呢？这就是我們現在所要闡明的问题。說明这一点就能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戴高乐制度是建立在什么样的經濟基础上的。关于这点，垄断資本統治集团的动向和戴高乐主义所同时采取的相应措施是頗为說明問題的。

一体化的第一个措施是欧洲煤鋼联营，当时法国資產階級是在美国压力下发起这个組織的，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法

^① 《紡織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同市場反映的結論》。《經濟金融通訊》，1958年1月30日。

国鋼鐵工业依凭馬歇尔計劃所提供的美元已在法国工业集中和現代化上作了重要的努力。鋼鐵方面的主要垄断集团特别是法国东部的鋼鐵垄断集团想將他們的产品出售給德国的加工工业和軍事工业(这是支持重新武装德国的交換条件)加强他們在薩尔的地位并且期望达到他們在三十年來徒勞无功地所追求的目标：摩泽尔河的运河化。因为，实现了这一点可以使他們縮減鋼鐵輸出的費用和由魯尔进口的焦炭的价格，从而加强他們在欧洲市場和世界市場上的地位。但是，煤鋼联营建立后，法国資本主义却出現后退的局面，它在1952—1954年期間限制了共同市場在其它产品方面的扩展：就是鋼鐵工业本身也有一些部門举足不前，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因为西德工业以大大超过人們想像的速度恢复起来了，再者，力量的对比已不允許法国全面保持薩尔地区。此外，西德政府拒絕了摩泽尔的运河化。这就是为什么許奈特和洛林的一部分鋼鐵工业反对欧洲防务集团，虽然欧洲防务集团是欧洲煤鋼联营必然的延續。这不是由于他們反对重新武装德国，而是反对欧洲防务集团內的經濟条例，这个条例規定要把欧洲六国經濟一体化加以扩大。1954年許奈特公司的报告宣称：“欧洲防务集团方案的条例以及欧洲煤鋼联营向特种鋼市場方面的扩展向法国相当的一部分工业提出了一系列折磨人的問題。”

一部分老板“由于政治原因”对欧洲防务集团仍持贊成态度。金融資本中的一部分人，如代表东方汇理銀行利益和作为欧洲經濟合作組織的贊助者的吉斯卡尔·德斯坦自始至終支持欧洲防务集团。但前法国业主总联合会主席吉鈕，化学工业联合会，鋼鐵业利益方面的一些代表，如拉蒂，李卡尔以及特别是代表机械制造业的麦特拉尔則十分强烈地反对欧洲防务集团。麦特拉尔曾經暗指摩納說过：“一切事态的发展都表明，似乎勢

必将有一种名副其实的一体化狂来助长一种联营的形成，而这种狂热又像是由一个无形的乐队指挥熟练地指挥着的。但是，联营的发起人目前开始担忧，如果没有军事的、农业的、医学的以及其它方面的联营组织从旁支持的话，那末这个联营的寿命是不会长的。Quos vult perdere Jupiter dementat^①”。

在同一个时候，法兰西人民联盟也采取了同一个立场：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周刊《联盟》报1954年2月4日写道：“法国拒绝被关在六国小欧洲之中”。而两个月之后，1954年4月7日戴高乐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在我看来，应该是事实上的欧洲。我认为，欧洲是由直布罗陀到乌拉尔，从斯皮次伯根到西西里，而不是局限于查理大帝帝国的领域内，由德国独霸领导权的法德集团”。

他还用同麦特拉尔一类的词句十分猛烈地攻击摩纳，称他为这个政策的“献策人”。然而，几年以后，戴高乐分子批准了建立共同市场的罗马条约。戴高乐上台后，他不但没有阻止实行这个政策，反而成为实行“局限于法德集团的欧洲”政策的健将，虽然他在1954年和许奈特同时并同样的猛烈地谴责过这个政策。其原因是，在这段期间，法国垄断资产阶级对共同市场的立场由于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有了完全的改变。

一、在1954—1958年期间，法国资本主义经历了它在战后经济周期中重要的上升阶段，最后两年（即1956—1958年，在这一期间签订了罗马条约）它的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包括西德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像以往的惯例一样，这种情况使它产生了无限度发展市场的幻想。这些幻想在短时期内缓和了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某些矛盾，削弱了中小企业对欧洲一体化的反抗，他

① “丘比特打算使谁一败涂地，他就会把他弄得神经错乱”，见《机械工业》1953年3—4月号增刊，第29页。

們以为在极度繁盛的市場里，有能力保持自己的地位。

引起这次經濟高漲的另外一些原因是向大企业进行固定資本投資的增长和資本集中的加速，而一系列稅收和币制措施又加速了資本的集中。这个双重运动由重工业发展到加工工业，提高了几个主要部門的生产力水平，局部或全部弥补了这些部門在过去一些年代里的落后状态。1958年法国在工业方面集中的水平与西德相等。^①在化学和商业方面集中的水平，法国略低于西德，而在冶金、紡織、建筑和食品等工业方面却高于西德。

二、德国資本主义和法国資本主义在薩尔問題上所达成的妥协使法国东部的鋼鉄业得到了一定的益处。阿登納以西德的重新武装和提前合并薩尔为条件，最后同意了摩泽尔的运河化。此外，虽然許奈特未能像他所企图的那样最后掌握沃耳克林根地区的罗埃希林鋼鉄厂，但是，法国鋼鉄业仍然保持了对一系列重要企业的控制(阿貝尔格魯特，馬努薩尔等)，特别是我們以后將談到的，即鋼鉄工业在魯尔地区的采矿业中的地位得到了大大的加强。

三、但是，促使法国大資產階級采取一体化政策的主要原因还在于1956—1958年期間在法国特别是在非洲发现和开采了新的动力資源和矿产資源。在法国，拉克天然气重要的面层已于1957年投入生产。这个廉价的动力資源使某些工业可以生产其成本同共同市場的其它各国相竞争的产品。法国中部的鋼鉄业和許奈特曾力爭使拉克的天然气輸送到圣迪济安和克勒佐。他們反对欧洲經濟复兴的情緒，自从他們在这个問題上得胜后已趋于平靜。此外，由于拉克的天然气只供应大企业，因而它的

① 据欧洲經濟集团的統計，隶属于法国最大的五个壟断集团的各企业雇用了全国百分之七十五的劳动力，而西德雇用的劳动力占全国73%（《关于欧洲經濟集团各国經濟情况的报告》，1958年9月第75—76頁）。

开采加速了資本集中的过程。1958年10月22日戴高乐的部长拉蒙內宣称：“当共同市場随时有可能破坏某些結構的时候，許多工业家将需要重新考虑他們的制造工作，整頓他們的生产，紧縮某些部門……并最終同其它企业合并，使生产能够获得利潤。这样，他們将在許多情况下联合起来，申請使用天然气。”^①

●但是，从这个观点来看，得益最多的工业部門是化学和炼鋁工业，其中出售和开采貝阿納天然气的大公司是共同市場最坚定的支持者，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我們在这里看到的是哪些公司呢？

首先是石油公司：阿基坦国营石油公司，这是一家受法国石油公司控制的将煤气出售給用戶的合营公司，德馬賴兄弟公司，巴黎荷兰銀行，罗尼—普朗克公司等。

其次是法国最大的化学公司圣哥班、貝西奈、皮埃尔費特、罗尼—普郎克、庫尔曼等。它們合資利用拉克的天然气生产銨、乙炔、氮肥料、尿素、塑料、甲烷等^②。在上述的生产活动中巴黎荷兰銀行起着首要的作用。貝西奈和犹齐諾集团垄断法国全部鋁的生产，其鋁的价格原已比欧洲竞争者所生产的要低。它們还在兴建兩家利用拉克天然气所生产的电力进行生产的工厂。这些垄断集团的工厂生产的鋁加上它們在喀麦隆的子公司阿呂卡姆公司的鋁，使它們成为欧洲大陆最大的鋁的生产者(1958年

① 《新學府》，1958年11月6日。

② 在即將生产銨、乙炔的阿基坦化学公司的資本中，全国氮气工业局占28%，貝西奈公司占21%，圣哥班公司占21%，皮埃尔費特公司占20%，巴黎荷兰銀行占10%。在即將生产氮肥料的拉克氮气公司資本由圣哥班，貝西奈，罗尼—普郎克等公司以及麦勒工厂和巴黎荷兰銀行提供。在即將生产甲烷的拉克甲烷公司的資本中阿基坦化学公司占50%，庫尔曼公司占50%。

为十七万吨,1961年为二十五万吨)①。

此外,从拉克天然气中每年将提炼一百二十万吨硫,这个产量大大超过了法国工业的需要;由于硫的生产同利用天然气有联系,而且不能停产,所以共同市场势将成为硫的不可缺少的市场。

法国本土铀的生产占欧洲大陆的第一位(1958年五百五十吨,由于位于下卢瓦尔的埃斯卡尔皮埃尔的两家在1957年7月1日开工的工厂以及在上维也纳的克罗兹勒工厂的建成,1962年的产量将达到一千五百吨)。仅克罗兹勒一家工厂就己能按同国外相等的价格满足法国对铀的需要。由于在黑非洲发现了许多丰富的矿藏,其中有1962年将开采的加蓬木纳纳矿,因而与铀的生产有利益关系的法国资本,正像巴黎荷兰银行所主张的那样,打算通过和德国资本的合作而在欧洲六国集团中起首要的作用。欧洲原子能联营组织要实现也正是这一点,正如1958年9月戴高乐内阁部长诺代在日内瓦所宣称的那样,法国资本企图在其中掌握“领导权”。举出下一点很能说明问题,这个部长曾反对签订各种欧洲条约,而现在由于这个原因他却同意组织欧洲经济集团。此外,在与铀和核子能生产有利益关系的大公司的背后,我们可以发现大名鼎鼎的各化学工业公司。库尔曼公司控制了铀的生产,它掌握了西方矿业公司50%的资本,而后者控制了埃斯卡尔皮埃尔和克罗兹勒的两家工厂。在核动力方面占首要地位的有贝西奈、圣哥班、库尔曼和犹齐诺等公司,其次是诺贝尔一波才尔公司、罗尼一普郎克公司和它的子公司普罗拉博公司、液体空气公司、皮埃尔费特公司,此外,还有冶金业、机器制造和电子设备制造方面的几家主要公司(洛林一

① 1958年西德的铝产量为十六万吨,意大利为七万吨。

埃斯科公司、克勒佐鑄造公司、哈佛尔金屬压延拔絲公司、大西洋潘諾埃—盧瓦尔造船厂、阿尔薩斯机械制造公司、拉多公司、巴布高克与威尔高克斯鍋炉公司、阿尔斯多姆公司、湯姆遜—豪斯頓公司、无綫电报总公司)。在上述所有公司的背后，主要还有巴黎联合銀行，許奈特集团和巴黎荷兰銀行；这些集团集中了它們在工业上和金融上的手段建立一系列的新公司：普罗帕原子公司以及兴建同位素分离工厂的法国原子公司；主要还同美国威斯汀豪斯和通用电气公司签订了協議，这两家公司生产美国仅有的两种类型的反应堆。

但是，在建立共同市場和欧非联营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那些对于銷售和加工热带产品很感兴趣，特别是对开采丰富的矿藏，首先是撒哈拉的石油和煤气发生巨大兴趣的资本主义公司。

几年以来，热带产品的銷售受着狹窄的法国市場的限制。1956年年底，劳朗斯先生在給經濟理事会的报告中写道：“法国本土的市場似乎已接近饱和点；不可能扩大在法国本土以及法郎区国家的銷售，其原因有时是由于在上述領土上产品的竞争，有时是由于购买力低下所造成的。只有国外市場才能接受这批有迅速发展可能的产品（特别是咖啡和可可）。

事实上，除了咖啡和可可之外，还有落花生、其它油料作物、香蕉、木材（加蓬木^①等）、龙舌兰，特别是巴西护謨树（橡胶植物）种植場将提供的乳漿。这些种植場是最近几年来由那些从印度支那撤出的各公司所开辟的。这些法国资本主义企业垄断了生产，垄断了向小生产者的收购和产品的銷售。对他們來說建立欧非市場是有利可图的，只要这个市場能不受其它热带国家，即英镑区国家的竞争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他們反对英国提出的

① 非洲出产的一种紅木材料。——譯者

自由貿易区的原因)。这些公司都是受大的投資銀行控制的企业,这里名列前茅的是巴黎荷兰銀行、东方汇理銀行、巴黎联合銀行和烏尔姆集团。

从正在实现或即将实行的龐大的工业計劃来看,拥有比法国市場吸收能力大得多的銷售市場就越来越显得必要了。这些計劃有的涉及几內亚的鉄礬土,有的涉及毛里塔尼亚和加蓬的鉄矿,有的涉及塞內加尔和几內亚的磷酸盐,有的涉及毛里塔尼亚阿克儒特的銅,有的涉及加蓬的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資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扩張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此外,十年来所建立的各大公司,在开采磷酸盐方面(多哥貝宁矿业公司和塞內加尔塔依巴磷酸盐公司),开采銅方面(毛里塔尼亚銅矿公司),开采鉄矿方面(科納克里矿业公司、毛里塔尼亚鉄矿公司、梅康博鉄矿公司),开采錳矿方面(欧果韋矿业公司),开采鈾方面(法朗斯維尔鈾矿公司),生产鋁方面(弗里阿公司),都是由一小撮大的化学公司(貝西奈和皮埃尔費特),制鋁公司(仍是这个貝西奈和犹齐諾),有色金屬公司(龐納罗雅公司和莫克塔一厄耳一阿迪德公司)和鋼鉄公司(犹齐諾、馬林与奥梅庫尔公司等)組織起来的。这些公司本身又和三个銀行,即巴黎荷兰銀行、洛希尔集团和巴黎联合銀行有关系,而其中第一和第二名銀行显然占首要地位。

然而,无疑的是,1956年在撒哈拉发现石油和煤气这一事实是使法国垄断資本作出决定的主要因素^①。如果說,墨西拿會議(1955年6月)标志着“欧洲复兴”的起点,那么只是在一年之后,即在1956年6月,当已經完全可以肯定撒哈拉石油蘊藏丰富

① 1956年1月在厄德热累地的探井开始噴油;同年6月12日在哈西一麦薩烏的探井开始噴油,以后坦岡土林的探井也噴油了,同年年底哈西一尔梅耳冒出了煤气。

的时候，法国政府在威尼斯会议上才第一次表示打算使非洲参加共同市场。法国帝国主义因为有了撒哈拉的石油就企图使共同市场内的资本主义各国力量对比对它有利。因此，1957年11月29日《法兰西生活》在谈到开采撒哈拉石油时写道：“这个新事实的重大意义超过经济上的意义。它将提供我们，而且还将继续提供我们高声说话的权利。首先是在欧洲。如果我们善于和德国、意大利以及其它国家合作，以便共同开采撒哈拉的丰富资源，那末我们参加欧洲经济集团是会有意义的。”

1958年1月10日，同一家报纸重新提出了这个观点：“德国、意大利和荷兰资本的加入会使欧洲经济集团的建立具有意义。法国也因此将昂首由正门进入共同市场，而法国在共同市场里的一些其它方面显然处于低人一等的境地。欧非联营要末就包括撒哈拉在内，要末就不建立”。

而且，在1956—1958年期间新建立的四十四四个开采石油公司(包括法国石油公司的分公司)背后，人们所发现的仍然是在矿业公司背后的那些银行。其中占首要地位的，还是巴黎荷兰银行和洛希尔集团，其次是巴黎联合银行，再其次是东方汇理银行、拉萨尔银行以及许奈特集团。

由此可见，法国国内促使建立共同市场和欧非联营的经济力量主要是由在石油、化学和矿业工业方面势力雄厚的大公司构成的。这些公司正在开采或即将开采撒哈拉的石油和煤气以及最近在非洲新发现的丰富的地下矿藏和国内的铀和铁矿，拉克的天然气及其副产品。

这里所指的是目前金融资本最具有活动能力的公司，这些公司与大投资银行有着密切的联系，后者同时还控制着法国加工工业中最重要的一些企业。^① 这些银行指望依靠从开采非洲的矿藏和石油资源中所获得的利润来发展和它们有联系的工业

公司，并且在筹建共同的金融集团中扮演头等重要的角色。从法国方面来说，对创立和批准共同市场负有主要责任的就是由银行利益和工业利益的合并而构成的这些集团。

就是上述的大资本集团借助于一系列的妥协^②和使罗马条约得以获得批准的策略手段，联合了所有的垄断部门并带动了整个资产阶级，战胜了中产阶级的抵抗和工人阶级的反对。

也正是同一资本通过乔治·维利埃正式要求戴高乐采取赞成建立共同市场的立场。1958年11月4日，法国全国业主理事会主席在里昂说：“欧洲经济集团对我们国家来说既是一场考验，

① 可以举出以下一个例子，参加巴黎荷兰银行董事会的有下述各工业企业的经理：贝西奈、圣哥班、罗尼—普朗克、诺贝尔—波才尔、洛林—埃斯科、索拉克、法国北方钢铁公司、阿尔萨斯电气公司、无线电报总公司、法国电力总公司、法国广播公司、电报电缆公司、米许林轮胎公司、雪铁龙汽车公司、庞哈尔—勒瓦索汽车公司、霍奇斯—勃郎特公司、圣路易制糖公司、塞伊制糖公司、阿歇特出版公司、也就是化学工业、钢铁业、电气业、有色冶金业、糖业和出版业的王牌企业。

② 各生产部门垄断集团的特殊利益之间的妥协建立在下列基础之上的：

1. 共同市场的六个国家保持一个共同的尽可能高的关税壁垒并反对建立自由贸易区。因为，如果生产原料（石油、矿石）的各公司不反对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话，化学工业、纸张和板纸业、钢铁业等垄断集团是无法向前发展的，它们如上所述的原因，并不害怕德国的竞争，但是，却对英国化学工业、美国和瑞士化学工业、斯塔的那维亚诸国的纸厂以及英国钢铁业有所畏惧。

2. 在十二年或十五年期间逐步实现互相自由进口的各项措施（煤和钢方面的情况与此相反）。

3. 法国政府保证向大公司提供贷款并在征税方面给予优待，以便这些大公司能够在过渡阶段时加速它们的投资和资本的集中积聚的运动。

另一方面，当所谓“保障”的条款（相等的工资，协调共同市场内部社会负担和竞争条件）列入条约时，法国垄断集团获得了对竞争者施加压力以及击垮资产阶级其它阶层抵抗的手段，法国垄断资本在后者中间制造一种幻想，似乎这些阶层以摆脱由于法国市场向德、意产品开放而遭受到的威胁。

又是一个机会，我不久前向戴高乐将军說明的也就是这一点，当时我要求他以他个人所拥有的威望庄严地宣布共同市場是必須建立的。”

我們看到在戴高乐將軍周圍的首要人物中有上述壟斷資本的代表，这些代表起先出现在法兰西人民聯盟的領導機構，以后又在保卫新共和聯盟的領導機構中出现，正是这批壟斷資本在建立戴高乐制度的时候夺取了国家机器。

关于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撒哈拉事务部长苏斯戴尔在1953年强烈地反对欧洲防务集团，而在1958年11月却高喊：“欧非联营，这就是前途”^①。与此同时，戴高乐政府正式采取支持共同市場和欧非联营的立場，并在1958年12月断然拒絕英国提出的自由貿易区方案，当时法国全国业主也非常明确地反对这个方案。

由此可見，我們可以从法国資產階級和戴高乐主义关于欧洲一体化立場的上述变化中得出結論，即戴高乐主义的經濟基础并不是代表法国資本主义的全部，而仅仅局限于其中最現代化的一部分，也就是正在发展而同时最具有世界性的資產階級。这里包括大銀行、石油、矿业、化学工业、黑色冶金等壟斷集团以及加工工业中最强有力的企业。所有这些构成了金融資本（銀行資本和工业資本結合的产物），也就是目前的法国帝国主义。这个帝国主义和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时相比具有一定的特点。

的确，目前的法国帝国主义已失去了列宁在1914年公正地賦予它的“高利貸資本主义”的特性。列宁当时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法国資產階級主要以国家借貸的形式，将資金在国外而不是向自己的殖民地工业企业进行投資。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資

^① 《經濟和金融通訊》，1958年11月24日。

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指出：“在英国占第一位的是它的殖民地領土……英国資本的大量輸出，同大量的殖民地領土有最密切的联系……法国的情形則不同。它的国外投資主要是在欧洲，首先是在俄国……，并且多半是借貸資本，国家公債，而不是对工业企业的投資。法国帝国主义与英国殖民帝国主义不同，可以称作高利貸帝国主义”^①。

然而，在1913年法国帝国主义确是高利貸帝国主义，在兩次世界大战之間却已逐漸有了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資產階級輸出的資本几乎全部是对工业企业的投資（主要投資于石油和矿业），其中多半是向自己在非洲殖民地的投資。另一方面，由于法国資產階級在1939年大战之后失去了对外国的最后一笔債权，所以可以說，它已不再具有1913年标志着法国帝国主义的高利貸特性。

同时，这个帝国主义显示出了它在国内和在国外經濟領域中进行擴張的新的野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当法国資產階級企图尽可能扩大它的殖民地以及以国家借貸形式向国外輸出資本时，它向加工工业进行的投資是比較少的，当时它采取較高的关税壁垒来保卫它的加工工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方針，尽管在1918—1929年期间在法国国内出現了一个重要的工业化的高潮，而在殖民地（主要在印度支那）的投資也有了增加。法国資產階級只是在开始感受到1929年的經濟危机的后果之后，才加强了关税壁垒（正是法国資產階級“发明了”确定限額制度），而工业垄断集团繼續让“限界的”企业存在。这些企业的高成本决定了市場的价格；“工业協約”制度使垄断資本获得足够的利潤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卷第235頁。

率，同时保持着整个法国工业的停滞不前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法国比在其它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上述的战略显然已经不适用了。这时，法国资产阶级必须在区域上缩小了的资产阶级市场之内生存下去，并且在丢失了它国外投资的主要地区（东欧和远东）之后，寻求一个新的、更强有力的工业基础。为了不失为一个资本主义强国，法国资产阶级必须将数量更大的资金投入法国国内能使它在世界市场中占据一定地位的现代化大企业。它事实上也这样做了：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从国有化，从在国外被撵出来的企业中和从叙利亚以及后来从越南遣返回来的侨民那里取得了资金，特别是因为从对法国工人阶级进行超经济剥削中获得了资本。^①法国资产阶级在1946—1953年期间特别在原料工业，首先是在钢铁工业方面作了一番努力，而在1953—1958年期间这种努力则特别集中在加工工业方面。

从它的结构来说，法国帝国主义是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它期望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总危机的目前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强国的舞台上演出它自己的戏。虽然它的能力受到它本身力量弱的限制，法国帝国主义仍然是帝国主义矛盾加深的重要因素。

法国帝国主义重建和集中了它的各生产部门，并将其现代化，拥有可能属于它的动力资源的思想冲击着它。法国曾因没有这些动力资源而在十九世纪和英国特别和德国比较而相对地逊色。此外，法国人口在五十年停滞并有减少的趋势之后，突然

^① 关于垄断资本对工人阶级超经济剥削以及它的发财致富，请参看我所著的《垄断资本向民族进攻》一书（第164—251页）；至于有关垄断资本的政策，该书第293页对1947—1953年时期所作的某些估价在今天有修改的必要。

有了很快的增加，^① 这点也刺激了法国帝国主义。东方汇理銀行董事长在1959年6月17日的报告中也流露了法国帝国主义的野心：“大量新资源的发现向我们提供了意外的经济机会，和我们欧洲邻国的合作是促使我们努力的一个新的刺激因素，我们人口的增长标志着我们的生命力，使我们可以毫无顾虑地接受这种合作。因此，大有希望。”^②

戴高乐个人，1958年10月4日的宪法以及戴高乐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系，也就是说，戴高乐制度十分确切地符合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法国资本主义中这个进攻性的一翼的利益，它期望通过共同市场来在整个欧洲加强和发展已在法国开始了的资本集中的过程。

戴高乐企图在欧洲六国中扮演政治角色的野心是以金融资本在经济方面扮演的同一个角色的意图为他的客观基础的。在成为院士之前，直到1942年都担任冶炼公会机关刊物《时代》经理的夏斯特内在戴高乐制度建立前五个月时，曾对这项具有世界性野心的政策作了下述的概括：“当距离实际上已不存在，而人已经征服了恒温层的时候，狭隘的民族主义已过时了。但是，有一种民族主义是卓有成效的：它的口号不能再是“法国单独干”，而是“在和自由国家的合作组织中法国位居第一。”^③

“自由”国家是指那些只有垄断资本才有自由的国家，的确，我们看到戴高乐执行的就是上述这个政策。

① 从1860—1946年的八十六年期间，人口只增加了二百七十万人，而从1946—1960年的十四年期间，却增加了五百二十万人（平均每年增加三十七万五千人，其中出生比死亡多三十二万人）。1960年1月1日，法国共有人口四千五百三十五万五千人。

② 《新闻报》，1959年6月18日。

③ 《震旦报》，1958年1月22日。

第五章 戴高乐政府上台以后

为金融资本的欧非共同体 政策服务的戴高乐主义

集中全部力量，以便在开发非洲和撒哈拉财富的事业中，占据优势地位；确保首先是同美国资本主义、英国资本主义、其次是德国资本主义之间必不可少的合作；掌握整个欧洲资本集中运动的领导权。这就是法国金融资本在第四共和国末期所要努力达到的三大主要目标。戴高乐政权的登场，为上述三大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强有力的援助。

第一，共同市场条约一经签订，法帝国主义统治集团就立即联合起来，以便搜刮法国资产阶级在非洲经营的企业里所积累起来的资本以及法国各中产阶级从这些企业中得到的部分收入。

1957年3月25日罗马条约签字以后，一个月內就先后成立了三家金融公司，其中两家由巴黎荷兰银行和洛希尔集团创办。紧接着两个月以后，在巴黎荷兰银行主持下，又成立了第四家金融公司。这些公司都是法国各大银行和各大工业企业结合的产物。①这四家公司是：

① 居伊·德·洛希尔男爵在1957年3月29日向公众介绍海外金融公司时，十分清楚地阐明了在共同市场范围内建立这些公司的目的和原因。他说：“你们知道在法属西非，法属赤道非洲，马达加斯加以及在撒哈拉等地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将在最近加以开发，这是由于建立了一批十分重要的金融公司。参加这些公司的有我们的欧洲和美国伙伴。这些新公司的开采范围

海外金融公司(简称科非迈尔)——1957年3月成立,是由巴黎荷兰銀行和洛希尔銀行創办的。按照这两家創辦者的提法,成立該公司的目的是“在海外屬地和撒哈拉地区正在兴办或发展中的工业、矿业以及动力公司里参与股份”。

这家公司的成員还有:里昂信貸銀行、巴黎国家貼現銀行、总公司銀行、法国国际商业銀行、商业信貸銀行、工商信貸銀行、东方汇理銀行、巴黎联合銀行和烏尔姆銀行。

法国撒哈拉公司——成立于1957年4月30日。发起者是东方汇理銀行、拉薩尔兄弟銀行、里昂信貸銀行、欧洲工业金融联合銀行和巴黎荷兰銀行。其他如洛希尔銀行和另外十八家法国銀行也都是这家公司的成員。

阿尔及利亚經濟开发金融公司(简称科非迈尔)——1957年4月3日成立。发起者是北非工业銀行、法国国际商业銀行、巴黎联合銀行、里昂信貸銀行、阿尔及利亚公司和烏尔姆銀行。这家公司的資金是由十七家銀行和十二家工业公司(君士坦丁磷酸盐公司、罗舍特板紙公司、許奈特集团、諾貝尔一波才尔、普罗吉尔和犹齐納等)分担的。

撒哈拉技术金融联合公司(简称塞戴斯)——1957年6月28日由巴黎荷兰銀行发起成立。璫弗利茲—許倫伯格以及同撒哈拉有关的四十家公司都参加了这个联合公司。

戴高乐政权的上台,推动了資本的集中运动。1958年7月,由于蓬皮杜担任戴高乐內閣办公厅主任,这就使海外金融公司和貝西奈—犹齐納集团結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并在同年11月共同創辦了非洲鋁业持股公司(简称科馬尔)。原来已經控制着鎳、鉛、銅等有色金屬工业的洛希尔集团通过了这家公司打入当

各有不同,但它們都將具备国际的規模。科非迈尔將向公众提供参加这个事业的條件,并且保證股票的持有者有可能参加所有这些公司。”

时尚未插手的另一个领域——制铝业。^① 海外金融公司是1957年以来成立的金融公司中最活跃的一家。1957年年底，它的资金就已经增加到一千二百五十万新法郎，1959年4月，它在非洲的投资高达九百五十万新法郎（分配百分比如下：制铝业：32；矿业：13.37；石油：12.80；磷酸盐：10.64；运输：4；农业：2.4）。

1958年12月，巴黎荷兰银行和朗贝尔银行（该行和洛希尔集团有密切联系）为了“给装备和开发撒哈拉地区的各项企业提供资金”，又伙同二十家保险公司和十三家工业公司（雪铁龙、柏利埃、尤尼克、邓禄普、许瓦兹—霍蒙、梅林—齐林等）建立了第五家金融公司：“撒哈拉地区开发公司”。

至于阿尔及利亚本身，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阿尔及利亚经济开发金融公司”（科非迈尔）以外，1957年年底还成立了一个“阿尔及利亚工业发展研究所”（简称塞迪亚）。照该所创办者之一——北非工业银行所作的1957年年底报告中说：本所将由“在工商业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来共同进行探索、总结和指导工作”。实际上，这个机构所体现的不过是这样一种趋向，即各垄断集团直接通过国家机器来控制整个阿尔及利亚的经济。除了少数几个政府机关——非洲矿务局、储蓄金库和几家国有化银行而外，阿尔及利亚企业主总会、纺织工业联合会、机械工业联合会、公共工程联合会、保险业联合会、许奈特集团、乌尔姆银行、北非工业银行、洛希尔银行以及巴黎荷兰银行，都是阿尔及利亚工业发展研究所的成员。正如《法兰西生活报》所指出的：“塞迪亚简直是在起着阿尔及利亚当地政府（即阿尔及利亚产业

^① 科马尔监察委员会的五个成员中，有两位是巴黎荷兰银行的代表（安土瓦纳和提博特），一位是洛希尔的代表（日勃龙），他是里昂信贷公司和科非迈尔的经理。

局)和法国政府本身的會議机构的作用。”^①

戴高乐政府对私人公司是积极支持的；它的全部活动只是执行这些公司的計劃而已。《經濟金融新聞》这样写道：“政府当局所不断強調的君士坦丁計劃就是阿尔及利亚經濟开发金融公司在公民投票前夕号召大家儲蓄时提到的那个計劃。”^②

同样，臭名远揚的君士坦丁計劃的主要組成部分——波尼鋼鐵联合公司計劃是由鋼鐵垄断集团在1957年8月为了同一目的而創办的塞里薩尔公司所拟定出来的。1958年5月，为了“研究如何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一个使用天然煤气或精炼煤气的石油化学工业”，巴黎荷兰銀行、朗貝尔銀行、庫尔曼公司、液体空气公司以及皮埃尔菲特公司等又設立了另一个研究机构，这就是阿尔及利亚石油化学公司(簡称貝特拉尔)。1958年12月，在戴高乐宣布他那被称为君士坦丁計劃的阿尔及利亚五年計劃之后，这家公司又改成了股份公司。同一个月，洛希尔銀行又剛好在阿尔及利亚信貸銀行里参与了股份。《法兰西生活报》报道說：“这个措施是以兩家銀行在阿尔及利亚工业发展綱領範圍内进行合作所达成的協議为根据的”。同一时期，在已有的阿尔及利亚經濟开发金融公司之外，巴黎荷兰銀行和朗貝尔銀行^③又发起成立另一家同一类型的公司：阿尔及利亚开发和扩展公司(簡称索加尔戴克斯)。这家公司是在1958年9月成立的，12月便获得法国政府派駐阿尔及利亚总代表的认可。阿尔及利亚开发和扩展公司企图在执行君士坦丁計劃方面起主导作用。1959年4月，它

① 《法蘭西生活报》，1957年10月18日。

② 《經濟金融新聞》，1958年12月23日。

③ 朗貝尔銀行的董事長是巴黎荷蘭銀行的雷尔。朗貝尔銀行是由一些大保險公司、国有化銀行以及許多在法国本土和在阿尔及利亞的工业企业組成的。

作了如下的决定：开始时，首先将社会投资由四百万新法郎增加到二千万新法郎，然后再提高为一亿新法郎。此外，它还决定授权董事会发行九千万到三亿新法郎的债券。关于上述决定，《法兰西生活报》在1959年4月9日发表评论说：“正当政府采取重要措施（设立阿尔及利亚开发装备金库，给撒哈拉出产的煤气制定高价，决定建立波尼钢铁厂等）以利于实现阿尔及利亚工业化之际，索加尔戴克斯作出这样的计划，这说明了私人资本期望在最广泛的规模内参加实现君士坦丁计划的意图。”

由此可见，正如人们所预见到的当初戴高乐得以上台的根本原因那样，戴高乐政权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大规模扩张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政府当局已经把私人资本和国家资本之间的“合作”公开地提升到原则的高度。1959年6月17日，工商部长让内在阿尔及尔宣称：“我们正经历着一种纯粹的經濟冒险。这是一场困难重重的冒险，但是我们一定会得到辉煌的成就。为了获得这些成就，私人资本和国家资本必须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唯有通过这种双方协作，我们才能实现工业上的均衡增长。至于政府方面，它正在为这个鼓舞人心的事业，恢复社会安宁和秩序的事业，给以最大可能的援助。”^①

的确，“君士坦丁计划”估计到资本主义企业和政府部門之间的密切合作。《經濟金融新聞》将拟制和贯彻这个计划所采取的工作方法归纳如下：“先由一些工作小组就整个阿尔及利亚各种问题进行研究，同时，对地区性问题和某种活动或对某个工业方面的问题也进行研究。”“私人资本方面的代表参加这些小组工作。各小组拟写报告和制订建议，并将报告和建議交由计划领导机构和刚刚在阿尔及利亚设立的經濟研究机构統一整理，

^① 《世界报》，1959年6月18日。

然后再由阿尔及利亚各省代表組成的委员会把提出的建議帶到巴黎去。”^①

这种合作并不到此为止。对于各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計劃还由专门設立的各种政府机构同私人合办的公司来处理。“阿尔及利亚冶金研究公司”就是一个例子。这家公司的职责是研究波尼鋼鉄联合公司的管理上和财务上的問題。波尼鋼鉄联合公司系由部分政府官員和阿尔及利亚开发和扩展公司全体創辦人組成。它在工作中同塞里薩尔公司，也就是同負責研究技术和經濟問題的鋼鉄垄断家們保持着密切联系。

关于企业的設置地点問題也是如此，阿尔及利亚当局将这个任务委托給阿尔及利亚工业发展研究所負責考虑。《新工厂报》认为，該研究所“是政府部門和工商界之間的一个驛站。”^②

当然，对于私人資本公司提出的建議，政府是一概批准备案的；此外，政府还能做到的是，当逢到私人資本公司之間，由于利害冲突爭执不下时，它便出面寻求一个折衷方案来仲裁解决。找到这种折衷方案常常是要煞費苦心的。例如，早在一年半以前就已經決定在波尼建造一座鋼鉄厂；由于鋼鉄垄断集团要求在沼气和燃料方面获得廉价供应，而石油垄断集团却只肯按照国际石油卡特尔規定的价格办理，因而产生了利害冲突，爭执不下，直到1960年5月，还没有結果。

第二，帝国主义的擴張和世界主义是有联系的；在这一点上，法国帝国主义是个明显的例証。法国金融資本在資本主义世界里比較薄弱，它要开发非洲財富就不得不向別国的資本求援，需要其他国家的投資。同时，单凭法国自己的加工企业是无

① 《經濟金融新聞》，1958年11月19日。

② 《新工厂报》，1958年11月11日。

法把非洲新近开辟的矿山和新建的石油企业的全部原料产品承包下来；因此，法国金融资本还需要利用参与投资国家的本土作为这些原料产品的销售市场。黑非洲和撒哈拉的几家主要矿业公司就是法国大银行在英国资本特别是在美国资本大量投资的情况下成立起来的。在科纳克里矿业公司和毛里塔尼亚铁矿公司里老早就有英国钢铁公司的股份；弗里亚公司也早就有美国奥林·马帖森垄断集团的股份；梅康博矿业公司有伯利恒钢铁公司的投资；其他沃哥乌埃矿业公司也有美国钢铁公司的投资。但是，说到撒哈拉的石油，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直到戴高乐上台为止，只有英国是当时唯一重要投资者；此外虽然也有几家美国石油公司插了一手，但毕竟还是些二等企业。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在克莱普斯公司和阿尔及利亚石油公司里分别拥有投资总额的35%和65%；在石油开采公司里，英国石油公司的投资虽然不多，但也占有一定的份量。当时就有人问：戴高乐主义一旦登场，那些不顾民族利益的分子将会采取怎样的态度呢？

原来，在戴高乐上台前不久，完全代表大金融界利益讲话的各专业报刊早已为敦请美国大垄断公司进入撒哈拉展开了宣传活动。1958年1月10日《法兰西生活报》这样写道：“一个重大的问题正等待着我們作出决定：除了已经在克莱普斯公司和阿尔及利亚石油公司里拥有股份的英荷壳牌石油公司以外，还要不要国际财团巨头也在撒哈拉保留一部分地盘呢？（这里所指的，已不再是那些早已插了一手的美国的“独立的”石油公司。）……在这个问题上，我們的见解是：毫无疑问，国际上最强大的石油集团是否参与撒哈拉的石油开发事业，关系到我国的民族利益。”（瞧，它指的是民族利益哩！）。据该报所举贸易上的理由是：“我們不能把自己置身于国际分配流通领域之外；因为，在将来，我們必定要把撒哈拉出产的石油拿到国际市场上去销售。”

該报还陈述了政治上的根据：“美孚油公司参与开采撒哈拉的石油——和我們期望德国資本在不久的将来也来参与开发撒哈拉石油的道理一样——除了具有投資上和技术上的意义外，更重要的是可以巩固我国在撒哈拉，也就是在阿尔及利亚的势力；因为，基于这种联合，我們的伙伴必然会維護我們共同占有的陣地。”

和石油有关的金融集团，一旦把政权直接掌握在手里以后，这种观点也就立刻占了上风。《法兰西生活报》于1958年6月20日这样写道：“可以肯定，在阿尔及利亚发生五·一三事件和戴高乐將軍上台以后，我国政府必将采取各种措施使我国在撒哈拉的投資得以开花結果。”事实也确是如此，一切都演变得頗为迅速。戴高乐政权登場后不到三个月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①把十四項許可証頒发給十二个石油鑽探集团，十二个鑽探集团所拥有的鑽探面积达六十二万五千平方公里。十二个鑽探集团中，就有九个外国資本参加。金融界报刊还振振有詞地加以宣揚道：根据最近所頒发的許可証来看，撒哈拉石油鑽探的国际化显然已經成为肯定了的的事实。^②这一回，法国政府不仅为美国資本敞开了撒哈拉的大門，同时也不遺余力地为欧洲資本打通

① 《法蘭西生活报》于9月5日写道：“这些許可証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內批准頒发的……公文程序处理得如此神速，这証明了政府已經下定决心，刻不容緩地从事开发撒哈拉的石油。”

② 撒弗萊普公司（即巴黎銀行、洛希尔銀行、烏尔姆銀行以及戴高乐最为亲信的顧問之一勒內·迈耶所在的比利时普尔非納銀行）根据領到的許可証，可以在七千九百五十平方公里范圍內进行鑽探。这家公司糾合了紐蒙特矿业公司（早就和洛希尔財团联合开采摩洛哥的鉛矿的、摩根財团中的最为强大的矿业托拉斯之一）和辛克萊石油公司（美国最大的“独立的”石油公司之一）。

道路。《法兰西生活报》于1958年9月4日写道：“特别令人注意的是在英国和美国石油集团之外，还冒出来一家意大利公司。政府当局把一项拥有一大片十分理想的、紧靠着克莱普斯公司开采的梯衰士林油层的地带的鑽探許可証，一并发給彼托罗巴尔公司和这家意大利公司；由此可見，政府当局毫不掩飾它鼓励欧洲資本参与开发撒哈拉石油的意图。”^③

尽管如此，当时参加分肥的美国公司中却没有新泽西美孚油公司，这是什么緣故呢？原来这家公司要在确保取得若干条件之后才肯駕临撒哈拉。法国政府于11月22日頒布“撒哈拉石

欧拉弗莱普公司（代表拉薩尔銀行和东方汇理銀行），弗朗加莱普公司（代表洛希尔銀行和烏尔姆銀行）以及科巴莱克斯公司（代表巴黎銀行）同瓦朗斯石油公司（这家公司44%的股份屬於英国石油公司，因而为英国石油公司所控制；此外，瓦朗斯石油公司里还有巴黎銀行和洛希尔銀行的資本）相联合，得到在一万一千四百平方公里范圍内进行鑽探的許可。

巴黎銀行、洛希尔銀行、烏尔姆銀行以及拉薩尔銀行，同美国独立的都市服务公司相联合，获得在四千一百平方公里范圍内进行鑽探的許可。

洛希尔銀行、烏尔姆銀行以及巴黎銀行伙同加拿大德里油公司，获得在一千八百平方公里范圍内进行鑽探的許可。

洛希尔銀行、烏尔姆銀行、拉薩尔銀行以及巴黎銀行和美国菲利浦石油公司，得到兩張許可証，鑽探范圍計达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五平方公里。

彼特罗巴尔公司（由国家出資的一家公司）糾合意大利的奥松尼亞矿业公司（实际上是爱迪生財团的子公司）获得在一千九百平方公里范圍内进行鑽探的許可。

彼特罗巴尔公司还糾合泛美石油公司（印地安納美孚油公司的子公司）以及一家法蘭西—怀俄明油公司的子公司，获得在二千七百平方公里范圍内进行鑽探的許可。

英荷壳牌石油公司以及阿尔及利亞石油公司（其中巴黎銀行和洛希尔銀行拥有一部分投資）获得在六千三百平方公里范圍内进行鑽探的許可。

^③ 《法蘭西生活报》，1958年9月4日。

油法”^①就为的是答应这些条件。根据撒哈拉領地部长代表“撒哈拉地区共同組織”发表的談話(見11月14日法新社播发的官方評論),該項立法的各項条款“是这样考虑制定的:通过承担义务及相互保証的办法,让外国企业同法国資本联合起来,共同开发撒哈拉資源。”

有了这个石油法,在撒哈拉展开活动的外国公司就获得了“按照国际市場例行价格”,也就是按照国际石油卡特尔强行規定的价格出售产品的保証。此外,外国公司还取得了石油运输和石油出口的垄断权,并根据卡特尔强加于石油生产国的陈規旧章,同“撒哈拉地区共同組織”平分利潤,而这种規章差不多到处都已經土崩瓦解了。例如在伊朗、埃及、摩洛哥和沙特阿拉伯,有些非国际卡特尔成員,如意大利、日本及美国公司同当地政府签署的協議中,規定在分配利潤时,外国公司只能获得40%,甚至25%,而石油生产国則应得60%甚至75%。委內瑞拉政府于1958年12月,不顧在本国开采石油的外国公司的抗議,把这些公司在分配利潤时所得的款額由50%降低为40%,而这些公司都是国际卡特尔成員,如美孚油公司、海湾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等大垄断組織的子公司。

美孚油公司从戴高乐政府那里得到了它在委內瑞拉政府那里得不到的东西之后,便同法国石油公司簽訂了一項經由德勃雷政府批准的協議。^②1959年1月初,这家公司与法国石油公司共同領到了在幅員辽闊的东埃尔格地区兩万平方公里範圍内进行鑽探的許可証。法国石油公司原想趁美孚油公司插手撒哈拉的机会,要求后者在委內瑞拉让出一席之地,或者至少在新成立

① 值得一提的是开始討論这个法案已經是兩年以前的事。由于当时社会輿論的反对,第四共和国未能將該項法案提交国民議會。

② 早在1956年政府当局即已就該項協議同兩家公司开始談判。

的公司里拥有投資的多数，但是結果全部落空，不得不接受美孚油公司提出的条件，即由美孚油公司在新成立的公司里拥有全部投資的50%，而法国石油公司却只占有35%，其余15%則归彼特罗巴尔公司。美孚油公司控制了新公司的各項活动。

在此以后，戴高乐政府又于1959年10月7日、8日頒布了一項有关开采石油問題的补充条例，規定凡是在撒哈拉和阿尔及利亚进行开采的石油鑽探公司一律免交資產进口的貿易稅。这种貿易稅的原定稅率是6—10%，如果照章征收的話，那么須要納稅的資產及事业費，估計不下数百亿法郎。^①就这样，和政府当局血肉相联的石油垄断資本有着利害关系的問題，只用几个星期的時間就在对它們本身有利的条件下順利地解决了；在解决这个問題的过程中法国人民沒有能够表示自己的意見，至于其財富被世界資本所瓜分的而又面临着几年来悬而未决問題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就更不讓他們表示态度了。

就这样，在1958年6月1日^②以后，法国石油公司就同英国壳牌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以及美国摩比尔油公司和美孚油公司等集团联合起来，于1958年8月成立了阿尔及尔炼油公司，后者又建立了专门提炼撒哈拉石油的炼油厂。正因为如此，十九家石油公司——其中除国际石油卡特尔成員美孚油公司、德士古油公司、摩比尔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和法国石油公司等大公司外，还有几家荷兰、比利时和德国公司——才在同年7月30日成立了“南欧油管公司”，鋪設了一条由拉弗拉經斯特拉斯堡到卡尔斯魯厄的油管，并在这些地方建立了四座炼油厂。同年11月，由拉薩尔銀行、洛希尔銀行、巴黎荷兰銀行以及

① 《新聞报》，1959年10月9日。

② 指戴高乐上台。——譯者

里昂信貸銀行所控制的一个大銀行集团,又主持成立了一家“欧非油管投資公司”,为鋪設欧洲和非洲油管提供資金。由此可見,1958年6月1日以来实行的石油政策,簡直是一幅戴高乐主义与金融寡头以及世界大資本层层相联的极为鮮明的图画。

戴高乐政府还不遺余力为邀請美国資本到法国本土上来投資进行工作。《新工厂报》于1959年1月15日写道:“我們已多次闡明,如果說,从法兰西民族的观点出发,外国資本大量投資到我国来会对我有所不利,那么,从共同市場的角度来分析,却有其可取之处。无論如何,巨大无匹的美国資本总是要投到欧洲来的,与其让它投到邻国去,然后再从那里把生产出来的商品拿到我国市場上来銷售,倒不如让它直接投到我們国内来,这才会有說不尽的好处。然而迄今为止,同我們的伙伴比起来,我国在这方面还是受惠較少的。”

1958年底到1959年初,在經濟領域里出現了种种措施,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将美国資本吸引到法国来。① 負責財政的国务秘

① 美国工业集团和法国工业集团在1958年間就汽車、石油化学以及原子能等方面签署了重要的技术財務协定。在汽車方面,西姆卡集团为了希望能夠抵制德国公司及德美合办公司的競争,讓克里斯萊集团占有它公司里全部投資已达后者全部資本的25%。法国主要汽車配件制造商杜塞利埃工厂同邦第克斯航空公司以及航空裝备公司合并之后,其貿易額增加了一倍,并从进出口銀行借到了六百三十万新法郎的貸款。在石油化学方面,貝舍尔勃隆集团使用美国奥朗尼特公司的執照設立了一座生产磺酸的工厂以便把这种产品拿到各共同市場成員国去銷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着滿足共同市場的需要,各主要化学及气体公司(庫尔曼、罗尼-普朗克、諾貝尔-波才尔、貝西奈、克勒貝-哥倫布)同石油公司(埃索-美孚油公司及法国石油公司)联合設立的布梯尔橡膠公司(簡称索加布)以及由該公司建立的美洲大陆以外的第一座这种类型的橡膠厂。

在原子能方面,为了制造原子反应堆,阿爾斯多姆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签署了一項技术协定;另外有几家公司(如克勒佐、电气材料公司、姚蒙

书吉斯卡尔·德斯坦說道：“法国政府已經采取措施，放寬了行政和稅收程序以便促进貿易并吸引外国投資，当然也包括美国的投資。法国愿意外国資本在其本土上設立企业并促使生产力上升。对于这种已經在法国投資的外国資本，法国政府給予安全上的保証。”^②

魯埃夫报告所表达的金融資本的战略主要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即依靠美国資本的出資来恢复支付平衡，活跃金融市場，掀起投資高潮，从而使1958年經濟衰退所引起的工业生产下降得以回升。

由此可見，戴高乐政府对于外国資本所給予的利益是第四共和国任何一个政府都未曾有过的。外国資本可以自由撤回本国，它們在法国賺取的利潤也可以不受限制地汇回国内；外国侨民可将其持有的法郎現款換成美金，在法国居住的侨民可以享有种种便利；在巴黎市場上购得的有价証券也可以自由流通，同美元区的貿易不再受任何限制。这些措施，再加上其百分比較之法国物价与外国物价平均差額要高得多的法郎貶值，有效地加速了外国資本在法国投資的进程。^③

公司、工业現代化公司等）和其他一家同行业的通用电气公司的主要对手、美国大壟断公司威斯汀豪斯成立了一个弗拉馬托姆公司。与此同时，为了满足欧洲原子联营的需要，威斯汀豪斯又联合弗拉馬托姆集团里的法国首腦許奈特集团，糾合西門子、菲亞特、夏勒魯阿等公司，組成了一个“共同体”，签署了共同进行生产的协定。

② 《新聞报》，1959年11月5日。

③ 1958年上半年外国投資总数为四千万美元，下半年上升为八千四百万美元，1959年上半年又上升到二亿二千万美元，其中九千万純屬美国資本。与此同时，美国資本在法国公司里占有的股份也有所增長，新設立的美国企业也大为增多。（以上数字系引自瓦隆向經濟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及美国商会駐法經濟顧問德勒古安对报界发表的一次談話。見《新聞报》，1959年11月4日）

这是全面性的规划。下面我们还会谈到，这种规划产生的重担全部落在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肩上。东方汇理银行行长米諾斯特认为“这些外国资本，在法国和非洲最近几年发现的动力资源和矿藏等财富未曾开发之前，对我们有着双重好处：既有利于我们发展生产装备，又可帮助我们实现支付平衡。”1959年6月17日，米諾斯特在他的一个报告里又谈到：“但是，能不能成功，归根到底还要看国内是否肯为政府当局采取的政策作出各项牺牲。”

法国资本主义与德国资本主义的 新“合作”：巴黎—波恩轴心

尽管如此，但是从1956—1958年期间，法国金融资本政策的基本方向却是同德国资本联合起来以便成立一个“政治和经济的”集团；有些垄断集团认为有了这个“政治和经济的”集团就能够把英帝国主义从欧洲排挤出去，又可以在力量雄厚上达到与美国和苏联相抗衡的水平。

在法国帝国主义统治集团看来，罗马条约必须签订的政治原因和它们本身的经济利益并不矛盾。法国的开采工业非常强大，但是，法国资本主义当前的特点之一是加工工业存在着两种显然不同的类型，即既有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又有中、小型企业。这样一来，法国金融资本同德国大资本之间就有可能进行合作，至少是暂时可以合作。

在非洲开发地下财富的各个公司认为只要它们有个较大的销售市场就行了，至于把产品出售给德国重工业和德国加工工业那却是无关紧要的；也就是说，只要它们能够获得日益增长的利润，那怕德国会占据优势，也不在意。正是为了这种原因，它

們才把法国一部分加工工业置之不顧，而为德国的工业制成品敞开了非洲市場的大門。

同大商业銀行血肉相联的法国各主要加工工业公司对于来自德国的竞争并不感到可怕，有的是由于它們掌握了一定的手段(例如以圣哥班和貝西奈为首的化学工业托拉斯、玻璃工业托拉斯和制鋁工业托拉斯，以及鋼鉄工业托拉斯、气胎制造业托拉斯、人造絲业托拉斯、造紙和板紙工业托拉斯、电子工业、黄麻工业等托拉斯都是这种情形)；有的和美国大垄断集团有联系；还有的——这一点尤其重要——則是因为同原来和它們展开竞争的德国大公司，在排挤法国和德国“边缘”企业以及加强剝削欧洲工人劳动力的基础上签定了協議，或者正在期待着签定这种協議。在这些集团里，法国鋼鉄垄断資本所占的地位特別重要。这首先是因为在法国所有的資本主义集团里，以鋼鉄集团在德国的投資为最多。它們在薩尔区控制着一些重要的炼鋼公司。例如劳朗—孟松桥集团就是通过这种手法在狄林鋼鉄公司里拥有資本总额的60%，其余部分則归德国股东占有。阿登納总理的顧問、德国方面最热衷于巴黎—波恩軸心的人物之一，阿布斯就是这些德国股东里的一員。阿布斯还同时在好几家法、德合营的公司，如薩尔信貸銀行和欧洲开发公司里拥有股份。薩尔信貸銀行和欧洲开发公司是由德意志銀行和巴黎荷兰銀行共同控制的，阿布斯是德意志銀行在这兩家公司里的代表。此外，孟松桥集团还在哈貝格炼鋼公司里拥有資本总额的60%，剩下的股份則屬于德国斯图姆集团。1956年10月20日法国鋼鉄产业公会主席拉蒂在哈貝格炼鋼公司成立二百周年的庆祝会上致賀詞，并強調指出：薩尔区仍将在法德兩國之間起“桥梁”作用。德国鋼鉄工业代表汉斯·龔特·苏尔在庆祝会上致答詞时也說：“哈貝格公司的发展証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法、德兩国的工业可

以互相交織在一起”。这种相互交織的程度是相当可觀的。就拿哈貝格公司來說，这家公司一方面已經在洛林区鉄矿公司里拥有投資，另一方面还是路易港塑料厂（即巴拉蒂那）的共同业主之一。同时，这家專門生产鉄管的哈貝格公司还把它全部产品的一半輸往德国。此外，还有属于盧森堡阿尔貝德公司（許奈特是該公司的副董事长）的布尔巴哈各工厂和另一家由法国劳朗集团控制的盧森堡哈基尔公司的圣英格貝特公司也是这种情况。

另外，在过去这几年来里，法国鋼鉄集团还在德国煤矿企业里广泛地扩充了陣地。法国鋼鉄企业本来可以从国内資源中得到焦炭的供应，但是它們宁愿购买魯尔区的煤矿，也不肯在采用洛林煤炭的炼焦厂投下資本。例如，温台尔就早在1953年，把弗萊德里克—亨利和罗伯—亨利等煤矿买了下来；阿尔貝德也买下了另外兩家焦炭产量为五百五十万吨的煤矿；至于西特洛和洛林—埃斯科則买下了焦炭产量为一百五十万吨的卡洛魯斯—馬格努斯和卡尔—亚历山大等煤矿。它們的产业就这样扩大起来了。1954年，有十家鋼鉄公司联合組成了一个西特沙集团。这个集团从法国政府方面得到了一百五十亿法郎的貸款，控制了魯尔区最大的煤矿公司之一——哈本納煤矿公司。1957年，法国鋼鉄工业从这个煤矿公司进口的焦炭計占它們从魯尔区进口焦炭总量的一半以上。反过来，德国弗利克財团則用出让哈本納煤矿公司得来的代价，在法国沙蒂荣—高門特里和諾夫迈宗等炼鋼公司里买进了大量股份。还在前不久，阿尔貝德公司在博胡姆的洛特林根矿业股份公司里买下了大部分股份，后面这家公司拥有兩家生产供炼焦用的煤炭公司和两个炼焦厂。

就这样，法国鋼鉄集团，特别是那些生产鉄和鋼、其产量分別占法国全国鉄产量77%和鋼产量67%的东部地区鋼鉄集团，

它們通过在薩尔的子公司和插手魯尔的办法，在某种程度上已經成了巴黎—波恩軸心的工业支柱了。同时，由于法国鋼鉄集团，尤其是洛林区的鋼鉄集团采取了坚决的外銷政策，这就更进一步地加强了它們这种支柱的作用。对于法国鋼鉄集团來說，只要它們自己能够把生鉄、原鋼、鋼材等出售給德国某些加工工业部門，即使这些加工工业部門的发展不利于法国企业和它們竞争，或是这些德国工业部門会把法国出售的生鉄、原鋼、鋼材等用来制造軍火，从而有朝一日回过头来侵犯法国人民，^①法国鋼鉄集团也是不大在乎的。有一家由鋼鉄老板主办的杂志还洋洋得意地写道：法兰西鋼鉄工业“是为全欧洲和全世界的加工工业服务的。”具体說来，1957年和1958年間，法国鋼鉄垄断集团出口的鋼是四百万吨多一点（占法国全国鋼产量27—28%），出口的鉄矿砂（从法国鉄矿开采出来的）占法国全国鉄矿砂总产量的40%。上述出口的鋼中有一百万吨，即四分之一是輸往西德。法国鋼鉄集团不仅为它們的“出口天职”自鳴得意，而且还在这种“天职”的推动下，千方百计地为实现它們业已花費了三十年的光阴仍未能实现的目标——把摩泽尔河运河化——而努力。結果，經過同阿登納历时数載和备尝辛酸的討价还价之后，尽管德国鉄路公司和萊因地区鋼鉄集团竭力反对，阿登納終于同意把摩泽尔河改造成成为一条可以行駛一千五百吨駁輪的航道。据专家估計，这一項改造工程完成以后，萊因的煤炭运往洛林的費用可以降低35%，洛林的鋼运往鹿特丹的費用可以降低60%，洛林的鉄运往魯尔的費用可以减少43%。但是，这样一来，洛林鋼鉄集团就把自己的利益同波恩的政策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①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罗亞尔煉鉄公司才会于1959年5月接受了一批为德国軍艦制造炮塔的訂貨。

法国东部地区的钢铁集团不能不考虑到，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巴黎和波恩之间必须密切协作，因为这些钢铁集团在西德投下了大量的资本，而且还因为摩泽尔河的运河化工程能否完工以及一旦竣工能否正常运行等等，仍要仰赖于西德。此外，因为法国东部地区的钢铁集团还打算直接通过它们在萨尔的工厂、间接通过钢的出口，从德国的重新实现军国主义化中捞得一些油水。

法国大银行也把成立巴黎一波恩轴心作为一项中心任务。早在1957年11月5日，即在戴高乐同阿登纳举行会谈并签字成立巴黎一波恩轴心一年以前，巴黎荷兰银行代表雅奈在法德委员会海外小组的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发言，就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法国大银行的意图。雅奈是巴黎荷兰银行的顾问工程师，他先在发言里自称为“德国奇迹的热情的见证人”，接着他就为法国同德国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紧密协作这件事作了一番情绪激昂的辩护，并且提出了关于两国资本主义垄断集团的具体合作方面的一项纲领。

雅奈说道：“我们古老的欧洲为无数的国界所分割，而这些国界又被两个巨人紧紧地扎在一起。欧洲具有高度的文化和众多的人口，欧洲的居民又有智慧和才能。我认为，如果想使欧洲不致丧失它由于具有这种种条件而取得的地位，那末，法德两国就必须合作……根本的问题乃是在我们两个国家经济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人士必须学会互相交往，互相了解，并且忘掉那些把我们经常分隔开来的旧的成见。”^①

听了他这一席话，简直就像预先听到了戴高乐于1959年11月21日在斯特拉斯堡所要讲的话一样。1959年11月21日戴高乐

^① 引自法德商会的一篇报道，参见1957年12月26日的《新工厂报》。

說道：“萊因河應該是一條連結綫，一條把河流兩岸的一切偉大事物和雄厚力量聯合在一起的連結綫……在我們這個歐洲的西部，我們一定要使過去經常互相交戰、互相廝殺、但今天有責任执行人道義務並且必須在同一條大道上向着人類的共同目標併肩前進的兩個國家的人民日益緊密地合作。”^①

雅奈首先宣揚了金融方面的合作。這種合作早在1956年底就已經開始了，而且接着就取得了明顯的進展。合作的方式有的是採取由歐洲一些國家的銀行合夥組成若干銀行團，有的是採取由法德兩國聯合開辦一些公司。然而，不論採取哪一種方式，其目的不外為在歐洲範圍內，把全部流動資金在法德兩國控制之下集中起來，投到生利最多的公司里去。法國的那些銀行每一次都是簽定這種協議的發起者，而在這些銀行中，巴黎荷蘭銀行總是站在這個運動的最前頭。最先成立的兩個金融機構固然是由東方匯理銀行和巴黎荷蘭銀行共同創辦的，但是，盡人皆知，這兩家銀行的關係極為密切：巴黎荷蘭銀行的董事長蒙尼克同時也就是東方匯理銀行的董事，而東方匯理銀行的董事長米諾斯特同時又是巴黎荷蘭銀行的董事。

1956年11月，由東方匯理銀行發起，成立了一個開發非洲的歐洲銀行團（簡稱貢撒佛里格）。這個銀行團的地址設在盧森堡，它所包括的成員，除東方匯理銀行外，還有南德銀行，倫敦漢布羅斯銀行，布魯塞爾金融工業公司（簡稱布魯非納）和法美金屬與礦砂公司（簡稱高佛拉美）。開發非洲的歐洲銀行團“以研究向哪些非洲企業提供投資為宗旨”。在這個組織里，英國（即漢布羅斯銀行及高佛拉美）的利益占有重要地位。這個銀行團的成立是和當時英法兩國的資本合作相適應的，例如當時英國在

^① 《世界報》，1959年11月24日。

非洲采矿业和撒哈拉石油方面都投了資，同时还发生了苏伊士运河事件。但是，到后来，由于共同市場和自由貿易区的互相对抗，这种合作就被公然的对立所代替了。因此，从1957年起，只有共同市場的成員国才有資格参加新成立的公司。1957年9月，巴黎荷兰銀行同德意志銀行合伙成立了一个欧洲工业发展公司。公司的資金由兩家銀行平均分担，地址就設在巴黎的巴黎荷兰銀行里。約瑟夫·阿布斯在欧洲工业发展公司里担任董事，至于阿布斯是何許人，我們早已在好几家法德合营的公司，如薩尔的狄林煉鉄公司和薩尔信貸銀行里見識过了。①

欧洲工业开发公司所規定的业务是“在法国和德国本土上对現有的工业装备和須要在法德兩國本土範圍內建立工业装备等方面；在向法德兩國各項工业部門提供原料和动力資源，主要是来自非洲的原料和动力資源方面；在共同开辟国外市場方面等，把法国和德国的工业集团和金融集团紧密地联合起来，共同进行研究和加以实现，以适应共同市場的需要。”

1958年2月，巴黎联合銀行也糾合了里昂信貸銀行、总公司銀行、阿尔薩斯銀行和路易一德雷福斯銀行等，同以德累斯頓銀行为首的、包括巴伐利亚抵押及汇兌銀行、哈尔迪銀行以及奧本海銀行等在內的一个德国銀行集团，签定了一項“关于在欧洲共同市場範圍內进行密切合作的協議”。協議提到，締約双方必須

① 1958年6月間，欧洲工业开发公司董事会系由下列人士組成：董事長：乔治·乔治一皮戈特；董事：德意志銀行管理委員會委員、薩尔信貸銀行及狄林煉鉄公司董事赫尔曼·約瑟夫·阿布斯，德意志銀行經理奥托·乔治·皮尔克哈姆，賽因一維特根斯坦公司的卡西米尔，德意志銀行的貝尔特·梯姆及弗蘭茲·海因利希·烏尔利希，殖民地和電話總行董事弗朗索瓦·昂都阿納，巴黎銀行經理和法意銀行董事貝爾納·德·馬熱里，巴勃高克、威尔高克斯鋼爐公司和法蘭西无綫电等公司董事居斯塔夫·朗保，还有巴黎銀行的一个高級職員。

向各自的主顧提供建議和一切必要的手段，使他們得以在協議規定的範圍內實現自己的計劃。^①耐人尋味的是：戴高樂掌握了政權之後，洛希爾銀行才開始露面。1958年7月，這家銀行糾合了商業信貸銀行、金融公司（西姆卡的子公司）、幾個比利時財團（如朗貝爾銀行和海外工業與金融公司等）以及一家意大利銀行（金融信貸銀行）同以柏林商會為代表的好幾家德國銀行簽訂了合作協議。

1958年10月31日，巴黎荷蘭銀行又伙同兩家意大利銀行（意大利動產協會和拉佛羅國家銀行）創辦了一個和它自己在一年以前同德意志銀行合夥建立的歐洲工業開發公司同一類型的公司——法意工業開發公司，確定了它插手共同市場並在該市場內起頭等作用的方針。同年11月，戴高樂內閣採取了支持共同市場的立場，並且通過蘇斯戴爾之口，用一種異常果敢的方式反對了英國的自由貿易區計劃，導致了英法兩國之間關係的緊張。隨後，到了1958年底，特別是1959年最初幾個月，上述運動，通過掀起一個鼓勵實行“儲蓄一體化”和建立“資本共同市場”運動的手法，又進一步伸展到了證券交易方面來。在1958年年底所採取的貨幣措施（如法郎貶值，移動資本有了更大的自由，在法國的外資得以兌成外幣等等）而造成的有利條件下，許多資本都轉到這個方面來：如1959年1月間，有人在巴黎證券交易所里為德國和瑞士資本買進了大量的法國有價證券。法國通用工業銀行、艾南銀行及法國國際商業銀行等出面建立了簡稱猶尼丰的“德國有價證券投資共同基金”組織。德國有價證券，例如巴伐利亞的股票也被拿到了巴黎證券交易所里來進行兜售。此外，1959年2月間還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歐洲投資公司，這些公司都是

① 《經濟金融通訊》，1958年2月3日。

由西欧国家的銀行組成的，这些公司的皮包里装滿的都是共同市場各个主要企业的股票。①

1959年10月，在法兰克福和杜塞尔多夫証券交易所里出現了巴黎荷兰銀行的股票。这是第一批在德国挂出牌价的法国有价証券。随后，到了1960年3月，另外五家法国头等工业企业的有价証券也跟踪而至；这五家法国工业企业是貝西奈、圣哥班、液体空气公司，罗尼—普朗克及东方与北方鋼鐵公司。

关于各工业企业之間怎样进行合作才能让共同市場在資本主义世界里成为起头等作用的政治和經濟的集团，巴黎荷兰銀行提出了一項包括三个基本方面的綱領。这家銀行建議：共同

① 例如由欧洲及海外投資公司創办的欧罗巴丰或欧洲基金組織(欧洲及海外投資公司是德国哈尔迪銀行的子公司，哈尔迪銀行則又为德累斯頓銀行所控制)；由法国商业信貸銀行、法国金融公司(为洛希尔銀行所控制)、德国柏林商会、意大利梅基奧銀行、荷蘭皮尔遜—海尔德林格与皮尔遜銀行以及比利时朗貝尔銀行和海外工业金融公司等联合創办的欧洲联合基金組織(又称欧呂尼翁)等都是这一类的投資公司。《新聞报》这样写道：“这些基金組織將把全部投資者联合起来建立实力无上雄厚的公司，以便將来在欧洲經濟中維護并加强本身的地位。在六个有关国家的每一个国家里，有价証券的選擇將由一个充分了解本国各公司处境及其工业发展远景的銀行来决定；換句話說，这种抉擇將不是由一个委员会仅仅根据档案調查或是就資產及負債进行研究来加以决定，而是对工业景况实际了解的结果。”各种基金組織的皮包里所裝的东西也确实証实了这种情况。例如欧洲基金組織的皮包里裝的滿都是些德国、法国、盧森堡、比利时、荷蘭、意大利等六个国家实力最为雄厚的大公司和大銀行的股票。其中德国方面的大公司及大銀行有巴底士、阿尼林、巴伐利亞、法本、西門子、萊因斯塔、曼奈斯曼、蒂森、德馬格、德意志銀行等等；法国方面的有法国石油公司、雪鉄龙、瓊齐渥、圣哥班、罗尼—普朗克、米許林、貝西奈、龙維等等；盧森堡方面的有阿尔貝德公司等等；比利时方面的有彼特罗非那(比利时煉油公司)、高克瑞尔及索非那等等；荷蘭方面的有皇家壳牌油公司、菲利浦、尤尼萊佛等等；意大利方面的有菲亞特、蒙台加蒂尼、爱迪生等等。这真不愧是个經由各个托拉斯集团精心挑选的、足以統治共同市場的产物。

爭取某些地区的国外市場；合并經營原子能和航空工业；共同开发非洲地下資源。

关于第一个方面，巴黎荷兰銀行所寻求的主要是法、德兩國装备工业垄断集团間取得協議以避免彼此在不发达国家里去进行任何竞争。雅奈說道：“一想到全世界的工业家們由于在价格及貸款方面进行着无情的竞争而都去跪在那些本身正需要进行装备的国家面前乞討訂貨，着实令人悵然。为了消除这种代价昂貴的竞争，最好的办法是組織各种法德集团。”

法德兩国的装备工业垄断集团已經在这方面签定了一系列的協議。例如一个由巴底士苯胺苏打制造厂同許奈特集团組成的法德集团已經获得了在阿斯旺小水壩附近修建一座肥料厂的权利；另外一个由埃森霍赫蒂夫公司、許奈特集团和馬賽大工程公司等組成的集团已經中标承攬在阿斯旺修建一座发电站的工程。此外，还有一个法国—德国—瑞士集团也已經中标承攬把葡萄牙鐵路进行电气化的工程，后面这个集团的成員公司还成立了一个欧洲电气機車康采恩，地址設在苏黎士，由法国阿尔斯多姆电气材料制造公司負責技术及管理等方面的協調工作。

除上述各集团外，法国和德国的工业公司还为瓜分欧洲市場签定了种种合作協議。

站在这个运动最前列的仍然是那些和大銀行有联系的公司，如和巴黎荷兰銀行血肉相联的无綫电报总公司及菲夫—里尔公司就是其中的两个例子。无綫电报总公司在1959年2月伙同德国一家專門制造并出售电阻的公司——維德斯坦德电阻制造公司——成立了一个欧里斯塔公司，即欧洲电阻制造公司之后，又于同年4月16日伙同科倫的費尔頓和威廉股份公司創辦了一个生产專門用来装备海底电綫的欧洲电子管公司。此外，

1958年4月，費夫一里尔的一家子公司——夏勒·貝尔蒂耶茲公司——也同一家生产大型机械的德国公司——杜塞尔多夫的西埃斯公司——签定了一項共同进行研究、設計并使生产专业化的協議。

雅奈又說道：“进行合作的另一个方面是这样一些現代化工业，在这些現代化工业里，由于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所以把兩個国家現有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經營就显得格外必要。在这一点上，有关合作发展原子能的問題，将由欧洲原子联营去加以实现。发展原子能具有以下特点：研究工作范围广，技术設施規模大，同时后者还冒着迅即过时的危險。虽然原子能工业十分明显地具备了这些特点，但是这些特点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个工业部門。这里，我想到另一个工业部門，那就是航空制造业。毫無疑問，我們兩國如果在这个領域里也进行合作，那么我們一定会有所收获。……可以肯定，今后在制造原型飞机方面，如果把兩個国家的实力联合起来，共同进行研究設計，我們就能贏得許多時間，从而也就会节省許多金錢。”

从1956—1958年，这种航空工业方面的合作已經达到了极为可觀的程度：奧克斯堡梅賽尔希米德公司制造了埃尔—富加型噴气式飞机；弗魯格茲克包—諾尔公司制造了諾尔—阿特拉斯运输机；1957年2月，汉因凱尔公司同杜尔波米加公司签定了合作協議；1958年2月，多尔尼埃公司同勃雷盖公司签定了合作協議；1958年5月，国营飞机发动机研究及制造公司也同富克—沃尔夫公司签定了同样性质的協議。

尽管戴高乐政府遭到了一些挫折^①——这一点我們在下面

^① 1959年全年只签定了一項協議，即法国北方航空公司，为了制造特朗薩尔型原型貨机，同三家德国公司联合了起来。这三家德国公司是：不来梅的威塞飞机公司，汉堡飞机公司和杜伊斯堡的布呂姆公司。

还会提到——，它仍然于1959年继续执行了巴黎荷兰银行提出的政策。1959年10月，武装部队部长驻空军代表曾经断言，^① 必须把我国的部分航空工业恢复平时的生产，他还说：“欧洲国家之间在航空工业方面的合作问题是个关系着我们生死存亡的问题。”一个月之后，武装部队部长居约马本人也说道：“为了让强大的欧洲航空工业获得发展，有关公司和我国政府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利益。”^②

雅奈又接着说道：“最后，我说最后可不是说最不重要，还有一个十分丰饶的领域，那就是到海外去投资，主要是到辽阔的非洲大陆去投资。……在民族主义对它们本身的力量估计过高的情况下，欧洲古老的文明国家要想开发领地，还是联合起来共同出面好。德国同我们合作，除了它的不断增强的工业能力和金融力量以外，可以使我们摆脱殖民主义的声誉（真是不怕显丑！）。”

为什么法国大资本自甘充当欧非共同体的捍卫者呢？巴黎荷兰银行的发言人在这里透露了其中的从阶级性利益上和经济上的道理：原来，尽管当年法国被占领时期希特勒的宣传机器也曾不断地唱过欧非共同体的高调，然而从1956—1958年，欧非共同体的观点并不代表德国资本主义的要求，而是法帝国主义企图利用波恩德国政治上的支持来巩固法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殖民体系的基础，并且到德国市场上去为非洲矿山和油井等的产品寻找销路。由于这种种原因，极大一部分法国大资本，特别是从1957年起，就努力促使德国资本渗入非洲。但是，由于政治原因，德国资本对此却反而冷淡，因为当时德国资本家对法帝国主

① 《新闻报》，1959年11月27日。

② 同上，1959年12月5日。

义的政治立場的坚定性尚有所怀疑。同时在經濟方面，德国加工工业的力量已經远远超过欧非市場的可能性；此外能不能把法国工业从它占領的陣地上排挤掉，德国垄断集团还没有把握；此外，德国重工业当时正在加拿大和巴西，一般說来，在拉丁美洲和一切不发达的独立国家寻找鉄矿砂及其他原料。从經濟上讲，这对德国资产階級是条最好的办法，因为一旦德国在这些国家里建立了采掘工业，資本主义市場就会扩大，反过来，德国资产階級的加工工业也就能找到銷售市場。最后，还有一个原因：用低廉的价格进口原料对德国資本主义来得有利，它不愿意让别人把高于世界价格的价格强加在它头上，而法国的热带产品出口公司（指咖啡、可可、香蕉、椰干、棕欖油、花生等的出口公司）則正想把这种价格强加在德国資本主义的头上，这些法国出口公司想让欧非共同市場成为一个自給自足的市場。

足見，1957—1958年，欧非共同体純粹是法帝国主义的观念。如果說，德国資本主义尽管冷淡，它还是参加了这个共同体，那么，这仅仅是因为它可以从中获得政治上的利益：西德的重新武装和波恩政府针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的要求可以得到法帝国主义的支持。足見，是法国資本主义控制着非洲地面及地下財富的生产的那一部分法国資本在努力吸引德国資本进入非洲，而不是德国資本主义本身主动地想进入非洲。^①

德国資本在法国金融資本經營的非洲企业中投資較少，其

① 下列事实体现了这项政策：先是成立了前面已經提到的两个金融機構，即开发非洲欧洲康采恩及欧洲工业开发公司。随后，由法国政府发起并出資組織德国金融家和工业家前往非洲作了多次旅行，到了1957年5月，就又成立了一个官方性質的機構：法德經濟委員會，奠定了“德国参加开发非洲的基础”。

法德經濟委員會設立了一个“海外小組”，由法国及德国的工业代表組成，負責为法德兩國資本在非洲的合作进行經常的、具体的工作。

原因就在于此。

德国資本在法国金融資本經營的非洲企业里参与投資是通过法国銀行来进行的。这种投資在“欧洲六国”一經就共同市場各項条款达成協議后便开始了。1957年初，在为开发撒哈拉及黑非洲矿砂而建立的公司里，德国資本还没有投入任何資本。到了1957年3月，也就是說，到了羅馬条約签了字，共同市場成立的时候，洛希尔銀行便在法国政府同意之下，把加拿大佛罗比塞財团在毛里塔尼亚鉄矿公司里占有的全部股份收买下来，随后就把这些股份立即轉让給德国的曼奈斯曼、蒂森、克呂克內和克虜伯等財团以及一部分意大利財团。巴黎荷兰銀行也把德国鋼鉄工业資本家們引进了加蓬的梅康博鉄矿公司。貝西奈則把德国的联合制鋁厂引进了采用几內亞鉄矾土制鋁的佛里亚公司。

通过这种德国鋼鉄工业和制鋁工业同巴黎荷兰銀行及洛希尔銀行控制的法国矿业托拉斯的合作，“欧非共同体”的基础之一算是奠定下来了。①但是，当时石油集团尚未邀請德国資本进入撒哈拉和北非。

1958年1月10日，《法兰西生活报》在論及撒哈拉石油問題时写道：“德国、意大利及荷兰資本的参与投資会使欧洲共同体获得充分的发展。”但是，为了拉攏德国資本参加开采撒哈拉石油，法国方面要在經過兩年多的不断努力之后，才达到了目的。

① 另外，德国霍埃施維克股份公司在开采几內亞卡魯姆半島鉄矿层的科納克里矿产公司里参加了5%的投資；曼海姆魯夫塔一瓦格曼公司在采伐中央剛果森林的麦翁勃林业公司（即索佛馬公司）里参加了投資；克罗夫姆尔石墨公司在开采石墨矿层的馬尔加什矿业与金融公司（即索米非馬公司）里参加了投資；在有些为了在黑非洲建立制鋁厂和錳鉄厂而进行勘探的公司里，德国資本也参加了投資。

最后，在一家計劃把哈西一尔麦耳出产的煤气导往魯尔区的公司，即欧洲煤气公司里，也有德国資本的股份。

因为，等到1959年12月才有一家德国公司——温特夏尔公司，通过为洛希尔银行和乌尔姆银行所控制的、由蓬皮杜在其中担任董事、著名的戴高乐分子德瓦夫蓝在其中担任检查员的法朗加勒普公司，在石油方面同法国金融资本签定了第一个合伙协议。

到了1960年1月，勒内·迈耶担任董事长的欧腊弗勒普公司（该公司系由拉萨银行、东方汇理银行、乌尔姆银行、苏伊士运河公司、联合航运公司等等联合组成）和一家同温特夏尔公司有联系的德国公司——埃尔威拉特联合采矿公司签定了第二个合伙合同。

由此可见，在戴高乐上台以前，巴黎一波恩轴心就已经成立了。戴高乐只不过是在上台之后马上就把它法国金融资本早已有步骤地寻求的一种合作作为官方政策并且使它获得充分发展而已。

戴高乐政权和非洲人民

法帝国主义要想在欧非共同体内起领导作用，就必须通过这一种或那一种方式来保持它对非洲人民的统治。在政治上是这样；在经济上也是这样。

法国资本主义从它的整体来说，要求维持非洲人民对法国的从属关系。不仅工业制成品出口部门需要这种从属关系，其中如纺织工业部门，因为这种“政治关系一旦破裂，它就会失去贸易上的障地。”^①而且对于那些在采矿企业里拥有投资的部门，这种从属关系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它们就再也不能同外

① 德加拉斯：《纺织工业企业主公会1958年年度报告》。法国向它过去的属地印度支那地区提供的纺织品，从1952年占该地区纺织品进口总量的94%，到1958年下降为13%，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国資本集团，主要是美国資本集团站在同等地位上讲话，就势必在分攤开采非洲地下財富得来的利潤时获得可怜的一份。1958年以前，当几内亚还是法国殖民体系屬地时，尽管貝西奈財团在开采几内亚鉄矾土的弗里亚公司里只拥有資本总额26%，而美国一加拿大資本却拥有48.5%，但前者在該公司董事会里却占据多数席位，并且拥有該公司董事长的位置，道理就在于此。

但是，正当法帝国主义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需要在非洲保持它那政治障地的时候——因为失去这种障地，它就在欧洲同德国比起来，以及在資本主义世界其他地区同英国和美国比起来不能占优胜的地位——，非洲人民要求独立的解放运动却愈益动摇了它的政治統治。蓬勃发展的非洲人民解放运动使法帝国主义不能再对非洲人民保持以往那种統治关系。現在的問題是要采取什么方式才能对非洲保持一定的控制。用武力来抗击反殖民主义的浪潮等于进行可能丢失全部势力的冒险；所以，与其堵截潮流而不可得，倒不如听之任之，只要掌握住这股潮流，引导它朝着法帝国主义所需要的方向发展就行了。

有兩类矛盾使得法国大資产階級感到十分棘手，其中一类还是由它們自身产生的。第一类矛盾是法国大資产階級同农业殖民主义者或商业殖民主义者之間的矛盾。法国大資产階級是准备同非洲的土著資产階級妥协的，但是要达成这种妥协，就必须由农业或商业殖民主义付出一定代价。尽人皆知，当法国資产階級同意让突尼斯和摩洛哥独立的那个时候，这种矛盾曾一度轉为十分激烈。勒齐厄油公司代表勒迈戈尔—杜卜勒依被极端殖民主义分子所杀害。在阿尔及利亚，自从有了欧洲人出身的、虽然是少数但却占重要地位的农业殖民者，这种矛盾就达到了无比尖銳的程度。

第二类矛盾，也是最重要的矛盾，就是正当大資产階級不得

不对非洲人民的要求作出让步的时候，法国国内，由共产党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民主运动正在全力以赴，朝着非洲人民为之奋斗的统一目标推进。大资产阶级在同民主力量进行较量中，陷入了难以招架的困境。因为大资产阶级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关系上所作的任何让步都是法国民主力量的胜利；因为极端殖民主义分子所遭到的任何挫折都是工人阶级的胜利。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正严密地注视着由于资产阶级内部分裂而在继续进行殖民剥削的方法上所产生的纠纷。金融资本统治集团所以于1958年5月把戴高乐捧上台，所以求助于个人专权制度，就为的是想使自己不致于由被迫退却而遭受惨败，也为的是想克服它们自己在资产阶级内部发生的种种矛盾。

黑非洲和共同体

戴高乐首先着手处理黑非洲问题，因为在那里反对老牌殖民主义的力量比较薄弱，同时也因为他希望如果能有成效地先解决黑非洲问题，那么再回过头来对付棘手的阿尔及利亚问题就会比较有把握。戴高乐的全部策略就是组织法帝国主义往后撤退，并在撤退中，步步为营，边退边守，竭力寻找一个站得稳、守得住的退却基地。

第四共和国后期，法国资产阶级在失掉印度支那以后以及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压力下，已经被迫在黑非洲作了一些让步。法国资产阶级至少在原则上已经按照“根本法”的规定，在黑非洲推行了普选制，扩大了地方议会的职权，设立了由非洲人管理的行政机构，并在每一个非洲领地都设置了“政府委员”^①。但是法国资产阶级并没有能够通过这些花招阻挡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1958年7月，在塞内加尔有着巨大影响的非洲联合党，

它虽主張同法国保持协作关系,但要求立即独立。戴高乐正是在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被捧上台的。因此,他就不得不对非洲人民作出一些新的让步,更何况当时他正需要非洲人民在他所玩弄的全民表决中投赞成票。戴高乐之所以让步并非出于心甘情愿,而是为形势所迫。成立“法非共同体”的艰苦过程就証明了这一点。在戴高乐和法帝国主义心目中,“法非共同体”的作用应该是促使非洲各国同法国建立一种更加牢固的从属关系。戴高乐政府于1958年7月制定的“法非共同体”草案“使海外領地处在較之旧宪法所規定的更进一步的从属地位,因为在国民議會里取消了海外領地的代表,而在自治行政的联合組織里却又沒有可以作为补偿的任何新的增添。”同时,“法非共同体”草案也沒有作出什么“与1946年宪法第七十五条截然不同的規定。1946年宪法第七十五条至少还說到法兰西共和国各組成部分有权改变自己的地位,”而法非共同体草案里却連海外領地得享有独立权这一点都不肯承认。^②因此这个草案遭到了非洲的領袖們的强烈反对,桑戈尔就曾經这样說过:“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后退。可以肯定,如果把这样的宪法提交海外各地人民中去表决的話,任何一个有觉悟的議員都不会为它宣傳而使它通过的。”^③

这种反映迫使戴高乐把他的宪法作了一番修改,規定在“自由国家联合”范圍內,共同体成員国享有取得独立国地位的权利(草案第六十六条),不过,戴高乐又規定了一大堆限制来束縛这

① 塞古·杜尔领导的几内亞政府就是趁这个机会粉碎了当时法国政府賴以統治几内亞的“工兵区專制”而用非洲公務人員代替了傳統的官長,即殖民主义代理人的。

② 引自馬賽尔·迈尔勒的話,見《法蘭西政法學報》1959年3月号第146頁。

③ 《世界報》,1958年7月31日。

个权利。① 只是当戴高乐于1958年8月 为他的公民投票前往非洲作宣传旅行时,看到当地反殖民主义势力是那样的强大,他才不得不在非洲人民的集会上第一次宣布承认非洲人民享有取得独立的权利。② 于是原来的宪法就又有了一些修改,最后定案时,已规定非洲各国有权随时行使同法国分离的权利,并且不需要再得到法国本土国民议会和联邦代表机构的同意。

但是,就在戴高乐作出这些让步的同时,他却又竭力施展各种伎俩,主要是用讹诈手段来阻挠非洲人民取得独立。在公民投票之前,他宣布凡是不对他的宪法草案投赞成票的国家就意味着同法国脱离关系,便会失去法国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行政上的任何援助。就这样,他达到了把所有非洲领地,几内亚除外,保持在“共同体”内的目的。公民投票结束之后,法国资产阶级就对戴高乐的功绩表示满意:“法非共同体”允许非洲各领地实行自治并把它們提高到一个国家的尊严地位,但同时又用铁鍊把它們同法帝国主义鎖在一起。通过共同体总统,也就是通过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法帝国主义有权为共同体制定外交政策,制定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并掌握“共同体”的军队和警察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9月28日举行的有利于戴高乐的公民投票结束之后,在非洲土著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烏弗埃·博瓦尼之流的支持下,金融资本统治集团以为从此就已经把非洲人民牢固而持久地同它們連結在一起了,从此就能够在共同市场及欧非共同体内起它

① “此項权利須每隔五年才能行使一次,行使此項权利还得具备颇为严格的条件,須經有关议会討論通过,并由当地公民投票表决,再由共和国頒布的法律加以批准,以及由共同体议会決議批准等。”(引自馬賽尔·迈尔勒的文章。見《法蘭西政法学报》1959年3月号第150頁)

② 見戴高乐在布拉柴維尔发表的演說。

們所渴望起的作用了。一个高級官員在他所著的称頌共同市場的一本书中曾經这样讲过：“只要法兰西联邦仍然是个无机体，仍然沒有脊椎骨，仍然处于內部騷扰的状态，只要阿尔及利亚問題和黑非洲問題沒有从政治上获得解决，法国就不能充当建設共同市場的穩定支柱。”^①

特別是采矿业垄断集团，它們认为已經在共同体內找到了政治立足点，从而也就可以完全无忧无虑地去开采非洲的地下財富了。《法兰西生活报》这样写道：“共同体成立之后，黑非洲的采掘业务将会出現一个新的高潮。”^②

戴高乐政府还抱有这样一种希望，即企图使几內亚在国际上陷于孤立，会在混乱中崩潰，到那时戴高乐就可以出面来“恢复秩序”，从而把几內亚归并到共同体中来。

結果是戴高乐大失所望。几內亚政府动員了人民群众，挫敗了法国資產階級的詭計，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在帝国主义陣营內部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反击了法国資產階級对它的压力。此外，同几內亚鉄矿砂及鉄矾土有着利害关系的英国及美国垄断集团^③也对它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于是也就立刻承认了这个新兴的国家。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綫就这样被粉碎了，法帝国主义因而陷入了孤立。塞古·杜尔应邀訪問了华盛顿、倫敦、波恩和莫斯科，并在这些国家里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塞古·杜尔的訪問旅行以及为庆祝几內亚独立一周年，几內亚民

① 埃尔高齐：《法国和共同市場》，第9頁。

② 《法蘭西生活报》，1958年12月5日。

③ 在开采卡洛半島鉄矿的科納克里矿业公司的資本中，英国鋼鉄公司占33%，法美金屬公司占4%；英国鋁公司在弗里亞公司中占10%。洛斯島的鉄矾土是由米迪鉄矾土公司开发的，这个公司附屬于英国鋁公司和美加托拉斯，后者另外还要开发博克的鉄矾土。最后，美国的馬錫森公司在开发弗里亞鉄矾土的公司中占48.5%。

主党于1959年9月28日胜利地举行了全国代表大会，这些对还留在共同体内的非洲各国人民群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联合在馬里联邦里的塞内加尔及苏丹等国家领导人，在参加了非洲民主党代表大会以后，就宣布要求独立。当初曾以施展各种阴谋詭計成功地阻止了上沃尔特及达荷美加入馬里联邦，直到当时还拒不承认該联邦的戴高乐，在大势所趋的压力下，只好又作出了新的退却。1959年12月，在塞内加尔圣路易举行的共同体行政委员会會議上，戴高乐第一次同意了“对各項設施应加以修改”，并宣布法国同馬里联邦以及馬里联邦各成員国行将“就彼此間的关系地位問題举行談判”。就这样，法帝国主义终于在1960年1月及2月就馬里及馬达加斯加独立問題同它們举行了談判。但是，如果說法帝国主义认为通过“法非共同体”已經于1959年9月把非洲各国从法律上同它牢固地結合在一起，而今又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就陷于破裂，那并不是它的过錯；如果說法帝国主义所作的退却比起它原来計劃的退却要大得多，那是因为它不可能在同一个时候既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为这场战争它动員了国内的絕大部分军队），又在黑非洲抗拒各国人民的压力。

阿尔及利亚問題

解决阿尔及利亚問題要比解决黑非洲問題困难而且复杂得多。这不仅是因为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居民出身的殖民庄园主比別处要多得多，而且还因为农业殖民主义同军队里的某些将領互相串謀。这些将領，因为作战不利而开始采取独立行动。他們曾于1958年2月8日轟炸了突尼斯的薩基埃—西迪—优素福村，并在突尼斯的机場上不断制造事件，类似的这些行动使得法

国大资产阶级同布尔吉巴之间所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受到了破坏。

使戴高乐的工作变得更复杂的还有以下一些原因：当初戴高乐所以能够上台是因为5月13日的骚乱事件把他捧出来的，他不得不敷衍阿尔及利亚的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并且在可能做到的范围内配合他们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戴高乐讲的话模稜两可，为什么他的政策措施拐弯抹角的原因。但是，尽管他拐弯抹角，他所遵循的政治总路线仍然是个为采矿业主和石油业主们的利益效劳的总路线。

法国金融寡头的野心在于：它企图和这样一个阿尔及利亚一起（根据戴高乐的提法，这个阿尔及利亚不再是什么“上一辈时代的阿尔及利亚”，而是一个通过一种比较灵活的关系，仍然同法帝国主义连结在一起的阿尔及利亚），来构成一个马格里布整体，而在这个整体内，法国金融寡头保持他们的经济统治。此外，这种经济统治将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靠军事力量，依靠当地的封建分子和欧洲的农业殖民主义，而是依靠穆斯林资产阶级，依靠像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五世和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一流的人物。至于在阿尔及利亚，他们则依靠介乎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力量”^①。

戴高乐曾于1958年10月间宣称：“我认为，就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未来的解决办法必然要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由阿尔及利亚有胆识的人士出面，并且同法国本土密切合作，这是事物的常理。同时，为了共同的进步，这样的一个整体，再加上撒哈

① 戴高乐于1959年11月10日向报界发表谈话时确认了这种观点，他斥责踌躇不前的阿尔及利亚“等待派”，认为他们使“原来可以很快获得和平和发展的阿尔及利亚”坐失了时机，并敦促他们起来组织一个“阿尔及利亚进步大党”。

拉，必然会同摩洛哥以及同突尼斯結合在一起。”^①

戴高乐上台以后所采取的第一項措施，其中之一便是給摩洛哥国王拍了一份友好的电报，并撤出了駐扎在突尼斯南部的法国軍队。这个措施博得了布尔吉巴的好評。接着，戴高乐又采取了另一項滿足布尔吉巴要求的措施，决定把从艾杰勒地区通往沿海一带的輸油管經過突尼斯境內，而不是經過利比亚(这是最短的路綫)，更不是像极端殖民主义分子所希望的那样，鋪往阿尔及利亚沿海地区。这第二項措施，就像証券交易市場上所反映的那样，^②充分表明了戴高乐的政策和石油垄断集团利益之間的一致性。

开采艾杰勒地区油井的克萊普斯公司的一家子公司，早在1958年6月20日就和突尼斯当局签定了一項合同，要鋪設一条从艾杰勒通往加貝斯湾的油管。这个决定充分暴露了大資本利益同阿尔及利亚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利益之間的矛盾。事情过去一年以后，这些极端殖民主义分子还在那里要求鋪設一条从艾杰勒直达哈西—迈薩烏德，即鋪設一条經過阿尔及利亚土地的石油管道，然而就在同一个时期，也就是說1959年9月，克萊普斯公司的总經理却在那里为“他同突尼斯政府之間的良好关系而感到欣慰。”^③

戴高乐利用上述手段，巩固了他在北非的兩個側翼国家，即

① 參見1958年10月25日《世界报》：戴高乐于1958年10月24日向报界发表談話。

② 1958年6月20日《法蘭西生活报》这样写道：“法国和突尼斯就法国軍队撤离突尼斯問題簽訂了协定，博得了索日拉普的好評。”現在，为了确定輸送艾杰勒、梯袞—杜林和札拉伊廷等地区石油的管道路綫，抵押权就这样撤銷了。到目前为止由于突尼斯事件的发生，使這項协定的执行，推迟了半年。

③ 《世界报》，1959年9月9日。

摩洛哥和突尼斯的陣地之后，便举行了公民投票，在这以后，戴高乐立即着手处理阿尔及利亚战争这样一个中心问题了。

由于1958年5—6月間曾經发生过“結盟”的示威运动，戴高乐曾經一度认为可以将阿尔及利亚和法国联成整体，1958年6月，他采取了与极端殖民主义分子相近的立場，6月7日他在摩斯塔加內高呼：“法兰西的阿尔及利亚万岁”；同月13日，他又在一次广播讲话中宣称必須“平定阿尔及利亚的暴乱，让阿尔及利亚永远全心全意同法国在一起……”。但是，现实迫使戴高乐很快改变了立場。1958年9月20日，他在勒恩說道，如果說“独立是不可能的，那末合併也同样是不可能的”。10月3日，他又在君士坦丁这样說道：“未来的阿尔及利亚要建立在这样一个双重基础之上：阿尔及利亚本身的人格及它同法国本土的紧密团結。”同时，他提出了自那时起就被人称之为“君士坦丁計劃”的方案。根据戴高乐当年派駐阿尔及利亚总代表德魯佛里埃的說法，这个計劃将会“把阿尔及利亚的命运紧紧地同法国擰在一起”。^①君士坦丁計劃規定要使阿尔及利亚实现部分工业化，要在阿尔及利亚兴办学校和建筑住宅。就計劃制定者的意图來說，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一些工业企业就能从經濟上合并这个国家；在阿尔及利亚发展教育事业，同化穆斯林青年，就能从“灵魂上”合并这个国家，同时还可以为工业資本造就一批劳动力，培訓一批干部。如果說地主老爷也需要有文化的劳动力，那么工业資本家則更需要受过較高的教育，并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的劳动力。

但是，无論如何，必須結束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为了做到这点，戴高乐起初认为只要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陣綫的战士們采用另外一种語言，即有別于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对他們采用的

^① 1959年10月5日《世界报》：德魯佛里埃对报界发表的談話。

語言，并向民族解放陣綫的戰士們建議實現“勇敢者的和平”就行了。戴高乐于1958年10月提出君士坦丁計劃的同時就提出了這種建議。但是，對於民族解放陣綫的戰士來說，他的這種和平建議只不過意味着要求他們無條件投降而已。結果，戰爭並沒有結束，而且過了一年以後，情況更嚴重地惡化了。

不論是在國內或是在國際上，戴高乐的處境愈益困難了。

“平定暴亂”的政策遭到了失敗，大多數法國人民愈來愈不耐煩了。當初認為戴高乐是唯一能夠終止戰爭的人、因而在公民投票時投了贊成票的法國人，現在都參加了當初投反對票的人們的行列里來了。

隨着赫魯曉夫訪問美國，冷戰空氣有所收斂，因而繼續進行阿爾及利亞戰爭是國際輿論所不能容忍的。與此同時，戴高乐在和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綫作戰中從英國和美國方面獲得的支持也有所削弱。

1959年底，《法蘭西生活報》這樣寫道：“不能再拖延時間了，因為我們在全世界的敵人都在攻擊我們，而我們的朋友又撇開了我們；因為在聯合國大會上，我們將被安排在冷板凳上，因為，即便在國內，要想重新振作金融和擴張經濟是不能忽視阿爾及利亞問題的，還因為，在我國本土上，不應該讓厭戰之風繼續發展，這一點尤其重要。”^①

然而，不僅是厭戰之風，而是還有反戰之風也在不斷增長着。

這就是為什麼戴高乐不得不於9月16日鄭重地宣稱，必須採取“自決”的辦法來解決阿爾及利亞問題。雖然在半年以前，即在3月25日他所作的最後一次公開談話中還這樣講過：“9月間舉

^① 《法蘭西生活報》，1959年8月28日。

行的公民投票十分明显地說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广大的阿尔及利亚人民群众是信任我能够給他們和平、給他們自由和尊严的，从而也就能够让阿尔及利亚同法兰西結合在一起。”^①

戴高乐自己也毫不掩飾地承认，他所以会作出这样的决定乃是形势所迫。他这样說道：“估計到阿尔及利亚的、国内的以及国际上的种种情况，我认为有必要现在就宣布采取‘自决’的原則。”

足見，无可奈何的现实迫使戴高乐作出了惊人的让步。然而，就在作出让步的同时，他却又透露了內心的隱諱和政策的底細。原来他是想給法帝国主义找个迂迴的障地的。要知道，他打算通过三种途徑来解决阿尔及利亚問題，一种是分离，一种是法兰西化，第三种途徑就是成立一个“由阿尔及利亚人自己来管理的、依靠法国援助的，并且在經濟上、教育上、国防上以至外交上都要同法国紧密联合在一起的阿尔及利亚政府。”戴高乐和大資本所最为推崇的显然是第三种途徑，因为他們也知道，把阿尔及利亚法兰西化只能是一个空想。上述阿尔及利亚政府将是一种联邦式的政府，按照某些资产阶級报刊的提法，这是一种“塞浦路斯式的”解决办法。^②实行这种办法，就要根据种族情况或地理条件将阿尔及利亚分割为若干个区域，每一个区域有每一个区域的独特地位。这样一来，就会产生各种不同居民的社

① 參見1959年3月27日《新聞报》刊登的戴高乐談話全文。

② 大家知道，在塞浦路斯，希臘居民社会集团和土耳其居民社会集团之間的糾紛就是通过建立一种双头制国家来加以解决的。在那里，两个不同的居民社会集团都各有各的議會，政府也被分成两个部分。法国企业主报纸《回声报》主張采用这种办法来解决阿尔及利亚問題。《法蘭西生活报》也贊成这种办法。《法蘭西生活报》于1959年2月13日这样写道：“塞浦路斯問題的得到解决，說明了人人都認為无法解决的糾紛，获得了至少是暂时获得了解决。”

会集团,有法国居民的社会集团,有阿拉伯居民的社会集团,有卡比利亚居民的社会集团,也有摩薩比特居民的社会集团。所有这些居民集团組成一个联邦,这个联邦必須尽可能同法国密切地結合在一起。这种把阿尔及利亚巴尔干化的办法,对法国來說,有着这样一个优点,就是法国軍隊可以繼續在阿尔及利亚駐扎,因为,正如《法蘭西生活报》所說的那样,唯有駐扎軍隊才能保証联邦的地位。①

如果說法国大資產階級在某一点上也反对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如果說,到最后,法国大資產階級不得不表示結束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愿望,那末它同时却又害怕阿尔及利亚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因为,很可能,这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会把撒哈拉的動力資源收归国有。正是因为这个緣故,戴高乐才极力反对让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戴高乐于9月16日这样說道:让阿尔及利亚独立“就会給我們带来极端貧困,就会把我們导向政治上莫大混乱,就会把我們全面地推向絕境。”于是,作为最后的迂迴陣地,大資產階級又打算让阿尔及利亚分裂成为两个国家,一个由欧洲居民組成,从屬于法国,并控制着石油資源及其开采和輸送,另一个則是独立国。戴高乐說道:“理所当然,在阿尔及利亚人里面,不管他們的出身如何,愿意繼續当法国人的完全可以繼續当法国人,同时,如果必要,法国可以把他們重新集結,替他們重建家园……至于撒哈拉石油的开采,輸送和装运等問題,那是法国的事情,也是和整个西方国家利害有关的事情,因此,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这些問題都将由法国采取一切措施加以保証。”

金融界报刊对于“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这句话深表滿意。有一家金融报刊这样写道:“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撒哈拉石油的政

① 《法蘭西生活报》,1960年2月12日。

治前途总算是保住了，因为，即使在官方所设想的最坏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分离的情况下，也不会影响法国对于它所发现的石油保持所有权。”^①

所以，不论是在阿尔及利亚还是在黑非洲，大银行和石油公司总是表示拥护和支持戴高乐所采取的各项措施。^②

当极端殖民主义分子于1960年1月24日在阿尔及尔发动叛乱，要挟戴高乐放弃自决原则的时候，法国大资产阶级的主要势力都在戴高乐背后为他撑腰。1960年2月5日《法兰西生活报》在《证券交易消息》专栏里写道：“在获悉平定阿尔及尔的暴乱时，石油集团感到如释重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然而，这种阻挠阿尔及利亚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的企图（这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将会把生活在阿尔及利亚土地上的居民，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全部联合在一起），是执行自决原

① 《法蘭西財富報》，1959年9月25日。

② 1958年10月間，實現“勇敢者的和平”這一建議提出之後，“阿爾及利亞的股票和撒哈拉的石油股票牌價都猛烈上升。”（見1958年10月17日《法蘭西生活報》）

1959年1月間對於穆斯林囚犯採用寬大措施的決定使得“阿爾及利亞的證券交易重見活躍，許多種股票的牌價都有了顯著的上升”。（見1959年1月16日《法蘭西生活報》）

在戴高樂於1959年9月16日發表講話的五天以後，一家由巴黎荷蘭銀行及液體空氣公司，還有大巴魯阿斯化學公司及皮埃爾·菲特化學公司等共同創辦的研究性公司，即阿佐塔公司的負責人，向政府當局總代表宣布，決定在阿蘭附近的阿爾澤夫建立一座在那時還僅僅停留在書面計劃的合成肥料廠。1959年9月25日的《法蘭西生活報》寫道：“這個事實很能說明問題。在我們所處的環境里，資本的決定比可能的示威和各種公報之間的爭吵具有更大的意義。”

當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綫於9月間接受了“自決”的原則並宣布準備在這個基礎上討論“停火”條件時，法蘭西石油公司的股票在交易所里的牌價立即上漲，竟達到約兩百億法郎之多。

則的一个障碍。戴高乐所以会拒绝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举行谈判,所以不肯在9月16日以后同它讨论自决的条件和自决的保证问题,以便实现停火,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戴高乐所以于1960年3月间发表讲话,把自决权说成了空洞无物,因为只有在他所理解的意义上阿尔及利亚人民才能实行“自决”的权利,也是由于这个缘故。结果,战争是无止境地向后拖延,而戴高乐主义和大资本在国内外的矛盾也就愈益尖锐化。

同苏联的关系和国际局势的缓和

戴高乐上台后,他同苏联的关系无非是进行冷战,并从长期打算,准备世界大战,进攻社会主义阵营。战争在戴高乐心目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甚至在他的宪法上都有一条赋予共和国总统以特殊权力的规定。据官方解释,该项规定就是从上述打算出发加以制定的。德勃雷这样说道:“特殊权力就是为了应付当国内和国外的威胁使政府无法进行工作的情况而规定的……我们作了许多设想。说老实话,那就是原子战争。我们也不可能作别的设想。问题在于保住共和国,使共和国永久地存在下去。”^①

1958年8月间,戴高乐在到达海外领地作宣传旅行时,曾把必须建立“法非共同体”说成是对付虚构的“苏联威胁”的一种自卫手段。1958年8月22日,他在塔那那利佛的时候说道:“目前的时代是个具有巨大危险的时代,因为,有那么一种人民,他们受了某些分子的煽动,想从自己的国家跑到别的国家去。为了对付这种危险,保证我们的共同安全,假如你们愿意的话,就必须

^① 《世界报》,1958年9月5日。

建立共同体。这尤其是因为在每一个受威胁国内部正准备着为我上面談到的那种威胁充当桥头堡的顛复活动。”

半年以后，戴高乐还在发出同样的叫嚣。他于1959年3月25日，针对苏联关于东柏林問題的建議，說“苏联在柏林問題上所制造的危机引起全世界巨大的不安”。事实証明，苏联的建議乃是为了消除欧洲的不安全和緊張局势的某种根源。戴高乐不认为法国可以“不把自己卷入到这种冲突里，并且在一旦发生战争时，把自己置身事外……”因为他說“那样一来，法国就会成为仅仅维护自身的生存而失去生存之道。假如大西洋联盟被击破，那么，除了打原子战，就什么也不能阻止苏联把它的統治伸展到整个欧洲和整个非洲，并从而伸展到全世界其他地区。結果是整个人类，就算能僥倖免于死难，也将难免不遭到专制的压迫，并处于和专制統治者及其追随者严重冲突的境地。”假如要改变柏林的地位，戴高乐是不惜采用战争来对付的。他說：“首先，我們认为美国、英国和法国絕不能听任任何人对于它們的军队进出柏林設立任何障碍，……如果有人反对，那么他們及其一切支持者就会作出敌視西方国家的行为，就要承担随之而来的、可能发生的冲突的后果。”

直到1959年秋天，戴高乐一直是强烈地反对苏联提出的关于召开政府首腦會議的建議。

在他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资产阶级階級政策最基本和最持續的是不断进行冷战并准备在实力上与苏联較量一番。因而他以为可以趁此机会对美国资本主义进行某种要挟，让法国参与美国原子“秘密”，让法国加入“原子俱乐部”和建立包括美、英、法三国的大西洋联盟的三巨头领导机构。为此，他从大西洋公約組織中撤出了法国海軍的地中海艦队和法国空軍的战斗机部队，他拒絕在法国儲存美国的核导彈等。^①

同样，戴高乐之所以加强他同阿登納之間的联系也是以支持波恩政府在柏林問題上的主張和它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的奢求为基础，即以保持冷战为基础；为了报答这一点，阿登納也就相应地于1958年12月間支持了戴高乐政府反对自由貿易区的立場。

可以說，戴高乐上台伊始的整整一年中，他所奉行的外交政策的中心內容就是进行冷战并相信国际資产阶级的阶级团結有足够的力量支持他的某些——請大家注意——典型的和純粹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要求。但是，1959年年中却发生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完全出乎戴高乐意外的大事，那就是赫魯曉夫的訪問美国。消息傳來，法国外交部完全陷入了一团混乱。

开始时，戴高乐政府采取的是保留和不高兴的态度。但后来，国际局势继赫魯曉夫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維营会談后明显地趋向緩和时，它所采取的立場就馬上站不住脚了。当时，如果它还試圖逆流而上，而这股逆流又远远超过它本身的力量，那么它就会在全球成为笑柄，在全世界人們面前暴露自己的弱点。因此，它不得不开个急轉，順流而下，以免造成灭頂之势。就这样，1959年秋，戴高乐政府被迫宣布贊同召开在这以前它所一直反对的首腦會議，并且作出惊人的决定，邀請赫魯曉夫訪問巴黎，借此以掩飾退却，挽回威信。但是，就在邀請赫魯曉夫訪問巴黎这个花招的另外一面，却暴露了一个更为深刻的现实問題。那就是，在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在資本主义世界里占領導地位的国家之后的法帝国主义，虽然比其它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更明显地表現了故意的冷淡，但是由于它在資本主义竞争和阶级斗争方面力量的薄弱使它不得不改变一下政策。1959年10月，法国

① 这并没有影响美国在法国保有軍事基地和法国为西德提供軍事基地。

企业主全国理事会建立了一个“法国—东欧委员会”，其作用同“法郎—美元委员会”及“法郎—英镑委员会”相类似，后两者是处理法郎区与美元区和英镑区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组织。^①

曾经一度反对过共同市场的布塞克——他的主要企业（纺织和服装）不能从欧非共同体和军备竞赛中获得什么利益——便在这个时候亲自前往莫斯科，并公开宣称他赞同发展法苏贸易，拥护国际局势的缓和，拥护裁军。^②

足见法帝国主义就像当时它在同非洲各国人民的关系问题上一样，由于反殖民主义的力量和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运动的压力，不得不退却，如今，在进行冷战方面，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已经比帝国主义势力强大，主要表现在苏联在工业及科学上取得的巨大发展，法帝国主义就不得不同整个帝国主义阵营一起向后退却。

法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法帝国主义追随美帝国主义的政策

赫鲁晓夫的访美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开始缓和给法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招来了一股逆流。由于冷战的转入低潮，截至当时为止，它们之间还不很明显的潜在的矛盾迅速地表面化。面对着国际局势的缓和以及和平共处的局面，各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冲突日益尖锐化，但它

① “法国—东欧委员会”将以俱乐部的方式定期召集法国全国工业厂主理事会各会员组织的代表们开会，参加会议的有钢铁集团、化学工业、机械工业、食品工业等集团的代表。“法国—东欧委员会”将从他们的各个国家来增加进口的总数。

② 见1959年12月18日《真理报》刊载的布塞克向记者的谈话。

們仍舊竭力維持着彼此之間的階級團結。

法國資產階級原來以為還可以長時間地在冷戰溫床上高枕無憂，沒有想到却被赫魯曉夫和艾森豪威爾的會談從睡夢中猛然喚醒。總的說來，法國資產階級把戴維營會談看作是資本主義國家統一戰綫的一種削弱。法國資產階級不能夠而且也不願意斷絕他們通過北大西洋聯盟而對美國帝國主義的依附關係。美國主子所具有的一些弱點以及十分明顯的新的力量的對比，促使戴高樂不得不決定對他的西方伙伴施加壓力，並使自己取得根據新形勢而施展伎倆的保證。基於上述客觀條件，並由於他的習性和他受到莫拉斯的教養以及他的個人專權要求，打着民族主義的招牌和借着民族主義的幌子來籠絡人心。戴高樂對赫魯曉夫的訪美作出了如下的結論：他宣稱法國軍隊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一體化的公式已經不再合適了。^① 他的這一結論使得法國資產階級的某些人士大吃了一驚。

1959年11月10日，戴高樂本着同樣的精神，借口“法國有了核武器會有助於樹立世界均勢”，宣布了製造和進行試驗原子彈的決定。

① 1959年3月，戴高樂在高等軍事研究中心說道：“那種被人們稱之為一體化的制度，那種在我們經受了嚴重考驗之後，當人們可以認為自由世界還面臨着迫在眉睫的巨大的威脅，而我們還沒有重新恢復自己的民族人格的那個時候制定下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實行的制度，在現在已經過時了。”接着他歸結說：法國也必須有它的獨立的軍事力量和他本身的原子襲擊力量。“法國的國防應當由法國自己掌握。這是事物之必需，而在過去這幾年里，這一點並不是一直為人們所清楚的。我了解這點。必須讓人們重溫這點。像法國這樣的國家，如果一旦作戰，那麼，它所進行的戰爭應當是它自己的戰爭。它所作的努力應當是它自己的努力。如果是另外一種情況，如果對法國的國防不是它自己的國防，而讓法國國防同另外的東西混在一起或並在一起，還能長期容忍的話，那我們就不可能在自己的領土上保衛我們的國家”。

他所采取的这种并不符合法国人民民族利益的立场，就某一方面来说，就是1959年底各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矛盾尖锐化的产物。法国不仅同英国发生冲突（戴高乐粗暴地拒绝自由市场地区七国在巴黎设置秘书处），而且还同美国、甚至同西德也发生了磨擦。争夺市场的结果，法国加工工业同美国加工工业发生了矛盾。前面已经提过，法国航空工业的垄断资本家们由于企图把德国市场据为己有，因而他们支持共同市场。例如达索公司原已准备好用蜃楼式3型飞机装备德国军队，而由美国政府撑腰的美国洛克希特公司却迫使波恩政府买下它的射星式飞机，接着又让荷兰和比利时政府也购买这种飞机，戴高乐政府和达索财团对这种损失感到非常恼火。1959年12月，武装部队部长宣称：“看到美国工业在欧洲占领了我们原来希望掌握的地盘，这当然使我们不安。”^①另一方面，在美国市场上，法国汽车工业也展开了一场猛烈的攻势，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对此，美国政府为了进行还击，曾于1959年12月间，根据它的反托拉斯法案，对雷诺和西姆卡提出了控诉。

但是，1959年下半年，关于撒哈拉石油的问题是各种矛盾中表现得最为尖锐的。戴高乐政府在和美孚油公司以及国际石油卡特尔进行合作的政策方面遭到了一连串的惨重失败。戴高乐政府本想利用撒哈拉石油法案赋予美国公司某些利益以及向美孚油公司颁发勘探许可证等作为代价，从而使美国政府支持它反对民族解放阵线的阿尔及利亚政策；同时，戴高乐政府本来期望美国公司会同意在共同市场范围内大量提炼和推销撒哈拉石油；可是没有想到1959年12月在联合国大会上，当亚非国家就阿尔及利亚问题提出决议案付诸表决时，美国政府完全不願戴

^① 《新闻报》，1959年12月5日。

高乐的反对,沒有投反对票。①此外,美国公司和英国公司只同意到1962年年底为止,在法国提炼并銷售一定百分比的撒哈拉石油,至于1962年以后,它們拒絕繼續承担这种义务。可是,我們已經說过,撒哈拉石油問題对于法国帝国主义來說,乃是一个关键性問題。法国帝国主义所希望的是,依靠撒哈拉石油的开发而获得通向富强的手段,就像十九世紀魯尔的煤矿和得克薩斯的石油曾使德国和美国得以发家致富那样。戴高乐的新民族主义思想就是建立在这种希望之上的。戴高乐政府对于1961年起大規模进行开采的撒哈拉石油的銷售問題看得如此重要就是这个原因;也正是为了这点,戴高乐政府于1959年底制定了旨在建立一个由国家經營的石油提炼和銷售网的各种方案,石油联合总公司的成立是这些方案的結果,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戴高乐政府和由美国政府撑腰的石油垄断集团之間的原已存在的緊張关系。当法国政府要求共同市場的同盟国給予撒哈拉石油以优惠的时候,上述各种矛盾暴露得就特別明显。美国方面对此立刻进行了还击,美国財政部长狄龙馬上来到巴黎,并且訪問了好几个欧洲国家的首都,声明美国反对給予撒哈拉的石油以任何优惠,美国的态度不仅得到了英国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西德的支持。

国际局势的开始緩和使得有害于巴黎一波恩軸心的种种矛盾也有所暴露。建立階級联盟反对社会主义陣营,反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法德新合作的主要内容。这种合作的主要依靠是冷战。从經濟上說,巴黎一波恩軸心对德国的限制比对法国的限制要大得多。特别是德国的加工工业。德国的加工工业在

① 尽管如此,美国并没有减少它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亞繼續进行战争所需武器的供应。

共同市場以外的出口業務要比在共同市場以內的出口業務多得多，所以，整個說來，它反對共同市場自給自足和排除英國的主張，而法國資本主義却贊成這種主張。如果說當初德國資本主義終於在共同市場條約上簽了字，並且還接受了法國向它提出的種種條件，那是因為一方面它把共同市場作為成立自由貿易區的起點，而法國帝國主義則認為共同市場是個終點；另一方面，德國資本主義企圖通過在共同市場條約上的簽字而使它在柏林問題上和在西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問題上的侵略政策獲得支持。這就是當初它所以決定在共同市場條約上簽字的一些政治原因。人民汽車製造廠的總經理諾爾德霍夫教授曾經有一段話對此講得十分清楚，他說道：“對於德國的汽車工業來說，共同市場的領域實在是太狹窄了，它對於人民汽車製造廠來說尤其狹窄，因為後者最主要的顧客是來自共同市場以外……共同市場是一種政治觀念的產物，為了這種政治觀念，我們應當付出很高的代價。”^①

正是由於戴高樂全力支持阿登納的政策，所以德國資本主義才會答應支持戴高樂反對英國，挫敗了英國於1958年12月提出的成立自由貿易區的計劃。

英國資本主義曾經使用一切辦法來阻止法德兩國組成一個政治和經濟的集團，它提出自由貿易區計劃的目的也在此。英國資本主義在它的自由貿易區計劃失敗以後，認識到為了達到它的目的，唯一的辦法就是依靠蘇聯主張的和平共處政策。因此，1959年初，麥克米倫赴莫斯科，國際局勢開始緩和，赫魯曉夫的訪美更進一步地加強了這種緩和。國際局勢的緩和迅速地

① 見1959年12月9日《新開報》：1959年12月8日諾爾德霍夫在維也納發表的談話。

在法德关系上表現了出来。德国資產階級攻击法国軍隊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不一体化”的政策。

德国資產階級反对企图給予撒哈拉石油的优惠。① 法国企图在巴黎建立一个共同市場参与国常設秘书处的計劃也因德国的反对而遭到了否决。这个計劃“到处被看作戴高乐想把他的宗主权强加在邻国身上的一种企图。”② 对外关系方面，德国資產階級在让法国充当他們的代表上，有了更多的保留，他們几乎是公开地在繼續巩固德国独立的軍事力量，并且还同西班牙政府为在該国建立德国軍事基地而进行会談。就这样，在預定召开四国政府首腦會議前几个月期間，法国帝国主义想在欧洲取得它所向往的地位所遭遇的困难不断地增加。国际局势的緩和动摇了法国帝国主义所以能对西欧国家行使領導权的政治結構的基础。因此，在四国政府首腦會議召开之前，戴高乐置民族利益于不顧，支持阿登納反对討論柏林問題的狂妄主張，企图以此来阻撓国际局势的进一步緩和；戴高乐还把法德兩國之間的階級团結推进到如此的高度，以致于同意西德軍隊在法国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从而进一步出卖了民族独立。最后，戴高乐用支持艾森豪威尔的僵硬态度的办法（艾森豪威尔由于受到了最强烈的反对国际形势緩和的人們所加的影响，重新回到了反对緩和 international 局势的老路上去），帮助破坏了四国政府首腦會議。

但是，通过上述逆流，証实了这样一点，即戴高乐的对外政策，从它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始終沒有越出帝国主义这个圈子

① 《法蘭克福总汇报》这样写道：“共同市場六国行將签字承担購買撒哈拉石油这件事，將是在該市場所有国家中，在石油領域內自由經濟終結的开端。法国方面借口欧洲团結而确定的价格太高了。”（見1959年12月10日《新聞报》上刊載的引証）

② 《世界报》，1960年1月24日。

的严格界綫。戴高乐自从他攫取了政权以来，始終是严格地遵循着决定他当初的立場的两种先决条件和一种方法：同世界资产阶级建立阶级团结，首先是同美国资产阶级建立阶级团结；维护法国资本主义的特殊利益；将实用主义贯彻在日常行动中。戴高乐说过：“政治首先是解释现实，并运用现实来达到某种目的。”^①

1. 即使是在国际局势开始缓和以后，戴高乐对国际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也从不放松。1959年12月，当戴高乐即将就马里独立问题进行谈判时，他已经不能再弹他1958年在塔那那里弗会议上谈及法非共同体时的那种反苏老调，因为在此期间赫鲁晓夫已经访问了美国。但是，他仍然把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放在首位。即使是1960年3月，即戴高乐行将接待赫鲁晓夫访问法国的时候，他还是十分清楚地表现了他是属于资本主义阵营的。

2. 戴高乐所关心的不是法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不是法国人民的民族利益；他关心的是他所认为的法国帝国主义的最高利益，具体地说，也就是法国金融资本的利益。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戴高乐的所做所为都得到了全体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一致赞扬，因为这些统治集团本身并不是利益上彼此协调的一个统一体。在过去的这一段时期里法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矛盾的加深，其客观原因是由于各个国际垄断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此外，也由于戴高乐本身所具有的主观原因。戴高乐政策是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纠纷所产生的一个后果，同时也是使得这些纠纷日益尖锐化的一个因素。这些必然在法国资产阶级内部激起一

^① 引自戴高乐于1958年10月3日对报界发表的谈话。见1958年10月4日《费加罗报》。

股逆流。

最为怯懦的资产阶级阶层或分子对于下列事实感到惴惴不安：在共同市场各国有可能达成政治合并这个问题面前，戴高乐裹足不前；戴高乐更多的喜欢联合那些比较适合于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与竞争的国家，这些国家在上述怯懦的阶层或分子看来，这些国家比较无力对付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这些阶层或分子还对以下这些事实感到惶恐：1959年12月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上，由于戴高乐主张法国需要掌握原子袭击力量和独立的军事力量而引起了一场风波。戴高乐的狂妄自大所引起的巨大开支会招来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严重后果。赫鲁晓夫访法旅行取得了胜利，在法国国内留下了政治性的影响。当初比内对戴高乐政府感到担忧的就是这些东西，也正因为怀有这些担忧才使他在1960年1月被从政府里排挤出去。

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戴高乐政策的总路线还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并通过他所特有的措施反映了法国垄断资本的利益和愿望。而唯有当戴高乐的政策遭到破产的时候，法国垄断资本才会抛弃戴高乐政策。

3. 不管怎样，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因素，这种因素已经开始在资产阶级政策本身的进程中发生影响：辩证的运动使帝国主义已经处于这样的境地，即它所制造的反对力量已经比它的本身力量更为强大。无法倒推这个运动。但是，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变的。继续进行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及首脑会议的被破坏都表明了这一点。要想使帝国主义被迫奉行一种与它的本性不同的政策，人民群众就必须积极地投入促使阿尔及利亚实现正义的和平与缓和国际局势的斗争。

經濟政策

1959年5月間，法國全國工業業主理事會出版的新聞公報在社論中滿意地指出：“年終決定的公眾拯救措施以及各項設施的改革使實行復興政策具備了持久性的保證，這一切給我們帶來了新的希望。”

戴高樂政權經濟政策的方針路綫在於使工人階級、中產階級和非壟斷部門負擔在非洲維持帝國主義制度所需要的各項開支（即投資和軍事費用），以及冷戰政策的開支；此外還要負擔所謂“大國政策”的費用，這個政策是以擴張為其目的，即，在政治方面通過製造原子彈以便打入原子俱樂部，在經濟方面則加緊發展資本的集聚和集中。

戴高樂政府一出場所採取的幾項措施馬上就說明了這個政權的方針。戴高樂宣稱：“我要求全體法蘭西人都作出自己的犧牲。如果全體有產者都承擔一點犧牲，如果全體生產者、公務人員以及僱傭勞動者肯放棄他們原可指望得到增長的一部分工資而參加拯救國家的活動，那就什么都好辦了。”^①

但實際上他只強使勞動人民作出犧牲。從5月1日到6月1日，雖然一個四口之家的標準預算（由全國家庭協會聯合會制定）增加了二千零二十八法郎（二十點二八新法郎），而最低限度的保證工資並沒有增加。7月17日戴高樂答復鐵路、煤氣和電氣工人時還說：目前談不上給你們增加工資，政府當局要到秋季或年底才能重新考慮這個問題。

就這樣，個人專權一開始就說明了它之所以存在的理由，那

^① 見1958年6月27日戴高樂的廣播演說。

就是把前几届政府所未能迫使工人阶级和全体法国人民接受的牺牲强加在他们身上。正如《经济金融通讯》于1958年6月2日所说：“新上任的财政部长一定会在戴高乐庇佑下实施各种苛刻的措施，而在以往，要实施这些措施是不可能的。”

为了使舆论界相信并非仅仅是雇佣劳动者挑起全部重担，戴高乐还提出了征抽所谓要由资产阶级单独负担的五百亿法郎（五亿新法郎）的附加税（见1958年8月4日公布的法令）。比内说道：“已经让农民在严格执行有关小麦价格的规定方面，作出一番牺牲；已经让公共部门雇佣人员在他们提出的要求方面作出一番牺牲；政府认为对于那些有产者也应当让他们通过缴纳附加税的方式作出一番牺牲。”^①

事实上，在这五百亿法郎（五亿新法郎）的附加税当中，一百七十亿法郎（一亿七千万新法郎）是要由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广大阶层来负担的间接税（唱片价格上涨部分和汽油每公升上涨二点八法郎等所增加的赋税）；一百六十亿法郎（一亿六千万新法郎）是要向价值超过某种最低金额的住宅征课的，这项税款落在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肩上。只有剩下的一百八十亿法郎（一亿八千万新法郎）才是理论上由资产阶级负担。在这一百八十亿法郎当中，三十亿（三千万新法郎）的课征对象是别墅、游艇和赛马，一百五十亿法郎（一亿五千万新法郎）是各企业公司1957年所得盈余的特别捐。但是这些大企业公司却把这一百五十亿加进成本里，因此有产者承受的牺牲就微乎其微了。特别是，就在同一期间，戴高乐政府使这些大公司获得了好几千亿旧法郎的纯利，所以更谈不上什么牺牲不牺牲了。

《官方公报》于6月21日就公布了一项法令，这项法令使银

^① 《法蘭西生活报》，1958年9月19日。

行和壟斷公司得以獲取巨大超額盈利的違法事件成為合法。原來，1957年8月10日布歇·莫努利內閣曾經公布過一項實際上把法郎貶值20%的第57—910號法令。該法令規定對進口商給予20%的補貼，對出口商在8月10日以前簽訂的合同則征課同等數目的稅金。進口企業的確領到了這種補貼，可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政府當局並沒有向出口商征課這種20%的稅金。就這樣，據一家金融周刊的報道，從1957年5月到1958年8月，出口商撈到了一筆千億以上（十億以上新法郎）的超額盈利。^①戴高樂上台以後，他原來是可以抓住這個良好的機會，勒令那些無視國法的銀行和出口公司補繳這筆稅款，從而表明他真正是個超階級的人物的。可是，他不但沒有這樣做，相反的他却在6月21日頒布一項法令^②干脆廢除了1957年8月10日規定課收20%稅款法令！戴高樂的得意行徑當然不會到此為止，他此後在發行公債時作出的規定就證明了這點。資本家從這次公債中比1952年從比內發行的具有同一個目的的公債中得到更多的好處。

1958年發行的比內公債，和比內在前一次發行的公債一樣，是以黃金為計算標準的。這樣一來，戴高樂一方面拒絕對僱傭勞動者和農業生產者的收入實行活動計算法，另一方面，他却向資本家們提供了採用這種計算法的保證。戴高樂廢除了公債認購人的動產收入比例稅以及按照公債認購人收入的多少將公債的利率由3.5%提高為4.3%、4.9%、7.8%或12.8%的累進附加

① “你一定會說這是不可能的。然而這是事實：政府向享有特權的人至少已經送了一千億法郎（十億新法郎）的禮，而且，我們敢說，這種禮還會繼續送下去，因為，每個月，在已經支出的幾十億法郎以外，還會再加上幾十億。”
（引自1958年10月17日《法蘭西財富》）

② 該法令的原文是這樣的：“廢除1957年8月10日第57—910號關於法郎地區同外地之間清算事項的法令以及關於該法令實施辦法的各項決定。”

稅。^① 他还免除了公債認購人的遺產稅和贈與稅，僅僅這一項措施就向公債認購人提供了較之他們於8月4日繳納的特別捐更多的錢款。據1957年間在塞納省所作的調查，僅僅三十三個人，在去世前不到一年認購的比內公債（1952年發行的公債）就已經使得他們的繼承人少繳了十億法郎（一千万新法郎）的財產繼承稅。^② 由此可見，1958年的比內公債使大資產階級少繳了大量捐稅。有人曾經計算過，按照被繼承人遺留下來的子女人數的多寡，每繼承一百万法郎（一萬新法郎）的這種公債，可以少繳二十萬零五千到三十萬零五千法郎（二千零五十到三千零五十新法郎）的捐稅。^③

此外，凡是手里持有外匯的人都可以享受完全豁免捐稅的權利，當他們把外匯匯回國內時，免除他們原來應該照章繳納的25%的賦稅。這就保證了這些外匯通過不合法的逃稅所得的利潤既不需要繳任何稅，也不需要上任何捐。6月17日，比內宣稱：我們的公債“應當使國外的資本和財產回到國內來……它們可以重新回到法國經濟中來的，對於這一點我可以在此正式保證的；它們不需要任何手續，不受任何威脅，不必有絲毫顧慮。”

就這樣，戴高樂一方面拒絕履行過去對國有化企業工人以及對公務人員許下的諾言，另一方面，他却給偷稅漏稅者和外匯貿易商提供一筆優厚的報酬。最後，他增加了給銀行的獎勵金，把銀行經售公債的佣金率提高為1.5%，而1956年經售公債的佣金率才不過1%。法蘭西銀行總裁發出通知同意各銀行把貼現率的最高數額提高到2%，以便讓對它們“有好處的”顧客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來認購公債。各銀行把出售公債得來的款項上繳國

① 見1958年7—8月號《經濟與政治》中的德洛爾姆一文。

② 見1959年10月30日《法蘭西生活報》上的賽迪洛一文。

③ 見1958年7—8月號《經濟與政治》中的德洛爾姆一文。

庫之前，還能夠在一定時間內自由處理，“這樣它們就又可以撈到一笔相當可觀的佣金和額外利息。”^①

在所有這些被正式承認了的和合法化了的利益之外，還應當加上一筆從投機倒把中得來的秘密盈利：在國外有財產的人可以把外匯兌成黃金，據《工商業通訊》報道，他們因此就能得到5—6%的額外利潤；^②而那些向稅務機關隱瞞其盈利，並在理論上又無權享受豁免待遇的公司企業，由於採取從國外買進黃金然後再把它倒賣給政府的辦法不但“調整”了本身的處境而且還撈到了一筆額外利潤；^③最後，正如6月24日出版的《金融手冊》所說的那樣，由於某些原來在交易所里牌價很低的老公債券也可以用來購置1958年發行的公債，“這就必然會有一些內行人士利用證券交易狠狠地占了國家的便宜；”當然這些內行人士只

① 見《經濟與政治》48—49期，第17頁，德洛爾姆一文。

② “的確，同世界價格相比，把金條拿到巴黎出售大約可以多得貼水9%。因此，如果通過外匯市場把一元美金匯回國內，可以得到四百二十法郎，但是，如果把這一元美金在匯回法國前先兌成黃金，然後再把它寄到巴黎出售，那麼， $420 + 9\%$ ，就可以得到大約四百五十八法郎，足見這種做法是有利可圖的。當然，這其中應當扣除外國銀行所索取的費用以及運輸費和保險費，三者總計達2—3%。最後，把所有這些費用扣淨，一元美金約可兌得四百四十五法郎，也就是說仍然比黑市價格要高。”（見1958年7月1日《世界報》）這是一個國家和另一個國家在“兌換所”協同之下試驗成功的一種辦法，關於這種辦法的詳情，新聞界已經作了大量介紹。前曾引証過的德洛爾姆在《經濟與政治》上所寫的一文中指出：已經售出的黃金中，估計有三分之一，也就是說至少有七百亿法郎，都採用了這種辦法。投機分子從中得到了一筆相當於三百五十億到四百二十億法郎（三億五千萬到四億二千萬新法郎）的額外收入。

③ 1958年7月3日《回聲報》寫道：“上周末以來，有些擁有未曾上報的法郎儲備但又渴望利用豁免捐稅把它上賬的公司企業，它們把這種儲備寄往日內瓦，在那裡換成黃金，然後再把黃金弄到巴黎來出售。國家從中賺得了珍貴的金屬，有關公司雖然為這種代價昂貴的辦法支出些費用，但這使它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能是些同政府的那些执政者具有密切联系的人物。他们用市場上的价格把这些老公債券买进来，然后在发行新公債时再把它脫手，从中做了一笔出色的买卖。当时这种老公債牌价的驟然上漲就証明了这一点。^①

在发行了公債以后，戴高乐政府并没有到此为止。接着，1958年9月24日和25日，又公布了兩項賦予资本主义企业以新利益的法令。第一項法令規定建立一些和国家訂有合同关系的不动产公司，这些公司除了在財務上享有种种特权以外，还享有种种免稅权，这就是：免除公司稅；免除股票和公債証券的比例所得稅；加速企业及法人攤还在与国家訂有合同关系的公司里的投資；在再利用剩余价值的条件下，免除让与或偿付公債时应繳的稅款。第二項法令規定所有大型工业企业在納稅上都享有一定的特权，例如在原应納稅的盈利当中，可以立即扣除用于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費用；50%用于进行研究工作的投資和某些进行研究工作的公司的股票得作为特殊攤还項目处理；降低有关出让专利权和租让专利執照使用权的稅收等等。最后，为了充分表明第四共和国时期的优良风尚在新政权下并没有黜退，就像当年白兰地酒商推选出来的盖伊阿曾利用担任內閣总理的机会向白兰地垄断商孝敬了一大笔補貼一样，身为皮革业老板的比內，从1958年9月15日起，把皮革制品价值增漲部分的稅率，由27.50%降为17.50%。

但是，垄断資本向工人階級和人民中間阶层展开大規模进攻則是在宪法付諸公民投票（9月28日）和議會选举（11月23—30日）結束以后的事。1958年12月底，《官方公报》发表了魯埃夫

^① 1949年发行的公債(5%)，1958年5月14日的牌价为82.30法郎，6月16日上漲到99.50法郎；1944年发行的公債(3.5%)則从三千八百九十法郎上漲到了四千六百法郎。

委員會在秘密會議上制定出來的一系列指令。如果說在過去，由於各種政治設施的阻撓，大資產階級未能採取和實行某些措施，那麼，到了現在，大資產階級已經掌握了採取和實行所有這些措施的政治手段。財政部長比內宣稱：“我國過去的歷屆政府也知道挽救法國的靈丹妙藥，但是它們沒有能夠使用得上，因為它們缺乏用來建立它們的威信和發揮它們的效能所需要的時間。我國的各種政治機構當時就有加以深入改革的必要。如今戴高樂將軍只花了六個月的時間，就建立了一些和現代民主制度的要求相適應的新型機構。從此，全國必須而且也一定能夠井井有條地去完成一個真正的經濟和財政革命。但是，這場革命意味着我國人民要作出一番刻苦的努力”^① 金融界報刊也無孔不入地對此大肆宣揚。《法蘭西生活報》於1959年1月1日寫道：“1959年度預算要求全體法國人都來作出一番犧牲，作出一番從1926年以來未曾有過的犧牲。過去，在第四共和國時期，有哪一屆政府竟敢把退伍軍人的退休金一筆勾銷呢？有哪一屆政府敢於減少社會保險的支出呢？有哪一屆政府敢於取消工資及農產品價格的活動計算法呢？敢於把稅收提高到三千多億（舊法郎）呢？唯有在建立了新型機構的條件下，唯有在戴高樂將軍的威望和權力下才能叫人接受諸如此類的政綱。”

戴高樂政權就是用這種辦法來增加預算支出的。從下表可以看出，1957—1960年，預算支出的數字逐年增加，共計增加了一萬六千億法郎（即一百六十億新法郎）！

每年的稅收數字都要出現一個新的躍進：1958年增加五千八百二十億；1959年增加七千一百九十億；1960年增加二千零五

① 見1959年5月22日《世界報》：比內於1959年5月21日在紐約對報界發表的談話。引語中的重點是我們標的。

	預算支出*		軍事支出*		預算收入*			稅 務 收 入*
	投票表 決的支 出(包 括集 體 支 出)	实际 支出	投票 表決 的支 出	实际 支出	財政 法案 規定 的收 入	投票 表決 的收 入	实际 收入	
1957	48.70	50.87	13.62	13.64	38.20	41.30	41.12	36.91
1958	52.96	55.37	13.28	14.50	46.96	47.46	49.31	42.73
1959	61.89	63.81	15.90	16.34	56.02		56.86	49.92
1960 (預計數)	64.27		16.53		58.57			51.97**

* 以十亿新法郎为單位。

** 不包括国营烟草和火柴的收入。

資料来源:表內数字,1960年以前的系引自《財政統計和研究》,1960年的系根据
財政法案。

十亿,也就是說,1960年度預算同1957年度相比,共計增加了一
万五千亿旧法郎(一百五十亿新法郎)。

在1960年的預算中,稅务收入(包括烟草和火柴等国营专利
事业收入二十四亿二千万新法郎)計达五百四十三亿九千万新
法郎,其中:

間接稅三百五十九亿(包括工資待遇中的包干付款),占稅
收总額66.1%;

所得稅一百六十亿一千万,占稅收总額29%;

財產稅二十三亿七千万,占稅收总額4.1%。

前兩種稅收主要由雇佣职工和中产阶层来負擔,这就不难
判断戴高乐預算的階級性了。

万变不离其宗,肩負着垄断資本强加在全民身上最沉重的
担子的依然是雇佣阶层,尤其是工人階級。首先,由于間接稅的

增长，雇佣阶层付出了一大笔款项（間接稅从1958年的三百零三亿八千万增为1959年的三百四十亿六千万和1960年的三百五十九亿新法郎）；同时，由于在应当納稅的收入中又編入了单一工資的补助金，直接稅因而增加，他們就又付出了一笔稅款。

其次，由于靠工資过活的人在第四共和国时期爭取得来的某些社会福利如今被削減了，他們就又付出了一大笔錢。在往年，尽管法国資產階級向社会福利事业曾經发动过多次进攻，但是他們並沒有能够損害职工群众在1944—1946年代里所爭得的权利。可是現在，由于有了戴高乐政权，資產階級就达到了目的。1958年12月30日頒布了一項法令，法令規定一系列措施（取消三千法郎〔三十新法郎〕的养老金和撫恤金，取消社会福利部門原应依法付給的温泉疗养金；在有病須就医治疗时，規定发給只减收診金40%的就診券；降低家庭补助費；統一付給产期补助費的期限；取消只有一个五周岁以下独生子女而且只領一份薪金的家庭的补助費等），使得依靠工資为生的人們損失了六百二十三亿法郎（六亿二千三百万新法郎）。^①

最后，由于降低了工人階級的实际工資，他們就又付出了一大笔錢。

“把工資卡住”，这曾經是戴高乐和德勃雷政府首先操心的事。1959年1月23日《法兰西生活报》恬不知耻地写道：“我們并不认为靠薪金过活的人們的购买力已經差强人意，我們更不认为要求我国人民做出的牺牲已經攤派得公平合理了，可是我們仍然要毫不含糊地主張，必須把工資卡住不动，必須把它局限在政府指定的规范以內。”

戴高乐政府倒是很想把工資冻结起来，但是，正如《法兰西

^① 見《經濟与政治》1959年2月号馬利奧一文。

生活报》所說：“为了使自己觉得从道义上有权冻结工資，那就应当把其他各种收入(諸如紅利等等)也加以冻结。同时，当时的政局(选民投右派政党的票和在一定程度上投自由主义党派的票)也不允許这样做，所以戴高乐在12月間，德勃雷在其后，都放弃了单单冻结工資的办法。”

但是，如果說戴高乐政府沒有从法律上冻结工資，那么，它已采取各种措施在实际上冻结了工資。

首先，由于工人阶级于1958年6月遭到了挫折，他們内部出現了一种士气低落的現象，资本家利用这个机会。戴高乐政权登場以后的头半年里，罢工运动几乎陷于停頓状态，只是到了1959年2月才又开始恢复。1958年間劳資糾紛的次数和工人罢工的天数下降到1947年以来的最低数字。1957年同1958年相对照，就更能說明这种問題(1957年发生过二千六百二十三次劳資糾紛和四百一十二万一千三百一十七个罢工日，而1958年却只有九百五十四次劳資糾紛和一百一十三万七千七百四十一个罢工日)。罢工斗争的削弱和工人阶级在政治运动中遭受的挫折，使资本家老板向工人阶级发动更猖狂的进攻了。

此外，政府还利用了1958年和1959年的經濟危机，例如1959年3月20日《法兰西生活报》写道：“用工資考驗他們，看起来这个办法很不錯。如果說害怕商品滞銷限制了物价的上漲，那么害怕失业也限制了工資的增加。”

最后，政府使用了镇压手段。1959年夏季，德勃雷采取征用鉄路的办法破坏了鉄路工人的罢工并拒絕了他們的要求。

以上种种所产生的結果是令人信服的。执政党的一个成員在为財政委员会起草向国民議会提出的一項报告中說道：“从1957年7月1日到1959年4月1日，巴黎雇佣职工的购买力降低了将近12%。这种购买力下降对于一家之主表現得很为明显……

更何況這種購買力下降總的來說還是戰後以來的第一次，因此它給人一種更艱難的感受。”

但是資本家老板和政府當局並不準備讓工人的處境有所改善。1959年10月間，法國全國工業業主理事會主席和內閣總理，在相隔不了幾天的時間內，發表了類似的談話。喬治·維利埃說道：“今年，僱傭勞動者應當適當降低一下自己的購買力”^①。而德勃雷則說：“我們現在要求勞動者作出一番犧牲。將來我們還會要求他們作出更多的犧牲。”^②

就連政府方面自己所僱傭的人員，不論是國有化企業部門里的僱傭職工還是行政機關里的公務人員，政府當局也沒有將他們放過。它要他們滿足於只增長4%的薪金，而這個嘲弄性的施舍與他們在由於政府所採取的措施（如法郎貶值，取消補助金，增加稅收等）而引起的物價上漲以前所提出的正當要求還要相差很多。就連金融界報刊都承認了這一點：1959年1月23日《法蘭西生活報》寫道：“的確，為了息事寧人而向政府機關和國營企業里的僱傭人員和工人增長4%薪金並不能補償物價新的上漲。他們的薪金只增長4%，同私營企業里的工資比較起來，至多不過部分地趕上了以前的落后狀態而已。”為了安慰他們一下，這家報紙又接下去假仁假義地說道：“不過，在目前這個到處是失業的階段里，公務人員能夠肯定地領到全部工資就已經是件莫大的好事了！”

公務人員的基本待遇（以一百作為指數來計算），在1957年6月，根據當時的物價水平，就已經應當定為二十四萬法郎（二千四百新法郎）。但是從1957年6月到1959年10月，根據官方就二

① 見喬治·維利埃於10月25日在經濟新聞記者協會每月一次的例行午餐會上發表的談話。

② 見德勃雷於10月9日在法國電視廣播電台上發表的演說。

百五十种商品价格作出的統計，物价已經上漲27%，而政府方面却仅仅在1959年2月才把公務人員的基本待遇提高为二十二万九千法郎，并且要等到1960年10月1日才准备再把它提增为二十三万六千法郎(二千三百六十新法郎)。足見，1958—1959年間，物价上漲和公務人員工資待遇之間的剪刀差額大大加剧了。

被我們統称为“中产階級”的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也沒有能够倖免。工业部門里的干部也同样受到了工資实际冻结的牽連，并且成了“富有的外表标志”制度的实行对象。1959年的稅务“改革”損害了他們的利益，引起了他們极大的不滿，这种不滿表現在1959年秋季法国总工会从工程师和技术人員方面得到的票数有了显著增加，还表現在在同一期間“干部总联合会”进一步展开了爭取实现要求的活动(該联合会于1959年11月3日举行了一系列的示威和集会)。

与此同时，工业垄断資本和金融垄断資本还千方百计地企图来更多地夺取非垄断性部門(像农业，手工业和中、小工业企业等)所創造的价值，并且，为了它們自己的利益，还設法减少商业部門所占有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

同所有的雇佣劳动阶层一样，农民也由于退伍軍人退休金的取消，貨幣的貶值，間接稅的增加等而遭受了損失。此外，农民还成了一些特殊措施的牺牲品，例如取消农产品价格的規定指数，在购买农业物資时原可提取的15%的回扣被压低了三分之一，增加农业收益稅(农业收益和所得的比例稅額由19.8%提增为22%)，提高农业家庭补助会的会費，取消关于肥料、硫磺和硫酸銅的減稅、免稅制度，建立对同經營牛奶有关的資金的課稅制度，取消若干各种各样的补助等。农产品价格的規定指数^①是农民在第四共和国时期經過长期斗争才終于取得的一項权利。这种权利可以让小农生产者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別人利用經

济法規来玩弄損害他們利益的把戏。因此，工业垄断資本总希望把它取消掉。1958年5月13日工业垄断資本通过法国全国工业业主理事会，提出了“取消农产品价格的規定指数法”的要求，认为“这种制度已經使它的受益者产生了一种可怜的幻想，幻想他們一定可以不受普遍貧困化的影响。”

上述規定指数被取消后，大大地加剧了工业品价格和农产品价格之間的剪刀差額。

1959年头三个季度，工业品价格的指数（見《統計研究所周刊》）比1958年工业品价格的平均指数增长了10.5%，而农产品价格的指数却下降了5%（1958年6月至1959年5月，下降得最厉害时曾达到过13%）。

在这方面，遭受損失最大的要数小农和中农，因为他們和大生产者不同，他們沒有办法降低成本。工业資本和农业資本相互勾結，玩弄階級团結，力求推行一系列仅仅有利于他們而却經常不顧农民利害的措施。例如在农业劳动中，政府把最低工資的标准限制在比其他各行业的保証最低工資要低22—28%的标准上。又如农产品价格的規定指数虽說是已經被政府取消，但是种植甜菜的大生产者仍然获得了六百八十七法郎的干旱損失补偿費，其結果是1959年的甜菜价格上涨了20%。再如，过去种植小麦和葡萄的小生产者在处理剩余产品的时候是不需要納稅的，可是如今却給他們加上了这种負担，而产品之所以会有剩余，主要是大生产者所造成的。

1959年5月16日的法令把小葡萄种植者从一开始酿酒就可

① 根据1957年9月間頒布的一項法令，农产品的价格应当年年自然而然地按照工資和农业所需各种产品的价格以及巴黎当地各种食品的价格来重新估定。

以拿来交易的葡萄酒数量由五千公升压低为三千公升，并把收获酒量为七千五百公升以下的葡萄种植者也列入須向国家繳售葡萄酒精(由国家用低价收购)的名額以內，而在这以前，他們并不負担这种义务。1960年1月7日的法令一方面降低了八千六百个收获酒量为十万公升以上的葡萄种植者在处理剩余产品时所应繳納的稅款，另一方面却又把这种降低的稅款轉嫁在葡萄酒收获量在一万公升以上十万公升以下的中、小葡萄种植者身上，其結果是使一百七十亿法郎(一亿七千万新法郎)从后者的口袋流进了前者的腰包。最后，上述法令还免除了四万七千个最大的农业經營者原应向农业家庭补助会繳納的六十亿法郎(六千万新法郎)的会費，致使今后这笔費用要由全体农业劳动者自己来承担。

购买农业用具时，所购买的产品及零件，其价值不滿三万法郎(三百新法郎)者，10%的回扣取消了，而购买价值更大的农业用具的人們却繼續享受这项权利。在稅收方面也存在着同样的不平等情况；以种植蔬菜为例，政府对小生产者征收的稅款比大生产者征收的还要重；例如在賽納—瓦茲省，种植面积在一公頃以上者，每公亩收稅一千八百法郎(十八新法郎)，而种植面积为三十公亩或不到三十公亩时，每一公亩就要收稅五千法郎(五十新法郎)。最后，1959年1月7日的法令取消了麦田地租的規定指数，而代之以其他农田的地租規定指数，致使地租价格猛烈上漲，在有些情况下，上漲了一倍。^① 据“国立統計調查与行情研究所”的材料，农民每年向大地主們交納的地租，1958年是二千一百五十亿法郎(二十一亿五千万新法郎)，1959年就增加到二

① 見全国农民及佃戶組織总書記在該組織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1960年2月18日《世界报》)。

千三百亿法郎(二十三亿新法郎)。

这是垄断资本统治集团为了资本主义大经济的利益而存心采取的旨在消灭个体经济的一项政策。鲁埃夫委员会在它的报告书里宣称：“一旦形势摆脱了人为的条件（这里指的是补助金）以后，那就必须把国民经济的结构加以重新整顿，不让那些过了时的经营方式再存在下去。”接着，德勃雷总理于1960年3月2日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这种经营方式的规模已经不能同现时代的扩张要求相适应了，规模过小的经营方式已经不再符合国民经济的要求……必须在每一个地区里，把正常的经营规模确定下来。”

蒙若于1960年2月间向农业庄园主公会全国联合会代表大会提出的、代表着控制该联合会的农业垄断资本家意见的报告书，也一丝不差地道出了同样的主张；报告书上说：“必须保持下来或加以发展的是这样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就像我们已经阐明过的那样，它们必须是让我们有利可图的，或者是能够让我们有利可图的。这种结构就是专业性的农业，商业性的农业，能够生产的农业。应当为这样的农业，而且单单是为了这样的农业来拟定农业政策。”

这份报告书还明确指出，从1955年普查的二百二十六万零一百五十五个农户中，应该被消灭的就有七十九万个。戴高乐政府指望通过共同市场来加速这个运动，例如欧洲委员会关于六国共同农业政策的草案（见孟舍尔特的报告）就规定要把耕种面积不到十公顷的农户全部消灭掉。

在向工人阶级和农民展开进攻的同时，垄断资本向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发动了进攻。这种进攻除了表现在税收措施上以外，还反映在政府当局对旨在消灭独立小铺主的集中化运动所给予的支持上。比内说道：“政府决定大力支持在正当竞争范围

內能够促使商业現代化的一切倡議。”^①实际上他是在贊同建立銷售量極大的大商店和超級市場。負責工商事務的國務秘書丰塔內這樣說道：“為了共同市場，法國的貿易必須有個有效的機構。在這方面政府將一視同仁地對所有的貿易企業執行一種鼓勵政策；在這些企業中，凡是能夠導致生產率大大提高的一切成就，政府一定提供貸款。”^②

有一點是很有趣的，那就是在1959年12月成立的“商業分配綫組織研究公司”里，人們會看到，同美國資本（蒙毛思利公司和大聯合公司）并列的，有在政府中以吉斯卡爾·德斯坦為代表的東方匯理銀行和由戴高樂分子領導人物德瓦夫蘭以及夏朗東等所控制的“廉價”大百貨公司。^③

當然，壟斷資本家是會分擔一下要求勞動人民作出的“犧牲”的。他們一方面把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拿來開刀，另一方面則運用他們對政府的全面控制，進一步加強自己的特權和經濟利益。

1959年度國家預算雖然把秋收增加了三千一百億法郎（三十一億新法郎），然而，正像《世界報》在1959年1月18日所指出的，“這幾乎同大企業公司毫不相干，因為它們又得到了二十億，這就等於豁免了它們二十億的賦稅。……”

但是，要求托拉斯繳納的稅款，《世界報》的估計還是過高的。有人得出結論，^④同1958年相比，壟斷資本公司支付的稅款減少了三百二十億（三億二千萬新法郎），而政府在1958年12

① 見比內于1959年11月6日在國民議會上發表的演說（1959年11月7日《新聞報》）。

② 見1959年10月27日《新聞報》載丰塔內在第七屆商會上的發言。

③ 此外還有市府大百貨公司，巴黎商業銀行和日內瓦巴士銀行。

④ 見1959年2月《經濟與政治》，第21頁德洛姆的一文。

月所頒布的一系列法令却讓它們在稅收方面占了新的便宜，其中例如就資產項目和業已償還的折舊費進行重新估價，就使大企業公司避免通貨膨脹帶來的損失；又如稅務制度的改革也讓石油企業公司在投資和服務性支出以及製造費等方面享受了免稅待遇，而在過去，它們並沒有這種權利，據估計，石油公司在這上面得到的好處，竟高達四百億法郎（四億新法郎）左右。9月24日的法令就已經對建立與國家訂合同的不動產公司豁免了大量稅款；現在，這些不動產公司又得到了一系列新的特權（如向公司提取的紅利可以免稅；把折舊費規定為25%，重新用來購置與國家訂有合同的公司股票的剩餘價值可以豁免課稅等）。最後，還將這種有關與國家訂有合同的公司種種規定又推廣到為發展出口貿易而組成的一切公司中去。此外，工人參與企業經營或投資分肥的公司，還有企業自己在經營動產有價證券時所得的剩餘價值等等，也一概享受免稅待遇。

1959年間，德勃雷政府以法國加入共同市場為由，又給了壟斷資本企業一些新的利益。1959年1月，在國民議會就政府的總政策進行辯論的一次會議上，社會黨人雷因哈特指責政府“用要求窮人作出犧牲的辦法來購買資本家們的信任。”內閣總理在回答他的時候這樣說道：“當這位社會黨的發言人提到，某些措施在他看來對資本家過份有利的时候，他應當好好地看看現實。想要加入共同市場，想要發展自由競爭，同時又必須採取某些措施，雖然這些措施可能對我國國土以外的資本有利，這裡存在着一個基本矛盾。”為了使法國資本穩定下來，也為了讓美國資本投到法國來，就必須向它們提供一些特殊的利益。

就這樣，1959年5月的法令把稅務總則第三十九條所規定的降低稅收10%的適用範圍擴大到了某些裝備物資上去，以便讓採用這些物資的企業能夠加速償還1960年1月1日以前訂購的新

物資的折舊費。商業銀行也享受到了這種好處，而在这以前，只有對現代化計劃作出貢獻的工業企業才能享受這種好處。結果是：像巴黎荷蘭銀行一類的壟斷金融機構撈得了好幾百萬新法郎的便宜。^①

資本主義企業除了在稅收上享有種種特權外，還可以得到不須支付任何代價的、完全是白送給它們的各種各樣的補貼，這些補貼是不勝枚舉的。只要指出這樣一點就足够了，那就是從個人專權建立以來，這種補貼大大的增加了。單就1959年1月至10月在某些所謂“關鍵性”地區建立起來的企業所領到的獎勵金為例，就已高達四十億法郎（四千萬新法郎），為1954—1959年所發獎勵金總額的一倍，政府當局還對這項成績表示特別得意哩！^②

但是，享受最大利益的主要還是那些在非洲投資的企業；因為，正像吉·維利埃所說的那樣，法國的企業老板願意充當君士坦丁計劃的“發動機”，並不是由於他們願意輕率地充當這個角色，而是為了要實現高額利潤、並且要確信有把握得到這筆巨額利潤時才肯這樣干的。

1958年1月31日的法令以及第四共和國最後几屆政府所頒布的其他一些法令就已經給了在黑非洲、撒哈拉和阿尔及利亚

① 1959年9月27日出版的金融周刊《法蘭西財富》在談到這個問題時寫道：“應當祝賀政府方面這種諒解的行為。……例如，我們可以回想一下，巴黎荷蘭銀行最近增加的資本竟達七十八億四千萬法郎。如果把這筆增加的資本投到其活動符合於現代化計劃要求的一些企業中去，那就等於用這筆七十八億四千萬法郎節約了7%，也就是說四億五千萬法郎。”（四百五十萬新法郎）

② 負責財經事務的國務秘書說道：“我們只花了十個月的時間，就做完了比過去花了四年時間所做的還要多一倍的工作。”（見1959年12月16日《新工廠報》）

投資的金融公司和工业企业一系列空前的特权。但是，戴高乐政权上台以后，垄断资本家们认为他们还应该得到更多的利益。1959年3月初，在由德鲁弗利埃主持的一次辩论聚餐会上，巴黎荷兰银行总经理雷尔宣称，政府所给予的利益，“就需要吸引私人资本对君士坦丁计划进行投资的数量来说，还是不够的。”他要求“国家在给予投资者以利益上不要吝嗇，要在政治上保障他们，要保证他们有利可图，要让他们在税收及财务上享有特权，要使他们能得到廉价的动力。”^①

这种愿望很快就实现了。1959年4月24日颁布了一项法令，又给了资本家们一些新的特权。这项法令以及1958年12月31日的法令（也是戴高乐政府所颁布的）生效以后，凡是到阿尔及利亚及撒哈拉去建立企业的就能领到下列巨额补助：

——可以领到高达投资总额40%的装备奖励金；

——用来支付社会保险费的、高达备案工资35%的就业奖励金；

——可以将贷款的年利息压低到3%；

——对从事生产的企业偿还其业已缴纳的赋税，偿还的范围直到包括部分装备的采购税。

通过这些办法，从1958年9月到1960年1月，被认为“合格”的企业所得到的利益达到了一百七十多亿法郎（一亿七千多万新法郎），也就是说大约相当于他们的投资总额（不包括购置土地的资本）的40%！^②

在上述种种奖励金以外，还要加上同样重要的由于豁免税收而得到的好处：

① 《世界报》，1959年11月12日。

② 《法蘭西生活报》，1960年1月29日。

——十年以內，豁免工商业的收益稅或是頂替收益稅的其他賦稅；

——五年以內，豁免对生产性营业原应征收的賦稅。这种賦稅有时可达营业总额的8%。

其結果是，有关企业所付出的稅款，和它們所招認的收益相比，簡直少得可憐。^①

最后，被认为“合格”的企业还享有經濟上的特殊利益，例如在拉克地区，大量使用天然气的企业（主要是炼鋼垄断企业和制氮化学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和电气化学工业等）每消費一立方米哈西尔梅耳，“拉克”公司的天然气只要付价三点一五法郎，而不是七点三〇法郎。

由此可見，戴高乐政权一上台，国家垄断資本主义取得了多么巨大的进展。这种进展的表现形式，我們在本书一开始时就已經談过，那就是由金融寡头窃据了国家的一切領導机构。

在經濟方面，这种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扩展表现为国家投資的增长，而在这种投資上，某些势力雄厚的工业集团，像許奈特和达索等集团，都得到了特殊照顧。这种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扩展表现为上述投資以及政府在有关开发动力方面的政策都朝着一个方向，即完全朝着对占統治地位的垄断資本有利的方向发展。此外，它还表现为金融寡头控制了整个国有化經濟部門。

在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經濟政策这个問題上，垄断資本的各

① 1958年，在撒哈拉，南方鑽探公司只繳納了七千七百万旧法郎的稅款，而它所供認的收益，在未經扣除折旧費以前，是十三亿三千五百万旧法郎。另外一家鑽探公司——弗郎科公司，它所供認的收益，在未經扣除折旧費以前，是十一亿三千四百万旧法郎，而它所繳納的稅款仅仅只有三千八百五十万旧法郎。（見1960年2月5日《法蘭西生活報》）

个統治集团之間存在着兩種不同的傾向，一种傾向是把貨幣問題放在首要地位，另一种傾向則主張把針對經濟危机和訂貨量下降現象而展开的斗争提到第一位。第一种傾向自称为“通貨收縮主义者”，第二种傾向則把自己叫做“通貨膨脹主义者”。前者所代表的主要是金融界的特殊利益，他們所需要的是能够有一种“强有力的”貨幣，以便往国外投資，例如向共同市場範圍以內的其他国家投資，同时也便于把美国資本吸引到法国来。后者所代表的是工业垄断資本的主要利益，如許奈特財团和汽車制造业等，他們对于經濟危机的恐惧更甚于对再来一次貨幣貶值的恐惧。①魯埃夫是第一种傾向的正式代表人物；代表着第二种傾向的是夏朗东。政府当局最后采取的，并由比內执行的是介乎兩種傾向之間的一种折衷政策。超过了实际需要的貨幣貶值为各項出口工业打开了方便之門，并把法郎的价值在一个比較牢靠的基础上“稳定”了下来。这是有利于吸引美国的投資和共同市場条約的实施；但是，与此同时，政府方面不仅沒有放

① 許奈特集团所屬各企业的报告書对这一点提得特別露骨。报告書說：“1958年，我国对各項行政机构进行了大力改革，此后，又采取了一整套用来整頓全国財政的有力措施。

“必須振興国民經濟，为此目的而作各項出口的重要安排，看来是恰当的，无可非議的。但是，紧跟着限制貸款，提高貼現率及利息之后，又增添了新賦稅，取消或部分冻结了若干用于装备的支出以及突然宣布貨幣貶值等等，这些补救办法显然是操之过急了。当然，由于形势十分严重，不能不采取这些措施，但是，長此下去就会招致同样严重的經濟危机。这种危机我們認為是能夠而且必須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这种危机将会沉重地打击那些竭其全力为国民經濟的增長而努力的企业的积极性，还必然会危及社会安宁。法蘭西国民对于某些不公正和不合邏輯的事物是特別敏感的。在商品不能滿足社会需要和人人都迫切要求工作的情况下，他們不能忍受企业生产陷于停頓和劳动力陷于失业等状态。

“因此，我們本着不單是代表私人利益的精神，十分干脆地要求逐步削弱制止通貨膨脹的种种限制的措施。”

慢各項投資的速度，反而增加了投資的數額。在1959年度國家預算中——第一個百分之百的戴高樂預算，官方投資數字增加了三千三百八十億法郎（三十三億八千萬新法郎），即比過去提高了30.9%。由此可見，壟斷資產階級兩種傾向之間的這個折衷政策損害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因為對於壟斷資本的擴張有利的投資增加了，而所謂“社會性”投資卻減少了。

那麼，哪些集團從戴高樂的經濟政策中撈到了特別多的便宜呢？

戴高樂的軍事戰略是為法國裝備自己的原子突擊力量；這種戰略給金融資本的統治集團提供了一種雙重的利益。第一種利益表現在某些在政府內部擁有特別有權威的代表的集團接到了若干訂貨。在保衛新共和聯盟里由夏郎東為代表的達索集團就是這樣來承制運載原子彈所需要的飛機的。1960年度預算撥給了達索集團六百億法郎（六億新法郎）用來製造一百架“蜃樓—3型”超音速驅逐機，四百二十億法郎（四億二千萬新法郎）用來製造五十架“蜃樓—4型”戰略轟炸機。此後，1960年預算又撥了一百億法郎（一億新法郎）給一家“導彈探索及研究公司”來從事原子導彈的研究及製造工作；這家公司是由幾家國營公司加上一家私營公司來組成的，而這家私營公司又恰恰是達索公司。就這樣，單是達索集團自己就從1960年度預算中得到了一千一百二十億（十一億二千萬新法郎）的貸款，計占年度預算總貸款額五千九百億（五十九億新法郎）的五分之一。

最初的幾枚原子彈是由誰來製造的呢？雷干尼發射場的電子裝備又是由誰進行的呢？在這方面，我們首先看到的是：法國湯姆遜—豪斯頓公司、聖哥班公司、貝西奈公司、克勒佐鋼鐵公司、拉多公司、阿爾薩斯機械製造公司和阿爾斯多姆公司^①（提供了鈾的庫爾曼公司不算），也就是說，是摩根銀行、巴黎荷蘭銀

行、許奈特集团和洛希尔集团。我們一定还記得，湯姆遜—豪斯頓公司的董事長是德勃雷的亲戚，因此，1959年1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发表的一項公报宣布，^②由法国政府指定的作为五家欧洲公司之一，并同它們共同負責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制造“鷹式”導彈的公司，就是这家公司，也就不足为奇了。

原子科学用于軍事目的給財政資本統治集团带来了第二种好处，那就是：为同鈾生产有关的公司的利益，以及石油集团的利益之間取得妥协創造了有利条件。在这以前一直是缺乏动力資源的法国資產階級，如今由于有了利用原子能动力的可能性和在撒哈拉找到了石油和天然气，他們就面临了一个对他們完全新的問題；在他們面前发生了动力資源过剩的問題；現在他們不能不在三者之間作出抉擇：要煤炭呢？要原子能呢？还是要石油呢？他們当然首先放弃煤炭，因为煤矿都已經国有化了，把矿井关掉对私人資本不会有什么損害。工商部长让內說道：“今后将由天然气和石油来滿足我国日益增长的动力消費上的需要……”^③“拿我來說，我坚决反对为了人为地保护煤炭而增加石油制品的賦稅以便使煤炭和石油展开竞赛。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必須关掉那些无利可图的煤矿。”

政府当局于是作出决定，不但不再开采汝拉省可以用来炼焦的煤层，就連諾尔省和洛林地区的煤矿的生产也仅是先維持現狀，而后再加以压縮。此外，政府当局还停止了在朗塞河畔业已开工的潮水动力工厂的建設工程，該項工程原来可以使法国在发展利用潮水动力的事业中占据領先地位，并可以使布列塔尼半島实现工业化。最后，为了要利用撒哈拉的石油和天然气，

① 《新工厂报》，1960年3月17日。

② 《經濟金融通訊》，1959年1月19日。

③ 1959年12月2日对經濟新聞界发表的談話，見1959年12月3日《世界報》。

建設原子能发电厂的规划也被擱置起来了。1959年12月5日的《新工厂报》写道：“可以肯定，在目前情况下，加速发展利用原子能没有什么好处。不論是在法国还是其他国家，为了降低利用原子能生产的每瓩电力的价格而兴建的工程，其进展速度是令人失望的。当前的情况是这样：石油产品价格低廉，产量也在不断增加，同时，对我国来说，它还有这样一个額外的长处，那就是，用不了多久，我們就可以不必再在石油方面支付外汇了。”

《动力》杂志和《参議院財政小組委员会关于原子能问题的报告》也唱出了同样的調子。前者解釋了为什么“把发展原子能所須付出的努力擱置起来”，后者得出結論說：“在目前时机，我們认为把重点放在带根本性的探索工作上比放在建設一連串发电站上要来得恰当。”②

苏斯戴尔不得不承认他在动力政策上为了石油企业家的利益而所作的轉变。1959年11月間，他在参議院里說道：“我們的原始规划是在动力奇缺的假設情况下制定出来的，就連欧洲原子能联营条約也是在这种情况下簽訂的。現在情况大不相同了。我們有了鈾資源，我們发现的石油資源可以讓我們喘口气。我們的规划可以从此擱置起来了（黑体字是我标的。——作者）；

① 《动力》杂志写道：“由于欧洲的煤炭生产出人意料过剩和在我国本土及撒哈拉找到了大量天然气和石油資源，因而发生了驟然变卦，从这一点来看，在一段較短的时期內，甚至在一段不長不短的时期內，必須采用矿油燃料来满足我們在动力方面的需要这件事，似乎已經无可置疑了。

“当初想用原子动力来頂替燃油动力的打算，如今只好暫緩执行，这就是姑且把发展原子能所須付出的努力擱置起来的原因所在。如果看到，为了开发最近发现的石油資源，正需要这些原可用来发展原子能的資本，上述姑且擱置起来的道理就更加明显了。”（摘自《动力》杂志1959年第11期里加德的文章）

② 摘自《情况报告書》，第23号（报告人：布許）。

同时,在我們面前出現了这样或那样的不同条件,使我們可以进行选择,不再过份加重政府的財政負担。”^①

正像大家所看到的,制造原子彈这件事不仅透露了法国帝国主义想在欧洲取得統治地位的意图,而且还暴露了一种目的,那就是可以調和鈾生产者和天然气及石油生产者之間的利益冲突;因为,假如把原子能純粹使用于和平目的,那么,在目前情况下,他就会導致鈾生产者和天然气及石油生产者相互竞争。反之,假如把鈾拿来生产制造原子彈所需要的鑛,而不是把它当作燃料用于原子能发电站,那么,兩者的产品銷路就都会同样地得到保障。

最后,財政資本和金融寡头还利用国家政权来掌握对国有化企业的控制权,或者滲入在营业上大有前途的国营公司,或者用廉价收买的办法进而解散这些公司。

1958年7月24日,克勒佐公司的夏尔、許奈特被任命为里昂信貸銀行董事会成員这件事就是上述第一种傾向的特別突出的例証。第二种現象主要发生在由国家出資成立起来的石油公司里,当这些公司在寻找石油上获得了重大发现时,私人資本就鑽了进去。这就是說先由国家,即法国納稅人,来独自承担一切风险,然后,等到剩下来的只是获得利潤时,金融資本就出来承接。試举勒巴尔国营公司为例,該公司曾发现哈西—麦薩烏著名油层并和法国石油公司合資开采該油层。1957年底以前,勒巴尔公司的全部資本都是国家投进去的。到了1958年1月,私人資本开始向这家公司滲入,但数量还很不大:科非勒普石油公司只在勒巴尔公司里投了占总额1.55%的資本。但是后来,随着戴高乐政权的上台,这个运动的发展規模就迥然不同了:从1958年9

^① 《新工厂报》,1959年11月12日。

月到1959年1月，私人投資在勒巴尔公司資本總額中的比重增加到了19%；科非勒普公司占有5.35%，13.65%則為一些其他的私營石油公司（熱那勒普石油公司、非那勒普石油公司、勒普法朗斯石油公司以及科非邁爾公司）所擁有。這樣，所有這些私營公司都滲入了國營勒巴尔公司，而且以後它們在開發撒哈拉石油方面還都不斷地擴大了投資額，因為國家本身沒有在控制着哈西—麥薩烏二分之一石油生產的法國石油公司里再增加投資。

另外，金融集團還想把國家準備解散的相當數量的工業企業據為己有。《新工廠報》就武裝部隊部長皮埃爾·居約馬的談話發表了評論，該報在提到關於擁有五萬名職工的國營企業的問題時寫道：“設立一個工業局來研究如何把國家準備加以解散的國營企業轉讓給私人經營將是有用的。”

最後，國家還出面干預了集中化運動。例如，為了應付法國造船工業所面臨的危機，公共工程部長認為唯一的辦法是從現在起到1962年底，把所有的訂貨全部由“在國際競爭中具有特別優越條件的，並且具有發展副業生產能力的幾家造船廠里去”來承擔。他還認為，唯有那些“在工業上，商業上以及財務上處境十分有利的，並有一切可能來獨自應付國際競爭的”造船企業，才能減少國家的援助。^①

通過戴高樂政權的上台而竊據了國家統治機構的金融寡頭，就是用這種手段來使得世界資本主義獲得巨大進展，並且大大地加強了各個壟斷集團對全民進行掠奪的能力的。在結束這一章前，我們只來舉出其中的一個例子，這是在戴高樂政權之下的一個特別典型的例子。1958年，由於發生了經濟危機，法國

^① 見1960年1月8日《新開報》：《關於法國造船工業當前處境問題的白皮書》。

“勒尼克耳公司”虽然垄断着整个法国镍的生产和销售，但到了1958年第二季度，它就陷入了困境，因为它的产品销售量的下降以及在国际市场上镍价格的下跌：该公司所生产的镍的成交量1957年是一万一千三百吨，而1958年全年才只不过销售了七千一百八十吨（其中四千四百吨是上半年售出的，二千七百吨是下半年售出的）。“镍公司”是由洛希尔财团来控制的一家公司，而代表着洛希尔财团利益的勒内·迈耶又是该公司的董事长。那么，为什么这家公司不向戴高乐政府呼救呢？难道当时的办公厅主任以及实际上的内阁总理不正是蓬皮杜而是别人么？不，并不是这样，1958年9月间它就向政府呼吁过了。1959年7月公布的、勒内·迈耶本人所提出的有关该公司的报告上有这么几句，谈的就是该公司当时的情况：“这种情况政府方面并不是不知道，1958年初秋我们就向它说明过了。”那么，蓬皮杜能对勒内·迈耶提出的要求置之不理么？当然不会。上述报告说：政府“完全同意在向新喀里多尼亚岛进行投资的各项计划执行完毕和发生作用以前，对镍的生产提供暂时的援助已经成为势所必行的事情了。”由此可见，为了让该公司能够按照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出售产品，从而继续赢得利润，戴高乐政府给了它一大笔完全由国家白送的补贴。它所收到的这种补贴，在1958年是二十亿法郎（二千万新法郎），1959年是十七亿法郎（一千七百万新法郎）。^①但是，虽然戴高乐白送给了它这么多的补贴，这家公司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把全部存货都销售出去。上述1959年的报告说道：“尽管我们为了降低产量而采取了种种措施，到了1958年12月31日，我们还是堆积着大量的成品存货，从我们的眼

^① 这些数字系根据伊里苏于1959年11月24日代表财政委员会在国民议会上所作的一篇报告。1960年，这家公司又得到了八亿法郎（八百万新法郎）的补贴。

自上可以看出这一点。”可是到了1959年情况就完全改变了，报告上说：“在商业方面，如果说1958年年底的几个月特别困难，那么到了1959年第一季度，不论是从国内或国外，我们都接到了大批的定货，1958年年底的剩余存货很快就销售一空了。”怎么会好转起来的呢？一部分是因为世界经济在开始回升，但是主要的原因并不在此。报告说道：“在国内，我们已经开始把铸造硬币所必需的镍交付给货币及奖章公署。你们也都知道，一个新法郎的硬币是用一块纯镍铸成的。”

由此可见，1958年12月底与法郎贬值同时宣布的行将铸造的所谓“重”法郎，不仅是用来转移公众对法郎贬值后果的注意力的一种诡计，而且也是为了搭救“勒尼克耳公司”的一项措施。1959年9月，在勒内·迈耶陪同下，国务部长苏斯戴尔亲自前往新喀里多尼亚岛，为在雅特河上新建成的水力发电站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典礼。这座发电站是由法国纳税人的钱修建成的^①，投入生产以后，它可以使镍的成本大为降低，使经营公司的利润大为增加。^②

由此可见，从整体到最微小的细节，戴高乐政权的经济政策特点就是：它是为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利益服务，尤其是为在政府内部直接安插了自己的代表人物的垄断公司及垄断集团（如大商业银行、石油资本家、许奈特集团、达索集团等）的利益服务的一种阶级政策。

这就是戴高乐政策的总路线，绝不能因为政府在群众压力下也曾作了一些让步就说这不是它的总路线。1959年夏季和秋

① 关于这一点，请参阅我所著的《垄断集团是全民的公敌》，第184页。

② 1958年8月，蓬皮杜担任戴高乐办公厅主任时，洛希尔集团的另一家公司，拉多公司，也获得了“修改单据”的许可，从而捞到了八亿五千五百万法郎（八百五十五万新法郎）的额外利润。

季,面对着垄断资本的进攻,人民群众已经开始愈来愈坚决地予以回击。没用多久,經驗就証明了戴高乐及其政权并不是什么超党派、超阶级的东西,更不是什么超乎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之上的东西。

自从1959年春天起,工人阶级的斗争运动已经开始恢复:每个月的平均罢工天数已经由1958年第一季度的一万五千天次增加到1959年4月份的十一万六千天次;到了1959年下半年,运动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规模也一个月比一个月大了起来。^①

尽管戴高乐曾经断言“政府决不让步”,但是在有些问题上他还是被迫让了步。1959年6月10日,他不得不撤销了他在半年以前作出的并且已经由社会保险部门执行的医药费报销不得超过三千法郎的规定,此外,他还将家庭津贴增加了10%,而三个月以前他还顽固地拒绝过提高这种津贴;他不得不把退伍军人的某些退休金予以部分地恢复,并且许下诺言在1961年元旦还要再向退伍军人作新的让步;1959年底他没能办到将每年增加的工资限制在2%的范围内,而这种限制是他自己在取得垄断企业老板们的同意后规定的。

就这样,工人所进行的斗争缓慢了1959年第四季度工人阶级贫困化的速度,虽说没有完全把它制止住。根据劳工部统计,

① 钢铁工业方面,1959年10月发生停工事件九十次,而在同年12月则为三百零一次。1958年第四季度仅发生停工事件九十三次,而在1959年同一个时期停工次数增加到五百四十三次(根据法国总工会冶金工人联合会的材料)。同一材料表明,1959年第四季度期间有四十万冶金工人在各种形式下(罢工,短时间罢工,停工)参加了斗争,迫使企业主增加工资。工人的斗争运动还遍及到公务员(将近一百万公务员参加了12月2日的罢工),银行职员(1959年最后的几个月巴黎各银行发生了一百五十次停工事件)以及国有化的企业(法国电气与煤气公司,社会保险公司,地下铁道公司,巴黎公共汽车公司,广播公司和电视公司等)。

1959年10月到1960年1月，单身汉雇佣劳工的购买力没有下降，但作为一家之长的雇佣劳工，由于家庭补助的实际价值下降了1.8%，他们的购买力却在继续下降（有五个子女的家长降低了1%，两个子女的家长降低了0.4%）。

戴高乐的經濟政策不能不在农民中間引起强烈的不满（这些农民在1958年9月28日的公民投票中曾經大量地投了拥护戴高乐的票）。1959年10月，菲尼斯太尔省有三万农民举行了示威游行；这个运动是在不断扩大的，在一个月的期間（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初）就有二十二万农民在不同的外省城市里举行了集会；1960年2月，即阿尔及尔极端殖民主义分子所发动的1月24日暴乱事件失败以后，这个运动又有了新的發展，致使政府当局和垄断资产阶级被迫于3月初作了一些让步并答应为部分农产品恢复其价格的規定指数。^①

农民的极大不满使得大多数国会议员根据宪法条款向“共和国总统”提出了召集国会紧急会议研究一下农业问题的要求。戴高乐拒绝了这种要求，他的借口是这些議員所以会提出这种要求是因为有“一个职业性组织的领导人”在他们之間进行了活动。这真是一个十足操在金融垄断集团手中的政府的耐人寻味的論据。

① 在布列塔尼人民的压力下，德勃雷取消了关于朗塞河畔潮水动力工厂工程停止进行的决定。

总的結論和对批判的批判

从戴高乐的各項政治設施和政策来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結論：

一、戴高乐制度是已經抛弃了资产階級民主的垄断資本專政的一种独特形式，但它还不是法西斯主义。以下兩個主要方面的联系使戴高乐政权同实行并維持大资产階級統治拴在一起：

由金融資本来直接掌握国家政权；把議會貶低到从屬地位；这是法国资产階級在資本主义发展到当前的最高形式，即国家垄断資本主义阶段的一项帶有根本性的始終不渝的要求。由此可見，戴高乐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資本主义总的发展趋势的一种产物。

与此同时，戴高乐制度又是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总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新阶段以及法国垄断資本殖民体系陷于崩潰的时期，由法国垄断資本所掌握并企图用来克服其統治制度所面临的特殊危机的一种工具。戴高乐主义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在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中，阿尔及利亚战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戴高乐主义是法国资产階級在无产階級面前一种軟弱的表現。

1958年5月，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成了为整个法国资产階級利益服务的最合适的工具，也成了为法国帝国主义特殊經濟利益服务的最合适的制度。

实际上，戴高乐主义的經濟基础并不普及到整个法国資本主义，而仅限于其中最現代化和最富于世界性的那一部分，也

就是以經濟上重整旗鼓并起着推进作用的那一部分資本主义为限。

二、在当前世界帝国主义体系总退却和殖民主义将被消灭的历史时代，不論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国内的階級关系，法国同社会主义陣营各国的关系，法国同資本主义各国以及法国同被法帝国主义所奴役的非洲各国人民等各个方面的关系——，戴高乐的政策都忠实地体现了法国資本主义的階級利益和法国帝国主义的經濟利益。

在国内方面，戴高乐的全部工作就是用他那独有的手腕来竭力維持大資產階級对于法国人民的統治。有人經常提到戴高乐的“高超的观点”——应当承认戴高乐确有这套本領——而这种“高超的观点”立即将戴高乐捧为法国大資產階級最高利益的代表者。戴高乐还会将法国大資產階級的最高利益同法兰西全民的最高利益混淆在一起，这一点也許是出于下意識的；此外，他将自己的使命加以昇华并由此将他个人的人格同法兰西的人格等同起来；但是，經驗証明，在資產階級同无產階級之間，即在劳动和資本之間发生的糾紛上，在垄断資產階級同中等資產階級，即垄断資本家同中小資產者之間所出現的矛盾上，戴高乐向来沒有出面担当过什么公正无私的裁判。不管当初摩勒是怎样胡說八道，1958年戴高乐沒有作出过任何裁判。他設法使資產階級各种成分之間的裂痕不致扩大。他把大資產階級的政权从困难的处境中挽救出来，并且还在貫徹他的政治陰謀，即把大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五花八門的政党掌握在手里，并且对觉悟了的民主力量施行打击，在实现这个政治陰謀之后他就有可能应付殖民制度危机深刻化和符合目前法国帝国主义擴張野心所用的种种开支，采取第四共和国历届政府所未敢采用的办法，全部由工人階級和中間阶层来負擔。

在国际方面，戴高乐总是以忠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阶级精神和阶级利益作为他的政策的基础的，那怕是在法国帝国主义利益同其他帝国主义利益发生尖锐冲突时也不例外，戴高乐的思路永远也脱离不开帝国主义利益的狭小圈子。

虽然，通过邀请赫鲁晓夫来法访问，戴高乐也曾经大致上制定了一套改善法苏关系的政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背弃帝国主义阵营。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960年5月在巴黎举行的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上看得清清楚楚。在那次会议上，戴高乐非但没有奉行什么独立的外交政策，相反的，由于他的阶级性，他支持了甚至是鼓励了艾森豪威尔的强硬态度，从而为破坏会议卖了力气。他自己证明了这样一点，即尽管他也怀有某种程度的微小愿望，但是他仍然把自己的政策同美国帝国主义的政策拴在一起，直到把和平推到最危险的境地。

戴高乐最终被迫同马里和马达加斯加就它们的独立问题进行谈判，并且在口头上承认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自决权，这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反帝国主义思想和反帝国主义意志促使他这样做，而是因为非洲的反殖民主义势力和法国以及全世界民主运动的压力迫使他和法国帝国主义不得不向后退却。他曾经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以便十全十美地来执行法国大资产阶级在改换制度以后所委托给他的首要使命，那就是在非洲寻找一个能够在一种新的政治制度之下来维持法帝国主义的退却基地，因为原有的旧法律制度和旧政治制度已经无法再保留下去了。

尽管戴高乐的对外政策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有过一些严重失策，但是从它的各种各样自相矛盾的表现中，可以看出，一个帝国主义正在那里摸索前进，这个帝国主义在竞争的进一步尖锐化中，在同其他帝国主义的关系日益恶化中，在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之间，在国际范围内出现了新的力量对比

的情况下，寻找自己的出路。这个帝国主义，由于它本身的軟弱，对于走和平共处和非殖民主义化的道路特別感到恐惧，因为这条道路对它來說，比对它的那些英美伙伴还要难堪，还要危險，而它的英美伙伴們也是要在进行拚死的反抗以后才会跨上这条道路。

由此可見，戴高乐的制度，戴高乐的政策和意識形态都是垄断資本主义的表現和反映，都是現代法国帝国主义的表現和反映。事实完全粉碎了那种把戴高乐描繪成是什么超階級的人物和超党派的公正人士的胡言乱語。

* * *

在这些事实面前，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学家們是怎么讲的呢？他們最多也不过是从法律角度来对戴高乐主义进行某些批判。他們中間最誠实的代表人物，例如杜韋惹，也曾屡次对个人专权的机构作了一些細致的解剖。在本书的开头，我們就曾引証过他們的論述。但是，他們中間还没有一个人提到过戴高乐主义的階級內容，闡明过戴高乐主义的經濟基础，把戴高乐主义看作是历史运动中的一种現象。就是这样，他們对事物的本质一字不提。虽然，有的时候他們也談到这种問題，他們也有过值得大家注意的东西，但是杜韋惹以下列的一段話来迴避：“那些試图运用階級語言来分析当前局势的人們有意識地把国家元首說成是垄断資本主义的工具，这样一来，他們就把問題极端地簡單化了，而且也就严重地歪曲了这个問題。”接着，由于他的階級本能，杜韋惹在对这一点作了断言以后，立刻就提出了一个“反論点”，我們可以把这个“反論点”比作是为了使一个遭到森林火灾威胁的村庄脫險而燃起的一道反火沟。杜韋惹是这样說的：“即使这种提法是正确的，那么也不該忘記，法国时局的基本事实之一，就是存在着兩種互相对立的資本主义；一种是現代的、

生气勃勃的和具有竞赛能力的资本主义，它已经着手进行国际合作并为世界市场开放门户；另一种则是古老的、像个溃烂了的毒疮般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对于到国外市场上去冲锋陷阵无能为力，因而也就必然会走上经济和政治的民族主义道路。难道民主人士会忘记法西斯主义不就是第二种资本主义所必然要冒出来的脓液么？难道会忘记，同第二种资本主义相反，第一种资本主义正在促使阿尔及利亚重建和平，因为它了解到不这样做就根本谈不上经济扩张吗？说实在的，不这么办也就根本不可能使共和国得到巩固。这件事再把它重复多少遍也不会是多余的。”

就是这样，杜聿菴给个人专权制度和垄断资本的专政从意识形态上帮了一个大忙，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杜聿菴都给他们刷上了一层进步的色彩，这对他们是极为可贵的。此外，杜聿菴还毫不犹豫地这样写道：“无论从戴高乐将军的社会出身，还是从他的本能反映来看，都不能把他当做是一个左派人物。但是，不管怎么说，在目前控制着政权的一切社会力量中，戴高乐还是代表着自由主义的一派，因而他是‘进步的’。”^①

如果相信杜聿菴所讲的这些话，那么就会认为垄断资本的反动性比中、小资产阶级要差一些，这样，垄断资本也就不会再是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了。这种理论所根据的是一大堆不确切的事实和荒谬的论点。杜聿菴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其重要性在目前资本集中阶段所不该加以忽视的、但终究还是属于次要地位的矛盾，即垄断资本主义利益同独立性的资本主义利益相对立的矛盾，来顶替了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垄断资本家利益同工人阶级以及中间阶层利益相对立的矛盾，这样一来，他就

^① 引自杜聿菴：“左派和议会”，见1959年1月16日《世界报》。

把讀者帶到了一條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不見窩藏着金融資本家盜匪的森林的道路上去。

不管杜韋惹說些什麼，馬克思主義思想是不會忽略這種矛盾的。馬克思主義把這種矛盾放在它應有的位置上，並且把它的真相，也就是把它的經濟和社會真相揭露出來給大家看。杜韋惹的錯誤就在於他是從一種單純技術的角度來向讀者介紹這種矛盾。他把這種矛盾說成是現代企業同古老企業之間互相對立的矛盾，並且全部抹煞了這種矛盾的階級內容。在目前壟斷資本正在準備把小企業推到水里溺死它的時刻，杜韋惹的這種理論就是拴在小企業脖脛上的一塊石頭。這種理論會把工人階級為在法國重建民主和復興民主而進行鬥爭的一部分可能有的同盟軍奪走。這種鬥爭只有在把壟斷資本的全体受害者毫無例外地團結起來反對壟斷資本的戴高樂主義政權，才能取得勝利。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企圖在已經由於看到自己的經濟基礎在資本集中的形勢下行將消滅而惶恐萬狀的小資產階級各階層中去進行傳播，這個事實掩蓋不了事物的本質，那就是，如果聽任民主被全部宰割，那麼所有的中、小企業就都會被交付給壟斷資本，而壟斷資本要消滅它們就更加容易了。不過，對於中、小企業來說也另外有一條出路，那就是結束壟斷資本的經濟和政治統治，建立經濟民主。站在壟斷資本立場通過反對獨立性資本主義來堵塞上述這條出路，對於有覺悟的民主力量來說，是一個嚴重錯誤。^①

① 杜韋惹這種把壟斷資本描繪成為進步事物的手法和那種把社會主義的降臨看作僅僅是經濟發展的一種必然結果，而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果，這種手法與社會民主黨思想和改良主義思想的一般手法同出一轍。由此可見，杜韋惹的手法，歸根到底，所起的作用是維護現代資本主義，也就是維護壟斷資本主義。關於這一點，大家一定會看得出來。

掌握在垄断资本手里的工业企业拥有头等技术这件事并不能掩盖这些企业能够在统治体系和开发体系中进行活动的反动性。因为，对于在个人专政下使法国民主向后倒退这件事应当负责的正是这种垄断资本，而不是什么资本主义最古老的那一部分。

正是戴高乐宪法和戴高乐政策完全符合杜聿惹指出的“现代的、生气勃勃的和具有竞赛能力的资本主义”所提出的要求；它的符合这样的资本主义的要求，即资本积累得越来越多，集中在它手上的财富有增无已，它为了确保自身的发展，需要用某些反民主的政治手段和政治措施来粉碎工人阶级的反抗，并且阻止它打算从经济上加以消灭的中间阶层和独立的资产阶级成分的反抗力量可能在议会中同雇佣阶层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这种宪法和政策必然会贬低议会的作用。

主张建立共同市场和欧非共同体的也是这种“已经着手进行国际合作并为世界市场开放门户”的资本主义。同时，正是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这种资本主义才会需要有一个它所认为的“强有力的政府”，也就是说需要有这样一个政府，它一方面能从政治上、税收上以及财务上支持这种资本主义，使这种资本主义在国际市场上同在其他国家拥有经济基地的垄断集团进行竞争时可以维护并扩充阵地，一方面又能使它能够抵制工人阶级、中间阶层以及非垄断企业的反抗，并且可以以此为借口，在共同市场范围内或其他场合同帝国主义竞争对手们达成某种妥协。正是为了这个缘故，这种资本主义才需要有一个反动的政体，需要有一个把行政权交给垄断资本来直接掌握而不再受议会牵制的政体。戴高乐上台以前，共同市场理论家，例如维累教授，曾以加强政府权力作为法国参加共同市场的条件，这并不是偶然的。正如第四共和国末期负责贸易事务的国务秘书、戴高乐分子希

累特所說：“只有把各种力量联合起来，法国才能解决在建立共同市場問題上遇到的困难。也只有建立了稳定的行政机构，我們才能在同我們的伙伴进行的竞争中，处于势均力敌的地位；同时，也唯有如此，政府方面才能在議會和各种行业組織协助下承担起它所应当承担的任务，終結我国經濟上的薄弱环节。”^①

戴高乐政权建立起来以后，巴黎伯爵改变了原先的反对成立共同市場的态度，这也不是偶然的。1959年2月間，他这样說：“对于过去的尝试，我們曾表示反对，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我国还没有适当的政体，政府的职能陷于一片癱瘓，因此，如果在当时实行什么欧洲政策，发展下去只能有損于我国的利益。自从政府实行改組以来，我們和我們的伙伴就势均力敌了。”^②

更狡猾和更富于危害性的是与杜韋惹的論点相吻合的并认为戴高乐个人政权是民主政权的論点。这种論点的根据是說戴高乐并没有把各种自由全部取消，說什么戴高乐就任国家元首是我們当前賴以抗拒法西斯主义的唯一保証。这种思想的主要傳播者是摩勒和戴高乐分子中間的左派人物。摩勒把新政体說成是“民主制度上的一项革新”，并于5月初在图盧茲宣称：“只要戴高乐还活着，我們国内的法西斯主义危險就不大。”资产阶级还没有把他們的反民主政策推到极端，于是他們的思想家便抓住这一点来大事宣揚；这些思想家把没有能够充分滿足自己愿望的资产阶级的劣迹說成了是资产阶级的一种美德。他們說：你們瞧，尽管我們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和垄断資本主义时代，可是，同馬克思主义学說相反，戴高乐和资产阶级是多么讲自由，多么讲“民主”啊！因为他們并没有把人民的全部自由統統

① 《經濟金融通訊》，1957年11月25日。

② 引自《巴黎伯爵政治办公室1959年2月报告書》。（見1959年2月20日《世界报》）

取消掉。你們瞧，这个制度是多么人道，因为它只是切掉了人民的双臂以便阻止他們維護自己的权利，但是却給他們留下了舌头好让他們提出抗議！被馬克思主义者唾弃的垄断資本用的是多么漂亮的行动来証实他們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啊！拆穿了西洋鏡，資產階級思想家們的論点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这种論点不只是証明这些思想家們的民主精神墮落到了怎么样的严重地步，因为：“以一个得天独厚的人，一个决定一切、并由一个人考虑政治問題的首腦来代替議員們和各部部长自己，这不是对民主的否定还能是什么？这不是走向法西斯制度的定义本身，还能是什么？”^①同时这还有利于它表示反对的法西斯主义，因为它掩盖了戴高乐主义的另一个方面，即为法西斯主义敞开了門戶，从而起了麻痹人民群众警惕性的作用。

这实质上是一种小資產階級的論点，是为个人政权鳴鑼开道的論点。这种論点的根源在于对戴高乐当初所以能取得政权的历史条件作了錯誤的分析，在于对戴高乐所代表的社会力量一无所知。这种論点忽略了事物的本质，即戴高乐制度不过是垄断資本主义企图把国家政权直接掌握在手中，并尽量貶低議會作用的始終不渝的傾向的一种特殊表現而已，而这种表現将会导致取消議會，取消整个民主生活，也就是說导致法西斯主义。

当然，垄断資本对他們自己当前的这种专政形式只是在还能行之有效的情况下才会繼續予以支持；換句話說，一旦这种专政形式陷于整个失敗或部分失敗，他們就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根据各种政治力量对比的可能条件，求助于另一种更加暴戾的专政形式：或者是在个人专权制度範圍內通过戴高乐本人；或者是

^① 引自多列士：《在法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59年6月24—28日）。

在运用1958年宪法以及1958年11月大选产生的議會以多数来起用另一名政治人物；或者是通过一种挺身而出，反对当前戴高乐制度的公开的法西斯形式。

不过，对于垄断資本的这种趋向來說，戴高乐制度給他們提供了莫大的方便，因为戴高乐制度不但沒有堵塞法西斯主义的道路，相反的，它为法西斯主义鋪設了道路。其实戴高乐或者是继戴高乐之后担任共和国总統的人物，他只消援引1958年宪法賦予他的权力，再依靠警察和軍隊，就能使戴高乐主义一变而为法西斯主义。因为垄断資本已經从战前法国統一党的失敗和战后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失敗中吸取了教訓，所以他們以为要想在法国建立法西斯政权就不能依靠自下而上的群众压力——也就是說，不能通过可能带动大多数法国人民的公开的法西斯政党——而是要自上而下，也就是說从政府开始，通过国家机器，首先是通过軍事官僚机构公开宣布准备“把全国人民都包括进去”的办法来进行。

懾于群众运动的威力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像1959年1月7日法令^①——請大家注意，在这項法令上署名的除了戴高乐以外还有居·摩勒和勒热納——；戴高乐所容許的在职將軍們的种种濫言；主張把在阿尔及利亚实行的分区办法和軍事管

^① 按照1959年1月7日的法令，政府可以頒布簡單命令的方式，決定全國處於“戒備狀態”，而且不受任何期限的約束，這樣一來，說不定哪一天，轉瞬之間整個法國都會被置於軍事管制之下。另外，1959年1月17日的《世界報》也說，按照1958年12月30日法令把國防工作進行改組後，“共和國總統和政府當局取得了極其廣泛的、很難使人加以控制的權力。”這家報紙還接着說：“當然，為了適應原子戰爭和革命戰爭的需要，不得不加強行政的權力。但是把廣泛的合法手段如此這般地移交給少數幾個人手中，人們還是會感到恐懼。革命‘戰爭’的定義是下得如此糟糕——也難以給它下個明確的定義——，只須有個極其微小的借口，就能把整個國家在傾刻之間置於一種徹頭徹尾的和專權的管制之下。”

制扩大搬到法国本土上来的后备军官们的“街谈巷议”，好像1959年5月30日及31日的“街谈巷议”；还有保卫新共和联盟为了想把该联盟从一个在议会里同其他政党平行工作的政党改造成为一个唯一政党而进行的讨论^①等等。所有这一切都特别说明了这样一点：个人独裁制度本身正在孕育着法西斯主义危险。

加强1960年2月4日法令所制定的法令制度也是趋向这方面的。在阿尔及利亚的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发动叛乱(1960年1月24日—2月1日)之后，戴高乐提出了赋予他代替议会行使立法权的要求。当然，这种全权原则上是应当用来对付对1月24日叛乱事件负有责任的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和法西斯分子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以后也把它用来对付工人阶级和民主人士。德勃雷在参议院里对这一点也已经直认不讳。他说：“条文上写得清清楚楚。问题在于在阿尔及利亚维持秩序，维护我们的政体和宪法，维护我们的绥靖政策和行政管理……但是我不能让人说成这是它唯一的用途。这里所指的维持秩序，维护政体和宪法等，它包括的内容，除了主要是关于在阿尔及利亚发生的事件并且可以扩大适用到法国本土上来以外，它还可以用来应付同共和国的未来切切相关的以及阿尔及利亚事务以外的其他需要。”^②

① 所谓夏朗东和弗雷所支持的纯戴高乐主义观点，它的倾向是把保卫新共和联盟作为一个中间偏右的政党来在议会里进行活动；但是，与此同时，苏斯戴尔所领导的法西斯一派却正在准备把保卫新共和联盟改造成为一个唯一的政党。

后一种倾向得到了航空业垄断集团（如达索集团）的公开支持；当然还应当加上汽车业垄断集团，如像西姆卡和它的经理皮果济。另外，在这上面存在着分歧意见只是表现在目前的策略问题上。因为夏朗东在1959年11月举行的保卫新共和联盟代表大会上就这样说过：“要代表全体人民讲话的保卫新共和联盟是和其他政党截然不同的政党，它是一个想要包括法国整个领域的党”。这只能是法国唯一政党的定义。

② 见1960年2月3日《政府公报》：《议会辩论》。

上面这一段話只能是針對着工人階級和人民群众的運動講的。他們的態度既然如此，還怎么能說戴高樂和總統制是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堡壘呢？

由此可見，如果說為法西斯主義闖入的那扇大門已經是半開着，那末這種說法是一點也不過火的。只有人民群众具有高度警惕性的鬥爭才能阻止這扇大門的敞開。毫無疑問，要想關上大門，不讓法西斯主義闖進來，那就一方面必須結束個人獨裁政權，另一方面也必須結束作為法西斯主義主要溫床的阿爾及利亞戰爭。但是，要想解決這些問題，法國人民只能够而且也只應當依靠自己。

法國共產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就是這樣清清楚楚地回答了處在專制政權壓迫下的全體法國人所提出的問題。法國共產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制定了導致革新民主和恢復民主的政策和綱領。代表大會提出的下列口號指出了爭取改變現狀的必要手段：“竭盡一切力量，建立工人階級的統一戰綫；竭盡一切力量，建立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聯盟”。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